

日本史概觀



康德八年六月一日印刷  
康德八年六月五日發行

非賣品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

滿洲帝國協和會中央本部內

著作人

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  
滿洲帝國慶祝委員會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印刷人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

滿洲帝國協和會中央本部內

發行人

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  
滿洲帝國慶祝委員會

## 序 文

本書乃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滿洲帝國慶祝委員會紀念事業計劃之一。經本會委囑秋山謙藏君；該君曾於國際文化振興會主催之下，爲僑日歐美人士講述「日本歷史」，茲取其講稿，以充該慶祝委員會之刊行計劃，更蒙其詳加訂修，復由本員校閱，而譯爲滿·鮮·俄·蒙各語。日文版另由建國大學助教小野壽人君執筆，題爲「光輝日本」，已刊行問世矣。

康德八年二月十一日

滿日文化協會常任理事

文學博士 池

內

宏

# 目次

## 序 文

第一部 世界與日本……………一

第一章 世界的地圖……………一

第二章 東方的世界……………二〇

第二部 日本的特質……………三

第一章 國家的原理……………三

第二章 歷史的特質……………四

第三部 日本歷史的傳統與現實……………六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理想	六二
第二章	國家主義的確立	六六
第三章	榮華生活的展開	八一
第四章	武士政權的推移	九七
第五章	市民社會的黎明	一二五
第六章	國家原理的檢討	一三四
第七章	鎖國政策的制約	一四四
第八章	開國主義的前進	一四九
第九章	近代日本的興隆	一六四
第十章	新亞細亞的胎動	一八一

# 第一部 世界與日本

## 第一章 世界的地圖

現代世界上的最大驚異現象之一，即爲日本的興隆。七十餘年前，在世界地圖上，甚至對其存在毫無表示的日本，如今却成爲擁有遠大之未來的指導權威的強國之一，在世界地圖上顯示着雄大的存在了。

然而，日本在七十餘年前，始得出現於世界地圖上，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呢？這是表示在歐羅巴式的世界地圖——表示歐羅巴人或亞美利加人意識中的世界，或歐羅巴人及亞美利加人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所關心的世界地圖——上，未曾有過日本的影子而已。

明治維新後七十餘年的歷史，如此突飛猛進，以及現在日本能具有無限的未來的發展動力，絕非僅由於七十餘年間的歷史，纔突然被顯示在世界地圖上。現代人記憶中的日本，其以明治維新爲契機的偉大進步，及其由朽老的封建秩序一躍而爲強大的近代國家的飛躍發展，表面上雖彷彿極爲突然，其實却決非如此。其中尚有明治維新以前二千五百年以上的綿長的歷史、外國人不甚知曉的歷史。在這歷史的基礎之上，卽在這政治、經濟、宗教、思想及藝術等諸文化要素所綜合的歷史基礎

之上，更建設了新的歷史，這新的歷史便顯著的現出了進展之實迹。

明治維新以前，在已達二千五百餘年的悠長期間內發展下來的過去的時代歷史，已將當代的日本人所知道的世界——即與西洋世界完全不同的東洋世界——的文化，融滙綜合於日本的傳統歷史之中了。這是追求本來的理想、尊重傳統、而表示着以不斷的進步來調整現實之實踐性的日本民族生活歷史。祈念天皇中心國家的國民生活的向上，發展着克服萬難的強烈的生活力的歷史，這纔是日本歷史。爲了這個目標，保持優良的要素——凡是有益於日本民族進步的要素，便可與之調和起來的寬容精神，更具有徹底打倒阻碍勢力的熱意，這二千五百餘年的歷史，實顯示着毫不弛懈的發展。在這歷史基礎之上，更融合了新接觸的西洋世界的進步的要素，在新的綜合上發展下來的七十餘年的歷史，於愈見擴大的世界中，現在遂形成了巨大的驚異現象之一。

有人說：日本歷史是神秘的。這是未曾真正深入研究過日本歷史的人的論法，而決非神秘。實踏了一切嚴正之現實而來的歷史；真正的追求着祖先們所抱的理想，而尊重其傳統的人類歷史；這纔是日本歷史。

在世界的歷史之中，鮮有像日本歷史這樣具有豐富的人間性的。譬如：由一草、一花、一石之類的萬物中察出人間性格來，而在其間並未置以任何界限的人間生活；自然與人類渾然諧和起來的生活，曾從往昔一直繼續到今日；包括着這全部的即爲日本歷史。我想在本書將這具有現實性與人間

性的日本歷史，藉諸十二回的講義，對諸君說明一番。

各國的國民都信認自己的歷史是最正確的。這是當然的。然而，却必須始終具有客觀性。經過客觀的批判而正確者，纔是最正確的。

我在這講義中，無論客觀的或主觀的，想盡力使諸君都能够正確的認識日本歷史。更想表現出現代日本的偉大的進展，是建築在正確的理想——每個時代中形成爲國民生活之主要部分的——的追求與堅確的現實之上的。唯獨如此，纔能使認爲「神秘」或「奇異」者，移置到「現實」上去。唯有對於此等事態能正確而客觀的認識，纔能在對於將來的世界史有所思惟者的心上，留下正確而諧和的精神。

並且，對於現在我們日本人在正當的過去傳統追求之下舉其全力而進行中的新亞細亞建設，也希望以衷心的喜悅來協力合作，而在翹望真正世界和平的心中，喚起平靜與歡呼來。

所以這講義將分作三部來敘述。第一部爲「世界與日本」。在這部分中，我們將日本歷史放在更廣大的視野上，同時更聯繫着敘述一番世界是什麼，世界地圖是什麼性質，以及東方的世界是什麼。這都是客觀的述說。

第二部爲「日本的特質」。在這部分中，敘述一番使日本完成了偉大發展的基礎要因是什麼，以



及勢將覆蔽全亞細亞的歐羅巴之旗幟與亞美利加之旗幟，爲什麼獨在日本未能樹立起來？不，日本的旗幟爲什麼反而却能與世界強國的旗幟併立？而促成其基礎的要素——日本國家的原理——究竟是甚麼？

第三部爲「日本歷史的傳統與現實」。在這部分中，敘述一番現代日本的發展過程，諸君最欲知道的日本歷史，而在這歷史之中，流動於日本之根抵上的基礎原理，是如何以悠久的傳統而發展下來的。

研究舊時代的歷史，因爲是研究與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完全相異的時代，所以極其困難。因爲現在我們所具有的政治的，經濟的或社會的觀念，在考察過去的發展時，往往不能成爲正確的標準，所以在研究上，需要特別慎重。尤其日本的歷史，在每個時代中都綜合着東洋以及世界的文化，而是在日本的傳統的發展中進展下來的，想要理解體得，也實非易事。所以，真欲明確的理解日本歷史，只有熱心研究而已。這講義倘能成其指針之一，則無辜初衷了。

我首先想起那歌誦過「世界分爲七個海」的某詩人的話。「世界」分爲「七」個海的觀念，大概是世界地圖成爲現代的形式以後產生的較新的觀念。

在舊時代中生活的人們，並不知道世界有七個海，五個海，抑或三個海；只認爲有一個海。那一

個海，他們於其岸邊生活的那一個海，就是他們所有的世界的全部。這就是支配着生於該海邊又死於該海邊的人們之一生的全部觀念。今日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大概都是曾經如此的。以一個海，不，可以說連海之爲物全不知道，而只以一座山爲其整個世界的人，也是有過的。這就是生在山麓下的人們。也有以一處河畔或一帶森林作爲全部世界的人們；那就是生在河畔或森林近處的人們。

我們回想幾年前我們尙爲兒童時代的情形。生長在山麓的，海濱的或河畔的，都會以山麓，海濱或河畔作爲世界的全體。這無論是在歐羅巴，是在亞美利加或亞細亞，皆屬相同。在少年以前的幼年時代，唯有自己的家；而再追溯上去，唯有母親的懷抱，會是諸君的全部的世界。

懷戀的幼年時代，我們所有的狹小觀念，隨諸我們的成長，纔擴大爲今日的程度。隨諸在小學，中學或大學中漸次習得的許多知識，以及在實社會中所領悟的許多經驗，狹小的世界必逐漸擴大；與此類同，人類的智能發達與社會全般的生活向上，終於使世界上的人們意識到今日的世界了。

然而，舊時代的希臘人與羅馬人，會將當時所有的唯一的海，當作了唯一的世界。他們既不知有大西洋；也不知有太平洋。但是並不能因爲他們那樣想，在這地球上就沒有現在的英·法·德·意·美·日等國。此等地域，當然也會存在於與現在相同的地方，當然此等地方也住着人類。只是他們的生活，與希臘或羅馬不會發生過關係而已。換言之：即現在的世界地圖上所有的一切地域，

從極早的時代既已存在於與今日相同的地方，各自過着獨自的生活，互相不會有過發生某種特別關係的機會。並且，只有希臘與羅馬建設了足以傳諸後世的文明，而遺存至今日而已。

在希臘與羅馬的新文明開花時期，希臘人便越過愛琴海，開始與現在的小亞細亞地方往來了。這是因為希臘內部的生活向上，需要越海去覓獲新的事物的緣故。如此開始接觸的東方背後的地方，是太陽燃射之處。太陽升起的地方——阿修 (Achu)——就是亞細亞一語的起源。相對於日出之處的東方，便稱日沒之處為 Europe。當時所說的亞細亞，只限於現在的小亞細亞地方。那是因為僅與此等地方往來，希臘國內的生活，便得以充分保持的緣故。

羅馬的文化開花時期，羅馬也需要越海去與阿非利加北岸往來了。這就是對卡爾塔噶的接觸。古代東方，希臘與羅馬的文明，幾經轉變之後，形成了產生今日歐羅巴文明的基礎，這是因為歐羅巴內部的人類生活有了進步的緣故。

當歐羅巴發生此種文明以前，在歐羅巴人的祖先需要接觸的「阿修」背後接聯的地域，即印度，中國及日本等東方地域上，也育成了與歐羅巴全然無關的另種文明。那時尚無「亞細亞」的汎稱。也沒有關繫全體的政治關係。只有印度在印度河流域，中國在黃河兩岸，各自培育着另一支派的文明。中國的東方有日本，在這裏也培育着與中國或印度完全相異的文明。

所以，我們現在所想的世界地圖，既非只表現舊歐羅巴世界的地圖，亦非與此相對而只表現東洋世界的地圖。

我們應該理解：現在我們所有的世界地圖，不外是表現世界歷史某一時代之經濟的或政治的動向的；更應該理解：這地圖在任何時代都是不斷的變動着的。我們的問題必須進一步去思考一下：在每一時代中，使這地圖變動的主要原因曾經是什麼？或現在是什麼？

世界的地圖是變動的。塗成紅色、藍色、黃色或紫色等五光十彩的地圖是變動的。隨諸時序，一個地方會擴大或縮小，甚或消失。去年製作的世界地圖，也許就不能表示今年的世界。去年的地圖既不能表示今年的世界，則五年前或十年前的地圖，僅能表示當時的事實，或根據記憶始可追溯到過去情況，乃是我們常常遇見的。

所以二十年前、五十年前、百年前或三百年前，其年代的間隔愈遠，那裏也就愈有着以我們現代人的概念難於想像的地圖。

現在，假設來描繪一張五百餘年前的世界地圖。其中既無南北美洲大陸，亦無以現在世界上最大勢力之一的亞美利加合衆國為中心的南北美洲大陸。這簡直是可驚的事。因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在西紀一四九二年。

不過，却不能說哥倫布發現以前，美洲大陸是完全不會存在過的。在與現在相同的地方，已經有與今日同樣面積的土地，亞美利加印第安人的祖先，在那裏已經過着漁獵生活，間或玩弄着與今日的爵士樂類似的音樂，月明之夜，踏着各式各樣的樂器之聲音而狂歡舞蹈，在明朗的笑聲中睡去。翌晨，又去繼續狩獵。那是非常和平的生活。有時遇見破壞其平和的敵人，則舉其全力來禦戰。正在繼續着這種生活，哥倫布突然由歐洲航來，發現了這塊未被開拓的土地，在這美洲大陸的各處，目覩了許多新奇的風光。在當時的南美洲中，傳稱爲印加帝國的一個國家正繁榮於現在的秘魯地方，據說其文化頗高；該國的人們看見爲征伐此地而侵入的西班牙的騎馬武士，疑作半人半馬的妖怪，竟完全爲這手持火槍的奇異的強者所嚇倒，他們的生活便漸漸的被摧毀了。所以，哥倫布的發現美洲，只不過是說被歐羅巴人「發現」了而已。

繼西班牙人而進出北美洲的是英吉利人。於是這英吉利人又與他們的本國戰爭，終於如法蘭西的Turgot所說的一樣：「植民地像果實一樣，成熟後就要從樹上落下來」，在Philadelphia十三州聯合大會上，發表了獨立宣言。此事約在哥倫布發現後三百年，距今約百六十年之前。於是世界地圖上又重新增加了一個廣大的部分。——亞美利加基於獨自的立場，爲防衛歐洲對美洲的壓迫而發表的主張，即爲門羅主義。

哥倫布發現美洲不久以前的歐羅巴，正是大動亂的時代。英吉利與法蘭西仍然在繼續着百年戰

爭。環繞着王位繼承事件的薔薇戰爭也在英吉利開端了。英吉利與法蘭西的動搖正在繼續未已之時，德意志與意大利却已經蘊釀着熱烈的宗教改革運動了。這是因爲德意志商人——以教會及鑛業家等爲基礎的新進資本者——結合了熱那亞及威尼斯等意大利諸都市的資本，獲了經亞歷山大城輸入的東洋商品——香料及金銀——及其高利，纔造成的民衆與教會的衝突。

未久，德意志的資本者即與里斯本商人結合起來。結果，促進了葡萄牙商人的活躍。葡萄牙人壓倒從來把握着地中海制海權的意大利商人，而向東洋發展。他們非僅限於小亞細亞及敘利亞方面，更經埃及、阿拉伯及紅海，企圖開拓去往印度的通路。葡萄牙王埃瑪諾爾根據葡萄牙人彼得羅·德·果威爾哈姆——曾藉到東方開始貿易之回教徒爲嚮導，由亞歷山大，經開羅，白斯阿琴，山海路至亞丁而抵印度的加爾加達——的報告，將瓦斯科·達·卡瑪派往東方。他繞行過巴塞羅繆於一四八六年所發現的好望角，開拓了去往印度的新航路。是在一四九八年。侵奪回教徒在東西貿易上所占有的優越地位，當開拓去往印度的新航線之間，續行了幾次探險，葡萄牙人的旗幟便樹立於阿非利加的沿岸上了。於是就成立了阿非利加沿岸地方的葡萄牙領土。——此時世界地圖上纔出現了阿非利加大陸。

與葡萄牙的活動相時併進，西班牙女王僱用的熱那亞水夫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偶然發現了美洲的薩爾瓦多。諸如前述，當時美洲纔開始被劃入世界地圖。繼爲麥哲倫的繞航南美洲南端而發

太平洋；進而更橫斷渡過大洋，發現了菲律賓，以西班牙王家的名義加以占領。

葡萄牙之占領阿非利加及印度沿岸，與西班牙之占領亞美利加及菲律賓，當時所以相差無幾者，別無他因，乃是因為要想獲得東洋的金銀及香料，以饜已經成熟的歐羅巴的強烈的要求；由於這種經濟的慾望，纔一方往東而一方往西的發展下去。往西發展的一隊，却不期而然的發現了新世界。

在這新世界中活躍最甚的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具在腓力普二世的統治下。所以在新發現的阿非利加與亞美利加的全土上，都樹起了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的旗幟。這種旗幟，在歐洲的尼柔蘭島、意大利半島的南半、薩爾特尼亞、西西里或米諾魯加諸地，更進而在亞細亞的印度、錫蘭、馬拉次卡、爪哇或菲律賓諸地，也都樹立起來。世界的大半殆乎全在腓力普二世支配之下，西班牙與葡萄牙在世界地圖上所塗的顏色，倘是青色的，可以說世界地圖的大部分都被塗為青色了。這時代所說的日不沒國的國家，實在就是西班牙與葡萄牙。

然而西班牙與葡萄牙的隆盛，並未繼續長久。因為西班牙領的尼柔蘭——荷蘭，向本國表示了反抗。荷蘭反抗的背後其實是有英國在操縱着。其事實概如下述。

西班牙自佛爾延南德王及依薩伯拉女王治世以來，曾努力助長保護毛織物與絹織物工業的發達。然而就在這時却占領了阿非利加與亞美利加。

西班牙獲得亞美利加以後，曾從當地所發見的金山銀山携來無數的金銀。據說一四九三年至一六四〇年約百五十年之間，會有亞美利加黃金八百七十五噸及銀四萬五千七百二十噸，被携回本國。英國與荷蘭便常在運送此等金銀去往西班牙的中途橫加掠奪。抵當此項金銀而輸出的西班牙之毛織品與絹織品，也到了因販路的驟然擴大而不能充分供給的時期。所以，西班牙方面就有了與尼柔蘭及英國合作的必要。且西班牙的政治以及對殖民地毫無組織的經營方針，結果使產業發展大受阻碍；這時尼柔蘭與英國的毛織物工業急劇發展起來，此等製品均輸入西班牙的植民地內去密秘貿易。而且英吉利的海盜更襲擊西班牙的船舶，掠奪其船貨；西班牙遂迅速的顯出沒落的傾向。繼此沒落直下的西班牙，荷蘭與英吉利的新勢力就漸在世界上顯示出來了。

尼柔蘭地方的毛織工業，在十世紀時既已顯示出繁榮的徵兆。自十三世紀，更形成爲工業的萌芽形態而漸漸發展起來；同時，因北海的鱈魚業、奶油及穀物等農業所蓄積的商業資本，愈是促進了毛織工業的發展。尼柔蘭從英吉利輸入着毛織工業原料的羊毛，所以英國的資本也自然的侵入進去。

與英吉利資本結合後的尼柔蘭之興盛，遂釀成了他們對本國西班牙的反抗運動，不久便宣言獨立，而成立了荷蘭國。不過荷蘭的背後是有英國操縱着的。所以西班牙派往鎮壓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擊破，荷蘭繼西班牙雖得全盛，却終於確定了英國的制霸。從來，曾經樹立過西班牙或葡萄牙之旗



織的爪哇、馬拉加、克普及錫蘭島等地，竟換爲荷蘭與英吉利的旗幟了。

以毛織物工業的發展爲基礎的荷蘭的殖民地經營，與同樣以毛織工業爲基礎而經營工業的英吉利，終於又引起了競爭。從來爲世界商業戰之霸者的荷蘭，與接踵而來的英吉利激烈競爭，雖會竭力保持其地位，結果卻失敗了。英吉利自擊滅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以還，雖曾一時與荷蘭合作而試行進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領土，及至十七世紀末以後，英國竟獲得了絕對的勝利。這是因爲英國的毛織物工業較荷蘭更爲繁榮，且與法蘭西合作而使法蘭西軍隊侵入了荷蘭的緣故。英國的綿織物工業的隆盛，終於因爲產業革命，而變革了自己的相貌；於是，強韌有力的資本，便轉向殖民地的經營了。擊倒荷蘭的英吉利，與新登場的競爭者法蘭西，又以亞美利加的問題爲中心而爭鬪起來。對法國前後七次戰爭的勝利，更確固了英吉利的優越地位。因而以廣大的殖民地資源爲基礎，所謂「富有之國」或「日不沒國」的大布列顛英吉利帝國便建設起來了。由於此種事態，以擴大後的世界爲基礎而誕生的就是世界地圖。先是德意志與意大利的協力時代，繼爲隨葡萄牙及西班牙而起的荷蘭，後爲法蘭西與英吉利，此等歐羅巴的旗幟，便覆蓋了新世界的各地。這是容易理解的事實。

諸如前述，其最初的動機，是歐羅巴內部想要迅速而廉價的獲得東方之物資——金銀及香料。古來，在歐羅巴各地就有虛實難辨而萬人憑信的傳說：說遙遠的東方，在太陽燃射的地方，有金島與銀島。一世紀時，Pomponius Mela 的地理書 *De Situ Arbis* 中，既已傳述着：「由托木斯方面說

來，有金島 (Chrysoe)；由恒河方面說來，有銀島 (Arggre)，金島全是金土，銀島全是銀土。此外，羅馬的博物學者 Gius Plinius Secundus 的博物誌中謂：「印度河的河口外有金島與銀島」。其後，將認為在東方印度之背後的金銀島的傳說，視為實在的存在而具體證實出來，更附以現實性的，乃是馬可波羅。將日本的情形傳叙過去，說建築物從屋頂瓦片至地板均為黃金所作。此事加深了十字軍東征以來對於東方的關心，刺激了熾燃着海外探求慾望的歐洲人之想像力；使他們的心目超越了七世紀以來即立於阻止基督教徒發展之地位的薩拉遜文化的國度——回教國，而飛往金銀島的東方去了。這時，偶爾發現的便是美洲、非洲及印度。所以，此等海外的發現以及世界地圖的擴大，一切不外說明着東方金銀香料等奢侈品的獲得，以及需要獲得的歐羅巴社會之成熟而已。

然而，東方的金銀與香料，却非僅為歐羅巴社會的自體成熟或為應其需要而存在的。東方自體已經完成了需要此種資源的社會，乃是不可隱諱的事實。

馬可波羅所傳聞的黃金之家，頗不能知其含意何在。但在他所傳聞的 *Zipangu*——日本，在那時代以前，却確有過許多鑲鑲着金銀的建築。例如「榮華物語」中，關於以巨量金銀裝璜而成的建築，以及描寫逼真的法成寺，即是其中之一。繼承其系統的是金閣寺。現今在京都的北山或白河之濱，將五百餘年的建築仍然保其舊況的金閣寺即是。金閣寺是身兼武士與貴族的足利義滿之別墅，

這建築實表示着過去的豪華生活，到今日還使人想像着那個時代；其遺存就顯然的證明着這事實。於茲，我們應該注意：距哥倫布發現美洲約百年之前，這個建築即已完成了。

金閣寺在日本完成的時期，即十四世紀的末葉，英國的工業萌芽漸漸形成，因而毛織工業也漸漸興起，所謂「紳士的大紡織業」的豐裕的地主兼商業資本家，逐漸抬頭起來。英吉利的土地漸次買收兼併於富農之手，因此而生出了大地主。這大地主同時還經營着大紡織廠或從事於毛織品的生產。此等大地主們將土地代價改爲以貨幣徵收的形式。於是舊有的封建所有形態逐次崩潰，而移入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形態；與此約略相同的時期，在遠離英國的日本國內，所以能建築這金閣寺，也是因爲已經進展到近代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度的結果。其實，在日本國內以貨幣徵收土地代價，距建立金閣寺的百餘年前既已逐漸普遍；結果，與英吉利的紳士的情形一樣，出現了蓄積巨大財富的豪商；所以纔有了以黃金裝璜的別墅建築。

由這金閣寺的建築所見的日本國內情況，實不外表示着在以歐羅巴爲中心的前述諸多動向之外，尚有另一個世界存在。所以以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或英吉利爲中心而繪製新世界地圖，總不外是僅將歐羅巴式的世界表現在地圖上；此外，實還另有與此歐羅巴式的世界迥然不同，而以金閣寺等爲中心的東方的世界地圖。關於此等事情，將於後文第三部講義中詳述之。

其次的問題是距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年以前的世界狀況。當時，諾爾曼征服了英格蘭，而奠定了現在的英吉利帝國的基礎。夙稱爲征服王的諾爾曼基大公威廉，在赫斯丁司之戰中，獲得勝利而確定了王權，是在西紀一〇六六年，即距今約九百年前。而前此十三年，日本就築造了平等院的鳳凰堂，現在還依然在京都附近的宇治川畔遺留着優美的姿態。這也是當時的貴族——藤原賴通——的別莊，而顯示着一種日本的建築美。紫式部的五十四卷「源氏物語」的小說，被阿莎衛里翻譯完竣時，倫敦泰晤士會評謂：「紫式部也許是最初的女流作家，而且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這女流作家的小說，實完成於築造鳳凰堂的三十年前。這部小說究竟怎樣傳述着當代貴族的奢華生活，這一切均必須視作是顯示着距今一千年以前日本文化的高度。——而尤堪注意者，即有名的英吉利劇作家莎士比亞，亦係後於紫式部六百年的人，他死於距今僅三百餘年前——一六一六年。唐·吉訶德的作者也是在這年逝世的。

先於此「源氏物語」三百年前，在奈良鑄成了大佛。當時的佛教信仰，是古來即印於日本人心中的敬神觀念藉諸佛像之形態所表現出來的一種信仰。而顯示着佛教傳來以後在日本發展起來的佛教性格。詳細的解說將移諸第三部講義；總之，印度佛教原係增進人類生活幸福的要素，到日本則成爲強化日本國家原理的要素而發展起來了。建築奈良大佛時，亦係以皇室爲中心的國民全體協力一致而擔當起來的。

先此二十年之前，即距今一千二百餘年前，以勅命修纂了明示日本國家的理想與傳統以及當時之實況的「日本書紀」。我們須要銘記：距今一千二百餘年前的日本，已經就有了與今日在日本同樣含有強烈國家意識的歷史著書；而更記載着隨諸國家發展全體國民的幸福安寧及生活進步也愈見實現；且爲具體表現這種情形，更建造了巨大的奈良大佛；而製作過表現皇室與臣民一體精神之佛像的日本人，實有着科學的能力與技術——鑛業的知識與冶金術；而且集中於政府的國家權力與國富也是非常巨大的。蓋一千二百年前，既已存在着今日日本發展的巨大的要素了。也就是一千二百年前的日本人，已經就具有以銅來鑄造那樣巨大佛像的能力了。其後，不斷的繼續發展，更在各種姿態之下表現出來。由於此種事實之中，可以看出追求傳統、改革現實而向其次的時代強靱的發展下來的日本歷史。現代的日本能造出世界無比的陸軍與海軍，以及在此次事變中活躍的飛機，或於其背後與以支持的諸般產業，所以能如此飛躍發展者，也是古今相映互成因果的。且在現代的種種發展上，還像建立奈良大佛時所表示的天皇中心國家一樣，尤能追求人類生活的向上，乃是我們更當注意的事實。現代日本的突飛猛進，究竟是在何種情形之下進行着，頗可徵諸創造長距離飛行記錄的航研機；在如此激烈的戰爭之中，日本人竟那樣餘裕綽綽的樹立了世界新紀錄。這種新紀錄，於一切部門中均在陸續產生着。倘能溯諸古昔來追求這雄大的力量之源流，諸君就會曉得：航研機的成功，神風號的歐亞連絡，以及日本號飛行世界一週等，決非突然發生的「神秘」，更非「奇異」。

千年以前的世界與五百年以前的情勢頗為懸殊。五百年前的世界，其後也是不絕的改換着面貌的。首為德意志、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或荷蘭，繼為英吉利與法蘭西，最後則為亞美利加諸國，其活動的印跡已顯然的表現在地圖上了。而隨諸時代推移，在這期間，當然也有許多事件，以其各種彩色塗成了表示各國政治勢力範圍的世界地圖。不過那始終是表現西洋世界的地圖；我們須要知道：於此同時，除了表現西洋世界的地圖，還有一幅某部分相同而某部分全然迥異的世界地圖。那是以迄今猶存的金閣寺、鳳凰堂、源氏物語、奈良大佛或日本書紀等所表現的日本文化，及以對於日本文化有過極大貢獻的許多國家為基礎的世界地圖。建立金閣寺時代的日本，許多商船航渡海外各地；此事由呈報葡萄牙王埃瑪諾爾的報告即可得知。當時來到印度的葡萄牙人報告葡萄牙王埃瑪諾爾謂：他們完全為日本商人在這地方的強勒之活動所驚駭了。其實，從印度來到瑪刺次卡的葡萄牙人，是受日本商人的誘導纔到抵中國的。

據說是葡萄牙人發現了日本，然而那是歐羅巴人的說法；其實，葡萄牙人東來却是受了日本人誘導，而鮮有知道這事實的人。此事在日本歷史、東洋歷史或東西交涉的歷史上，是極堪注目的一點。

據我最近十數年間的研究，距巴斯克達瑪乘葡萄牙商船最初出現於印度的二百年前，日本已經年

年派遣具有組織的商船隊到印度以東的海上去了。更派遣多數商船隊前往暹羅、爪哇、瑪刺次卡、斯麻脫拉及安南等當時形成獨立國家的諸國。日本商船最初被派到琉球——今日的沖繩縣，又從這裏搭載其他船舶航向南方。此等史實，根據最近發現的琉球的「歷代寶案」的外交文書，已極明確。當時，衝破涵駭的波濤航赴南方各地的商船隊，都安然無事的將此等地方的物產載運回來。因此，與中國也陸續貿易起來。將日本與中國的物產，售往南方諸國；而購入南方的香料及其他產物，再將產物携歸日本，一部分轉買於中國及朝鮮半島。這史實也詳細的記載於朝鮮文獻「李朝實錄」中。如此獲得的利潤更增加了國富，使日本人在各方面的生活都豐裕起來。金閣或銀閣的營造、能及狂言之流行，即在這個時期。

如此，繼此海外貿易隆盛的時代之後，豐太閣的豐臣秀吉，會擁戴後陽成天皇，而親渡中國，試圖建設包括東洋全體的和平的帝國。在其後的時代中，有所謂「御朱印船」者——即持有航行特許證明的數百隻日本商船，航往南方各地，日本人在暹羅或爪哇等處，開闢了所謂「日本街」的特別居住地帶。

所以，當時東來的葡萄牙人，知道不與日本握手而干涉東洋問題實屬不能，遂送呈手書於豐臣秀吉，這文獻至今尚藏於京都的妙法院。

繼豐臣秀吉之後者爲德川家康，他受朝廷委託，掌握國內統治大權，充任將軍，擔當實際的政

治，而創立了所謂江戶幕府。不過他的後繼者却以為嚴厲的統制日本國內，較之與葡萄牙等國家貿易而獲得利潤更為最要，遂施行了「鎖國政策」；即斷絕與外國往還，而開始了嚴格的國內統治。

在東洋海上曾經活動最盛的商業國日本，自己停止了活動。葡萄牙與荷蘭便一切毫無拘束了。因此，日本人所開闢的南方各地，他們也就自由的樹上了自己的旗幟。

其後，日本保持了三百年間的平和，國內全境完全統治成功。然而唯其因此，僑居在費過巨大苦心而開拓下來的南方各地的諸多日本人——海國日本之開拓者的日本人，因為他們的祖國驟然改變了政策，已經無法歸國，遂凝望着東北的天空而死去了。他們在生前寄給其親族友人而申述着戀戀之情的書信，潛過嚴密的鎖國之羅網而到達祖國，今日尙多保存未遺。

在這三百年間，完全閉塞了海外的往還，只許一隻荷蘭船，一年一度航入長崎的出島，在一片表面的和平中，日本在經濟上、政治上及思想上，準備着向其次的時代飛躍。這期間所產生的文化，譬如文樂的人形戲或歌舞伎之類完全拘於定型中的文化，實足表示此時實相的一面。不過，那是與日本固有文化的性格截然不同的。其顯著的證明就是留存各農村中的風俗，譬如祭日等。農村的人們慶祝他們的生活基礎的農收，或朝謁祀祭他們祖先的神社時，就將衷心的歡喜藉諸大鼓與笛子的聲音獻示出來。海外輸入的物產停止，以自己的勞力從狹窄的土地中生產着不足的部分；以全生命在耕種裏度着勤苦的生活，從這生活更體驗了強韌的生活力；這種生活經過那時代，而繼續到現



在，遂成了現代日本人的雄濶的生活力之基礎。這種爲諸生活的強烈的鬭爭，今日又成了使日本人舉其全力來求謀中國之開放及其組織近代化的根本動力。前此，開拓朝鮮台灣與滿洲的力量，使亞美利加或巴西的荒野闢地化爲沃土的力量，全是這毫不懈怠的生活力之表現。

並且，在近代各種工業方面，超過了英吉利的繁榮之基礎的綿織工業，也表示着世界第一位的生產量與優秀的內質。在化學工業方面的人造絲與窒素肥料等，也爭取着世界的第一位而急速發展不已。這也是淵源於努力不懈的雄濶的生活力的。

以上，我們看到了促使許多國家活動的推進力，以及其力量如何使世界地圖發生了變化。並且看到了在與西洋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發達起來的日本歷史的性質，看到了由於強制施行鎖國政策，以致日本如何自動停止了海外發展。倘若這發展繼續不已，世界歷史以至世界地圖，也許大有不同於今日罷。然而這只好付諸想像之中了。

次爲「東方的世界」，想講述關於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歷史；以及這亞細亞的三大文化，如何各有其不同的發展過程。

## 第二章 東方的世界

新世界的探險與發現的時代，是西歐天地生氣勃勃的活動時代。各種推進力鼓舞着諸多民族前進，結果世界地圖便擴大了。而人類的精神視野也顯著的擴大了。關於此事，概如前講所述。將我們日本的發達狀態與歐羅巴來互為比較；人類發展的兩大領域的歐羅巴與日本，可知在距今五百年前，於某種意義上，既已成熟而達到頂點；且各為其民族發展的必要，開始了海外貿易。現在我們將講題改為「東方的世界」，來考察一番印度、中國及日本的社會的或經濟的發展。不過我們的興味主在日本歷史，關於印度及中國，只略述其重要特色，而將兩者與日本比較一番。

東西世界結合為一，似乎是近代歐羅巴人新世界探險時代的事情。然而，從地理上論來，歐羅巴與亞細亞原來即在一塊所謂「歐拉細亞」的廣漠的大陸上毗連存在着。世界人類的兩大潮流，本來出自同一淵源，由於環境及其他種種原因，纔產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在人類發達的根本要素上，可以說是東西共通的。我們應當時時留意此點，不能因為人類兩大潮流各有相異的特性，便以為根本上所有不同。

東洋與西洋的互相接觸，在交通尚未發達的舊時代，當然非常受着制約，然而兩者間却發生過某種程度的接觸。譬如：被稱為鳥類之王的孔雀，其本來產地乃是安南——今日法領印度支那之一部，但根據羅馬的古代紀錄，在西曆一世紀的古時，這種鳥既已被古代羅馬珍視；根據「日本書紀」

載稱：在距今一千三百年前時，卽已傳來日本。而一般認爲起原於印度或波斯的球戲，中國唐代早見流行，而在日本「萬葉集」中也出現過這個名稱，大概在奈良朝既已流行普遍了。而且，平安京的貴族們，極其愛好此種技藝，呼爲「競馬打球」。(在日本如今尙以古時的方法流傳着)。西洋各國的水球、曲棍球或廻力球等近代遊戲，就是由蹴毬進化而來的。此類競技，在日本國內非常普及，而尙能與母胎的「球戲」併存，這事實殊爲有趣。孔雀與蹴毬競技，不過只是兩個例子而已。但根據此事，卽可知道：在極古的時代東西兩世界是有過關係的。

試觀亞細亞的地勢，亞細亞大陸的西北部，伸展着廣漠不毛的沙漠地帶或草原地帶；東南部是許多河川所灌溉的低地伸向大海。此等地方是所謂中國的地域。大陸的中央聳立着世界之屋頂的喜瑪拉雅山之高峰峻嶺，其南麓也展開着水利豐饒的平原，而漸盡於南方的海邊。這部分是所謂印度的廣大的地域，而被山脈、沙漠與海洋包圍着。大陸的北部概屬不毛之地，是不適於文化發達的地域。反之，南部則多爲河川流貫而地力豐饒的平原，這平原之中的主要者，都成了文明的中心地。所以對於亞細亞的文明發達貢獻較多的，主爲南方的諸多國家。

北方不毛之地的住民，過着游牧生活，爲爭奪牧地而不斷的互相戰爭着。所以他們武勇而喜殺伐，且多有屢屢侵入豐饒的南方或侵入後成爲當地之土著者。而南方人經此等北方人屢次侵略的結

果，生活也被蹂躪粉碎，喪失了生氣，因而習重因循。南人的長處爲文化，北人的長處爲武勇，因而南人便以文化爲武器來抵抗侵入者。在戰鬪上雖然敗北，因爲懷柔同化了征服者，遂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唯南人因爲過於置重於他們的文化精神方面，反而有了自家中毒的現象。印度與中國建設了足可誇耀於世界的文明，後來却顯著的呈出衰頹狀況，其原因之一，似卽在此。

日本因爲是四面環海的島國，遠離了亞細亞大陸的動亂，未受任何妨害，遂能在悠長歲月中使國勢發展起來。並且不會經受過一次外敵的侵入或征服，也未受過其他民族的支配；遂得以從容吸取南方亞細亞諸民族所扶育起來的文化之精華，將其融合於固有生活樣式之中，纔培植出獨特的文化與傳統來。

五千年前，印度人已經在印度河溪谷的墨罕喬·達羅，造出壯麗的七層建築物來。此建築物長年深埋在地下，近年經發掘研究的結果，性質逐漸判明。古時的印度人能在五千餘年前造出七層建築物來，在當時的全世界泰半尚在幼稚的文化狀態中，實在值得驚嘆。印度對於希臘與羅馬的文明發達，曾有過幾多有力的貢獻，均成爲歐羅巴近代文明發達的基礎要素了。然而，五千餘年前既有過高度文明的發達，其後並且將佛教贈與世界思想界的印度，爲什麼其偉大的發展，未能繼續到今日呢？其中理由當然頗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以爲就是因爲從太古以迄今日，這個國家的社會組

織即是固定的。土地豐饒，坐着即能得到必要的食物。既無爲生活來移動居址的必要，也沒有爲耕種懸念季節的必要。在生存上完全未感覺到不自由，只要有極小面積的土地，就能過着較爲安適的生活。所以商業也未能發達。如此過着和平生活的數千小村落，散在於印度全土，各自擁戴酋長，十年一日的過着生活。即使上層政治組織發生何等變革，在社會全體的秩序上，也無任何變化。紡織等家庭工業，只是農業的一部分，各小村落獨立經營着自給自足的經濟，長年繼續着固有的生活。此等部落由地主及僧侶之有力的結合統制着，這也是使社會組織固定的要素。因爲這種情形，所以商工業未能發達到某種限度以上，也沒有出現過變革政治組織的特別勢力。印度未能成爲強力的商業國，也未能成爲近代國家的主要理由，即在於此。及至強大的西歐勢力侵入，不能對抗，而只得屈服。其實五千年前具有墨罕喬·達羅等優秀文化的印度，乃是現在世界中擁有最多數信仰者的佛教發祥地；也是西自伏爾加河，東迄日本，無人不曉而極受尊崇的阿育王之故鄉。然而竟已無法更生了。

中國遠自先古即散在着許多都市，頗與印度的狀態不同。唯此等都市並非隨諸商工業的發達而興起的，而是以兼有地主、官吏與高利貸三種性格的人爲中心而成立的。所以在本質上，基礎即置於農業經濟之上。此等都市的成長，不僅妨礙自由的商工業發達，且嚴重的加上了限制。

兼有地主，官吏與高利貸三種性格的人們，其最強而有力者便成了政治上的權威者，藉諸此等威權，更成了王或皇帝。這種權威者又爲了與其他具有同樣性格的人們調和，便在政府中給他們一定的地位。然而，一旦這均衡發生破綻，必是後者就了帝位，或滅亡前者，或使其降落到低微的地位去，即是所謂「將相本無種」的情形。掌握政治支配權的人雖然改換，或發生了政治上的變革，對於民衆的生活却毫無關係。

政治支配的主要對象是土地。耕種土地，對地主繳納一部份的收入，地主以其所得來維持政治的勢力。工商業因爲受着非常嚴格的統制，能變革當時秩序的有力商人階級，也就未能發達。中國的政治原理完全根據於孔子的教義；其給與中國人性格上的影響，較諸歷代皇帝實有過無不及。孔子爲期廣範圍的調整社會生活，制定了周密的禮法，管束一切的社會關係及行爲。然而這終不過是構成封建的土地所有者指導理論而已。政治上的支配階級以此種思想爲基準而生存，他們的指導原理，却是以自己爲位於世界中央的無上的國家；視周圍的異民族爲夷狄的所謂「中華思想」。如此，對自己的政權給與合理性，作爲壓制民衆的理論根據。所以縱使由這支配階級之中產生了優秀的文化，也完全是與民衆游離的。中國未成爲近代國家的原因，即在於此。

中國會屢次有過天朝的改革。但是固定的社會組織，却不能輕易改變。蒙古人及滿洲人的侵略結果，政治的支配權也會被握入此等異民族——夷狄——之手。唯其支配者立刻同化於中國，也未能使民

衆生活根本改變。

中國文明達到頂點的是「唐」代；當時的中國呈現了較諸同時任何國家都進步的繁榮與藝術活動。不過其後並未能向上發展，而與印度同樣屈服於西歐帝國主義之下，這仍然是因爲社會組織的停滯性之弱點所致。恰如長年被密閉於棺木中的木乃伊，觸見空氣即將立刻破碎一般，妨礙工商業的自由發展，而墨守舊規的中國的秩序，終爲西歐的產業資本破壞了。鴉片戰爭與西紀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實在就是爲「中國人的中國」敲了喪鐘。

印度與中國爲西歐諸國屈服的時期，日本便痛感到危機的到來了。而爲了認識日本的真正的理想與傳統之實體，而來調整目前的狀態，知道勢必毀棄繼續三百年間的社會組織了。於是廢棄「幕府」政治，歸復了以前的政治形態——日本傳統政治原理的天皇中心的政治形態；這就明治維新。當然爲達到這個結論須要許多時間，但日本人却自覺到爲克服印度與中國所遭的時艱，需要一個巨大的變革了。此事距現在僅七十年。這變革纔是發展到近代日本的一大契機。

尊重傳統、追求理想而以不斷的進步來調整現實的熱意，充溢於當時的日本人之間。不過，只望到當時社會狀態表面的歐美人，將日本的國勢視作與中國印度並無甚大的差別。鎖國以來一百餘年，與外國全無往還，在社會的下層中，占有國民多數的農民依然過着舊式的生活，其上有許多政治支

配者的領主，並且還有統治此等領主的專制的「幕府」政權。睹見這種狀態的歐美人，便以為與在中國印度所見者不相上下了。

然而，歐美人所見到的乃是被置於所謂鎖國的特殊狀態之下的變態的社會組織。溯至三百年前，如前講所述，將來到馬刺次卡的葡萄牙人誘導至中國的，乃是日本人自身。但是與葡萄牙人繼續通商，終屬有反日本當初的理想，而與當時的政治支配關係發生抵觸，遂下一大英斷，放棄了在暹羅、爪哇及菲律賓一帶擴張着商權的日本人的生動的海外發展，這即是所謂鎖國，其結果遂生出了後來社會。四面環海的日本違背了時運，將自己發展的海外貿易中途杜絕，因而產生的社會當然是變態的。所以歐美人觀察這種基礎上的政治形態，便視作與中國或印度相同了。但是在變態的政治形態之中，却開始蘊育了天皇中心的國家原理之復興運動，即新日本的建設運動。

歐美諸國的人士關於此點，並無正確的認識。認為明治維新以後的近代日本的突飛猛進是「神祕」者，即是這種原因；也就是他們的觀察是誤謬的。

日本人在歐羅巴人胸懷探險新世界的熱意以前，就縱橫活動於東洋的海上了，金閣銀閣的建立，即表示着其結果之一端。此事實是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百年之前。日本人當葡萄牙人開始活動以前，即已支配着東洋的海上了。



距今四百年前的日本文化，由全體看來是頗為豪壯的。根據遺存於今日的多數金銀屏風，即可知道當時的情形。

當時的英雄豐臣秀吉，認識了天皇中心的國家原理，而努力於恢復新秩序。他彼任命為平安時代以來藤原氏代代世襲的「關白」，居於輔翼天皇大政的位置，完成了國內統一的大業。由於他的邸宅「聚樂第」的情形，也可窺知他並非一介武夫。這邸宅在「聚樂行事記」中載謂「美麗絕於言詞形容」，裝飾豪華的彫刻的唐門，現在仍遺存於京都的大德寺內。全體的規模在聚樂第屏風圖中也有所表現，我們藉此可以想像出三百五十年前的生活之豪華情景。這實是商業發展極其顯著的時代的產物。

繼秀吉之後，以天皇所賜的「征夷大將軍」之名，掌握實際政權的是德川家康。他創立了以江戶城為中心的政權，即所謂「德川幕府」。這個時期，名為「朱印船」的商船，頻頻出動於暹羅、爪哇及菲律賓等地方，因此促進了國內商業的振興。

然而商業發展到某種程度時，便使以農為基礎的社會現出不安，德川氏把握未久的新政權，在根本上就發生了動搖。因之，家康便先將都市、鑛山及貨幣鑄造等與近代商業資本有直接關係的部門，歸屬於新政權之下，同時更實行將農民全體攙入舊時代社會組織之中——即置其於封建的羈絆之中的政策，以謀永久把握新政權。於是他的後繼者竟以同樣的目標，限制了商業的超乎現狀的發

展，不辭巨大的犧牲而施行了無理已極的鎖國政策。

以此種方策一面抑制商業的擡頭，在另一面更在延長封建政權的指導理論中，採取了中國封建組織指導理論的儒教，而確定了士農工商的身分上的秩序。然而，因為當時商業資本已經頗為發達，却未能如願以償。於是就將法網伸至社會的一切部分，而施行了一種極為專制的警察制度。文藝復興以後的歐羅巴，商業資本已漸漸發展，而日本却取着相反的方向。

從來，中國在日本人眼中，總是實示着一副實際的姿態。其後日本却完全將中國視作觀念的存在，將中國封建制度指導理論的儒教，用作日本新政治形態的指導理論了。於是，從來向海外伸張勢力的日本人的生活力，不僅被抑制在內部，在嚴重的條律之下，甚至一般民衆竟不能走出自己身的故鄉一步了。將農民縛束在土地上而支配農民的諸國之領主，徵收重稅以肥私囊，領主收納的一部，又被「幕府」掙去。於是便成立了一種德川政權、領主及農民間的絕對的支配關係，同時也產生了在德川政權及領主的政權下以租稅為資本的商工業的發展。所以，社會經濟的根柢存在於農村，表面上亦是如此。然而隨諸時代的進展，又產生了蓄積商業資本的町人階級，暗中成爲一個勢力，而主張着他們自己的特別立場。這實顯示着社會組織的矛盾性。這時代的政治形態的一面，可以由日光東照宮的建立上窺知。東照宮是「江戶幕府」的創始者家康的廟，在建造這豪華神社之前，

京都已有祭祀豐臣秀吉的豪華的豐國廟。德川氏破壞了該廟而建造了豪華的日光東照宮。這廟雖是家康之子秀忠及其孫家光爲具體表示對其父祖的仰慕而建造的，實際的目的乃是爲了徹底幕府、大名及農民之間的支配關係。建造這豪華的宮殿所需的費用，完全課於諸國領主，領主們又令農民負擔起來。巨大的烏居、石燈籠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用農民的租稅建造的。其實由維持政權的方策而出的重壓，常常是要加到農民身上的。假如這神社的建造真是爲了崇敬德川氏的祖先，德川家康既採取幕府政治的規範於鎌倉的武家政府，而自已又稱爲源賴朝的子孫，也就應該對源賴朝同樣尊敬。然而，我們可以來看現在仍存於鎌倉的賴朝之墓，顯然可以看出在整個的江戶時代都放棄未顧。總之，家康自稱爲賴朝之子孫，家光建設日光東照宮，均不外是以絕對的支配農村爲目標的政策而已。

不過無論如何奇妙，或如何免強，這政治形態却延持了三百年之久。這是因爲：在內部方面，島國日本與外部的交通中斷，而抑制了商業的超乎現狀的發展；在外部方面，整個的江戶時代，世界的任何國家，也沒有來打破這鎖國狀態的必要。因之，對外得以和平，同時能確實的維持了國內的治安。

在前此的時代中，民衆的力量雖會顯著的伸張於外部，此時，這種力量却傾注在國內各處的農村之中了。田地固屬無論，即山川沼澤等凡可利用的土地，都有有效的被利用起來，因之，國內的生產

力急驟增加了。並且，農民只得依靠有限的收入來維持生活，也就養成了勤苦耐勞的精神。

如此，成立了國土融爲一氣的統一組織，國民思想也統一一軌。學術興盛起來，科學的研究也有了可觀的成績。表面上雖是農業占着支配的地位，內部却走向近代的階段了。隨諸學術的倡明，研究「日本書紀」等古典的結果，斯道的學者漸漸理解了「幕府」政治不是日本本來的政治形態。而爲追求古典中所表現的理想，却痛感到須脫離目前的狀態，造成天皇中心的四民平等的社會，而打開一個新時代了。這時竟又偶然出現了「黑船」的來航，遂接觸了久別的外部世界。

這「黑船」與葡萄牙人曾乘之而來的所謂「南蠻船」，性質完全不同，不論當時的爲政者主見如何，却不得不實行開國了。拼棄了三百年的傳統而重現於新世界中的日本，就努力追求起本來的理想來，而整頓了新的現實，這即是距今七十餘年前的明治維新。德川氏根據過去二千五百餘年儼然存在的國家原理，奉還將軍的名位於天皇，三百餘名的大名也奉還了版籍，同來具體的實行天皇中心的政治，一舉便實現了所謂明治維新的一大變革。

散步上野公園的人士，在東照宮前與室博物館的隣街，當能看見併排着的大石燈籠。那些石燈籠都是江戶幕府的絕對支配下的大名們所造的。燈籠裏的燈火已在七十幾年前熄滅了。這燈火的熄滅，我以爲就是近代日本形成的最大原因。



## 第二部 日本的特質

### 第一章 國家的原理

今年是紀元二千六百年，我們日本現在就榮逢了這足堪紀念的歲月。即自神武天皇舉行即位大典於大和的橿原宮，以該年定爲天皇統治的元年，迄今星霜流逝，已經有二千六百年之久了。

所謂紀元二千六百年，較之以耶穌誕生爲紀元元年的西洋的紀元一千九百四十年，恰長六百六十年。然而，恰如西洋歷史並非從耶穌紀元開始一樣，日本歷史也不是從紀元元年開始的。神武天皇在橿原宮舉行即位大典，即是表示當時已經確立了日本的國家原理。所以，唯有再對這國家原理繼續已達二千六百年的歷史加以認識，始爲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意義。

世界地圖是變動的。某處時或擴大，某處時或消失，關於此事已於前講敘述殆盡，倘若想及最近一年來已經證諸事實的歷史，實有數世紀的歷史僅僅發生於一年間之感。爲考察這歷史變遷的根據，實有將最近十年以至數十年之歷史回憶一番的必要。

十年前，在倫敦舉行了海軍軍縮會議。翌年，滿洲事變勃發，未久滿洲帝國成立，東洋遂向新秩序建設飛躍邁進。在這期間內，世界各地會相繼發生了許多我們猶未忘記的各種事件。能審重的考

察過去十年間在世界歷史上是如何重要的時代，纔是真欲理解「歷史」者的態度。

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藉維爾塞講和閉幕告終。俄國內部勃發了社會主義的革命，意大利國內也興起了法西斯蒂；繼而，德意志國內的拿其斯亦見勃興，這都是前後接踵互為續起的事件。歐洲最初現出新動向的時期，亞美利加藉英吉利、日本、法蘭西及意大利調協合作，而招開了軍縮會議。同時，更成立了「九國條約」。我們必須考慮二十年來歐羅巴、亞美利加及亞細亞的歷史，而將之與最近一年間世界繼續發生的種種事件聯繫起來，以及因何使我們對於二十年的世界大戰冠以「第一次」之字樣的世界動向。

再追溯至三十年前。這時代是明治維新以來，屢成爲亞細亞問題之焦點的中日日俄兩戰之戰火線朝鮮半島合併於日本，新東亞建設運動進行其第一步的時代。英吉利改訂了十年前締結的日英同盟，關於東洋問題而盡力於日英間的友好關係，英皇又復巡訪印度。使印度的歷史進展至新的階段，也在這期間內。

其次爲四十年前的情形。在亞細亞方面，中國發生了義和團事件；在歐羅巴方面，是英吉利極盛一時的維多利亞女王治世告終的時期。歐羅巴與亞細亞之間，則有日英同盟的締結，同時發生了日俄戰爭，而使日本獲得了大勝。日本堂堂登上世界舞台，即在其後。對於世界歷史的變動，頗當詳細查考其進展的動向。

五十年前。是年明治天皇頒布了帝國憲法，日本國民對於藉新形式來強化舊傳統，懷着深切的感激，曾誓力圖謀國勢發展。未久，以維持東洋和平爲目標的中日戰爭勃發，勝利歸於日本。當時，亞美利加藉諸西班牙戰爭的結果，獲得了菲律賓，遂乘勢舉行了第一回汎亞美利加會議。

追溯至百年前，日本尙未登上新世界的舞台，當時，在中國發生了鴉片戰爭。結果，使歐羅巴諸國，猶其英吉利與法蘭西侵入遠東的形勢，漸益顯著起來。

我們緬閱過去百年間的歷史，而對於這期間惹起的人類、民族及國際間的重大變化加以檢討時，就可以理解這期間所包含的歷史意義了。

隨諸文明的進步，人類生活也增進了轉變。雖然其速度未與時代的演進成爲比例，日本的歷史却複雜得有輓近百年來的二十幾倍，這期間縱無輓近百年來世界那樣動搖無定的移動，却也有種種重大的變化。現在，日本國民慶祝紀元二千六百年，意義並非在於歷史的悠遠。萬世一系的天皇中心國家與國民的緊密結合，乃是日本國家古今一貫的原理。在此種原理之下，經過種種變化的，纔是日本歷史。日本國民以紀元二千六百年爲契機，回顧其歷史而展望將來，慶祝的意義即在於此。

天皇、國家與國民的緊密的關係，是日本肇國以來的國家原理，此種精神已綿綿不斷的貫流於國



民之間；而明確的有所表現的最古的文獻，便是「日本書紀」。此書編成的年代，約在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即紀元一三八〇年（西紀七二〇年）。當時，在歐洲正是東羅馬帝國禮歐三世的時代，距諸爾曼庭大公維廉侵入英格蘭而奠定現在英吉利帝國的基礎，尙早三百年。即在歐羅巴明確的出現了國家主義的三世紀之前。然而，日本却追求着過去歷史上所明示的理想，以尊重傳統而整頓現實爲目標，已經編纂了「日本書紀」。本書中所明示的國家原理，其後永世爲日本國民信奉。而在距今七十餘年前，這原理在當時的現實之下，對其認識愈爲正確，這就是明治維新。對於這原理的尊重，就成了近代日本的突飛猛進的推進力。

按諸講述的秩序，先來說明「日本書紀」的內容。與「日本書紀」同時可重視者，還有完成於「日本書紀」之先而具有同樣內容的「古事記」。兩者均爲公撰的史書，然而歷史家完全一致認爲「日本書紀」是較可信賴的文獻，所以在本文只講述「日本書紀」。

此書共三十卷，最初的十分之一止於神代，其次的十分之六由神武天皇至大化革新，其餘的十分之三自大化革新以後至第四十一代天皇時代爲止，組織整然的記載着神話、傳說以及歷史。與亞細亞大陸開始接觸以前，日本國內雖無文字，關於那時代的部分，端賴以「語部」——暗誦——爲生業者的貢獻而成，他們將古代的故事，父傳其子，子傳其孫，以口傳述於後世。

「日本書紀」中雖有紀錄着些許的事件或美辭麗句的部分，然而對此寧可置諸不問；本書的立意在於闡明日本國家的原理，而明確的說示天皇統治的原理。其原理即爲：有天照大神之子孫的天皇，始有國家，有國家，國民始能存在。

試觀此種原理的載述，關於「神代」的最初兩卷中謂：日本諸島出自混淆的大海，清淨澄明的部分爲天，沈濁的部分爲地，如此形成了所謂「大八洲」的日本國土。天照大神（擬爲宇宙萬物中心的太陽）之子孫從高天原降臨到這國土上。國土的統治纔授託於大神之子孫。即是說皇統傳自神旨，統治均由於該神之意志的意思。在第三卷中，詳細敘述着天照大神之聖裔神武天皇登「紫宸殿」的過程——即天皇即位的經過。也就是說這全是天照大神之意志的表現。遵諸天照大神的聖意從高天原降臨到這國土的諸神，乃是日本民族的祖先。總而言之，先有神之聖裔的天皇，次有天皇以和平及秩序而統治的國土，然後纔有天降諸神之子孫的國民。這已經明確的表示了天皇、國家及國民之間的關係。「日本書紀」編成以前，雖不會有過足以動搖天皇主權的人，却有過未被天皇的權威所統治的人們。所以「日本書紀」乃竭力強調着神武天皇所諭示的原理，因此書的完成，纔明確的表示了天皇中心的傳統原理之神聖不可侵犯。

於茲，我們應該考慮的，是神武天皇所諭示的日本國家原理的內容。「日本書紀」第三卷中謂：

「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

這是兼都樞原時的諭示。這諭示便簡稱爲「八紘一字」，也就是現在我們榮逢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國民體奉天皇御旨的標語。神武天皇諭示我國建國之大精神的聖言，在前一句中有「然後」二字。乃是在樞原建都之際，天皇頒發的詔勅的結語。其詔勅中論謂：

「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尙梗；而中洲之地，復無風塵。誠宜恢廓皇都，規摹大壯。而今運屬屯蒙，民心朴素，巢棲穴住，習俗維常。」

復又論謂：

「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

然後又宣諭如下，而闡明了不動的聖意：

「苟有利民，何妨聖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鎮元元。」

更宜論謂：

「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

這已表明遵諸天孫降臨時天照大神的神勅，而正當的繼承了皇位的態度。關於此諭，後文尙有詳細的敘述；按前文所示，天皇於結語中宣諭謂：

「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

最後，說明了奠都於日本中心地橿原的意志：

「觀夫畝傍山東南橿原地者，蓋國之壤府乎，可治之。」

遂於後二年正月一日，天皇在橿原宮中即天皇寶位，定是年爲天皇元年。（明治維新後，明治天皇制定是年爲紀元元年。）

神武天皇在這詔勅中論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而表明了登至尊之位而使國民安泰的聖意，即是實踐了天照大神授此「天神」之國於天孫的意志；天照大神的神勅中論謂：

「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爾皇孫宜就而治之，行矣。實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同時，不外是發揮了「皇孫瓊杵尊養正」的聖意。

神武天皇的建國目標，在於國民的安泰，使天皇中心的國威及於「八紘」，「八紘」的全部宛如一座「屋宇」〔宇〕一樣和平。也就是說天皇是天照大神的聖裔，既是神，同時又是人，爲遵奉天照大神的聖意，以其慈德使國民泰平，纔授以至尊之位。如此，日本在肇國之始，即已確立其理想了。

根據「日本書紀」所載，神武天皇之後，至第十代的崇神天皇，關於歷代天皇的事績，不過載有簡單的事蹟而已。然而，據崇神天皇所諭：

「惟我皇祖諸天皇等，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爲司牧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聖德。」

藉此可知神武天皇的精神，曾爲歷代的天皇嚴正繼承未渝；歷代天皇均曾廣用人材而經綸天下。更如崇神天皇自諭謂：

「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當聿尊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

會繼承「大運」而愛育百姓，更爲實現「八紘一字」的大理想而諭謂：

「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並安天下，不亦可乎。」

我們拜讀崇神天皇的詔勅，可以窺知：御名「始馭天下之天皇」的神武天皇的建國大方針——遵奉天照大神的神勅，導國民於安泰的聖慮——經其後歷代聖主竭力擴充，「八紘一字」的理想已漸次實現。同時，也可窺知崇神天皇的御名所以又稱爲「御肇國天皇」的原因了。並且，祭祠天照大神的伊勢「皇大神宮」，即是在這天皇時代所建立的。

崇神天皇以後的諸代天皇，亦向皇祖祖宗祈禱國民的幸福與安寧，而於神靈加護之下，圖謀了政治的發展。由此，可以得知當時是存在着祭政一致的政治形態的。

前文會述及神武天皇「八紘一字」的大精神的前提是國民生活的安泰。以下具體的講一講歷代天皇如何繼承了這種精神。

崇神天皇勅語中諭謂：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並藉開通池溝，「以寬民業」。次代的垂仁天皇曾以「人民富足，天下太平」自喜。景行天皇的時代中，實行征伐過爲害「百姓」（國民）的熊襲。次代的仁德天皇，登高台而望見民家無有炊煙，遂免除了三年的一切課役；第二次望見民家昇騰着煙火，諭謂：「朕旣富矣，豈有愁乎」。當時正值皇宮的牆垣坍塌，甚至竟無修理的實力，皇后因問謂：「何謂富焉？」天皇謂：「其天之立君，是爲百姓，然則君以百姓爲本。……今百姓之貧，則朕貧也。百姓之富，則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貧矣。」這是極出名的一段事蹟。因此也可知道神武天皇的精神嚴正的發展，使人覺到了無限的感激。其後，在雄略天皇的遺詔中，天皇宣諭謂：「方今區宇一家，烟火萬里，百姓艾安，四夷賓服，此又天意，欲寧區夏」。更諭謂：「義乃君臣，情兼父子」，「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這正說明着「八紘一字」的大方針的具體內容。具體地實現了這大方針的是聖德太子的政治，更進而將之擴充起來的是大化革新。

歷代的天皇如此軫念着國民生活的安寧與幸福的增進。然而在大化革新以前的時代，貧富懸殊甚。因之，當時的朝廷痛感到必須革新此種情態，勿寧是當然之事。

聖德太子的政治活動目標即完全置於此點。當時日本會派使節奉「日出國」天皇之命，出使隋唐。以此等使節的體驗為基礎，於孝德天皇的聖代，遂斷行了大化革新。其目標即在於增進國民生活的安寧與幸福。關於此事將於第三部中講述之。

天武天皇曾論謂：「若有利國家而寬百姓之術，詣闕親申。詞理合即立為法則」。而制定了近江令。此亦不外肇國以來的大方針——即「八紘一字」的具體表現。此時，對於國土自稱為日出之國，遂成了「日本」的國號，所編成的國史即為「日本書紀」。

擔任編成「日本書紀」的舍人親王等人，將「八紘」的字樣，填入了「あめのした」（天下）——意為在天皇的慈愛之下，國民度着安寧的生活的地方——的語彙。「八紘」乃引用於「淮南子」卷四墜形訓：

「九州之外。乃有八殫。亦才千里……凡八殫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殫之外。廼有八紘。亦方千里。

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

必以風雨。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

此與將「元元」二字用為天皇恩澤下的國民之意，恰是同一趣旨。由此亦可窺知「書紀」的撰者，欲將傳統的政治原理表現在文字上的熱意了。

因爲該書的文字是漢字，文章亦爲漢文，外國的歷史家遂以爲其中所含的思想，亦非日本固有之物，其實絕非如此。如藉「八紘」的一例即可知道，該書的一貫思想是日本所特有的。總之，將「語部」所傳的國家原理，藉漢字漢文所表現出來的，乃是此書；縱然諸氏族之間有過內部的鬥爭，但仍能在嚴正的體系之下，記述着以此原理而進展下來的一千三百餘年間的悠長的歷史。

這國家原理經過其後各代的歷史，永世嚴守不渝，此事，諉諸第三部講義；現在，我們略述這原理所以成爲明治維新之最大原動力的情形。

江戶時代三百年間的和平，無論其性格如何，突然打破其狀態者，確爲黑船的航來。對於這從來歷史上罕見的新動搖，孝明天皇於弘化四年四月，招告於石清水臨時大祭，爲國民生活安寧祈願謂：

「……敬虔惶恐，祈告天神，日夜守護天皇寶位，安如磐石；並賜天下國家，永保太平。」

「……敬虔惶恐，祈告天神，天下靜謐，寶祈長久，黎民快樂，時賜恤助。」

其後，也有過同樣性質的祈願。及至元治元年正月，更頒賜詔書於將軍德川家茂謂：

「嗚呼，汝顧方今之形勢如何。內則紀綱廢弛，上下解體，百姓苦於塗炭，殆顯瓦解土崩之色。

外則受驕虜五大州之凌侮，將罹併吞之禍。其危實如累卵，又如燃眉。朕思之，夜不能寐，食



下不咽。嗚呼，夫汝顧之如何。是則非汝之罪，乃朕不德所致，其罪在朕躬。天地鬼神，其啓朕聰，將何以見祖宗於地下。……」

這「百姓苦於塗炭」的狀態，雖是「幕府」政治所造成的；而天皇仍謂：「是則非汝之罪，乃朕不德所致」，並謂：「將何以見祖宗於地下」。

孝明天皇駕崩之後，以年僅十六而卽大位的明治天皇，對島津及毛利二氏頒下討幕大詔，詔中諭謂：

「……驅萬民於溝壑而不顧，罪惡所致，神州勢將傾覆。朕今爲民之父母，不討此賊，何以  
上謝先帝之靈，下報萬民之深讐。此朕憂憤之所在，未顧諒闇者，萬不得已也。……」

這實是開國以來從未見過的最爲峻烈的詔書。概爲增進國民生活的幸福，必須推翻「幕府」政治。於是於明治元年三月，遂頒發了有名的五條誓文。

一 廣興會議，萬機決諸公論。

一 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一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須使人心勿倦。

一 打破舊來之陋習，須基於天地公道。

一 求智識於世界，努力振起皇基。

茲擬施行我國前未曾有之變革，朕躬先率衆，誓於天地神明，定斯國是，立保全萬民之道。爾衆庶等，其亦基於此旨，協心努力。

「保全萬民之道」是這誓文的目標，我們通觀歷代的御詔，即可知其中存在的傳統的國家原理了。猶須知道其中存在的新時代的創造契機。

明治維新的根本方針，頒發於慶應三年（明治元年的先年）十二月九日，謂：

「諸事以神武創業之始爲本。無分縉紳，武弁，堂上，地下，竭至當之公議，與天下同休戚。其各勉勵，以副勅念。洗舊來驕惰之污習，以盡忠報國之誠，勤力奉公。」

在這大號令中，可以知道是以「神武創業之始」爲本，而更加以其體化者，便是五條誓文。

明治三年七月，江戶改稱東京時，天皇曾諭謂：「此朕之所以視海內爲一家，東西同致者也，衆庶其體此意」。五年九月，東京橫濱間鐵道開通時，曾諭謂：

「東京橫濱間之鐵路，朕親開行。自今望藉此便利，貿易愈爲繁昌，庶民愈爲富盛。」

對於明治天皇期待庶民富餘之大詔，不禁想起神武天皇奠都橿原時勅詔中的「苟有利民，何妨聖造」之句，而更能想起庶民富餘之結果的「八紘一字」之大精神。

明治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於最初的紀元節中，天皇詔謂：「朕茲祝紀元吉日，會同群臣，張設醮宴，命奏舞樂。汝群臣等，共體朕之祝意，善盡爾歡」。未久，即制定以太陽曆二月十一日爲「紀

元節」。

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紀元二千五百四十九年）紀元節時，天皇頒詔而誓約於皇祖天照大神及神武天皇以下歷代御神靈謂：

「皇朕誠恭誠惶誥於

皇祖

皇宗之神靈曰：皇朕循天壤無窮之宏謨，承繼惟祖之寶祚，保持舊圖，弗敢失墜。顧膺逢世局之進運，隨人文之發達。亟宜明徵

皇祖

皇宗之遺訓，成立典憲，昭示條章；內以爲子孫率由之所，外以廣臣民翼贊之道。命其永遠遵行，益行鞏固國家丕基，而增進八州民生之慶福。茲制定皇室典範及憲法，惟此皆未外紹述

皇祖

皇宗垂貽後裔之統制洪範。而朕能躬踐得以隨時舉行者，洵有所倚藉

皇祖

皇宗及我

皇考之威靈。

皇朕仰祈

皇祖

皇宗及

皇考之神佑，併誓告朕現在及將來，必率先臣民履行此憲章而無愆。

神靈庶幾鑒之。」

誓約之後，更向國民頒下勅語謂：

「朕以國家隆昌及臣民慶福爲中心之欣榮。朕依承諸祖宗之大權，對現在及將來之臣民，宣布此不磨之大典。

惟我祖我宗，倚我臣民祖先之協力輔翼，肇造我帝國，以垂無窮。此乃我神聖祖宗之威德及臣民之忠實武勇，愛國殉公，以貽此光輝國史之成跡也。朕回想我臣民卽皇祖之忠良臣民子孫，須奉體朕意，獎勵朕事，相與和衷協同，宣揚我帝國光榮於中外，共同希望鞏固祖宗遺業於永久，以分此負擔而無疑也。」

翌年遂舉行了帝國會議。在萬民感戴之下，榮逢光榮的二千二百五十年四月二日，嚴肅的舉行了奉祀神武天皇的橿原神宮鎮座祭典。是年十一月，舉行第一次帝國議會時，明治天皇於開院式中頒

下勅語謂：

「朕告貴族院及衆議院各員。

朕即位以來，歷二十年之經始，內治諸般制度，已粗具綱領。庶幾仰倚皇祖皇宗之遺德，得與卿等，繼前啓後，收憲法之美果，將我帝國之光輝及我臣民之忠良勇進之氣性，宣示中外。朕又夙與各國修好，廣行通商，以期振張國勢。幸締約諸國之交好，已愈加親厚矣。

陸海軍備，爲保全內外之和平，務期逐年充實。

明治二十四年度之豫算及諸般法律案，朕命國務大臣，付諸議會。朕期卿等，公平慎重，有所審議協贊。併望爲將來貽以足資承繼之模範。」

當時，天皇吟歌一首謂：

伊勢之神 天長地久

寧我邦家 護我國土

十餘年之後，日俄戰爭大勝時，天皇又吟謂：

樞原聖訓 永誌毋忘

維護邦家 萬世隆昌

體得了天皇聖慮的國民，獻出滅私奉公的至誠，獲得中日日俄兩次戰爭的大勝，而發揚了國威。明治天明駕崩之後，全國民對天皇生出熾烈的追慕之情懷。未久，即建造了「明治神宮」。關於此

事，我們應當再度檢討國家原定與國勢進展的密切關係。

榮逢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紀元節，我們拜受了如下的詔書：

「朕惟遵神武天皇惟神大道，繼一系無窮之寶祚，定萬世不易之丕基，以經綸大業，歷朝相承，上以仁愛之化及下，下以忠厚之俗奉上。君民一體，以逮朕世。迎茲紀元二千六百年。際今非常世局，當此紀元佳節，期爾臣民等騁思於念神武天皇之創業，念皇國之宏遠及皇謨之雄深；和衷戮力，發揮國體之精華，以克服時艱，而宣揚國威。期報祖宗之神靈。」

拜受這詔書的日本國民，必能體察詔書中以神武天皇所諭示的大理想為基礎的趣旨；一致協力於國運之進展，誓守歷代天皇軫念國民生活之安泰與幸福之增進的聖慮；如此，「八紘一字」的理想自然可以具體化了。

## 第二章 歷史的特質

距今一千二百年前，日本國家的原理，已明確的表現於「日本書紀」之中。這原理的根本雖於先此一千三百餘年前神武天皇舉行即位大典時，即已表明殆盡，其後更應乎歷史的變動，而愈見成熟，這成熟的現象表現在文獻上的，即為上述的原理。

這已經確定的原理，其後會如何的發展？更採取何種方法而強化潤色了這原理？我們觀察此點，始能洞悉日本歷史的特質。

有天皇然後有國家，有國家始有國民，這原理即在與外國接觸而知曉了外國各種事情之後，依然是毫無動搖的。非但毫無動搖，而且愈為鞏固強化了。甚至可以說是爲了強化固有的原理纔攝取了外國的文化。而且在這時期完全沒有排斥外國文化，猶是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此種自主的積極的態度，已在千餘年前大化革新前後輸入中國或印度文物時，明確的有所表示；而在明治維新後攝取西洋文明時，更加顯著了。接觸具有實質價值的外國文明時，對其文明能表示如此寬容的態度，實是貫通整個日本歷史的顯著特質。

這種態度頗能在千餘年前採取印度佛教及中國儒教的事實中發現出來。當然，印度的佛教是表現印度的民族精神與理想的；中國的儒教是表現中國的民族精神與理想的。印度的佛教以及從佛教派生出來的各種宗教心，已成爲社會組織的嚴重的紐帶，受其禍害，今日使印度陷入不得不屈服於新興歐羅巴勢力之下的地步了。至於中國的儒教，雖在每個時代中都支配着中國人的思想，却使國民性偏狹起來，招來了使中國人陷入苦境的結果。因爲儒教是保守的，不歡迎任何變革，其理想是想將中國經過多少世紀，均放置在靜止的狀態中。

然而，施行佛教而效倣儒教的日本，爲什麼獨能欣然繁榮起來呢？那是因爲在日本採取佛教及儒教的當時，國家原理已經得以確立的原故。不但是爲強化此原理纔採用了這兩種宗教，後來，這兩種宗教的信奉者，也曾有所貢獻於國家原理的發展及獨自國民性的發揚。總而言之，在日本所出現的這兩種宗教，決非蹈襲原來的形式，而是將其改變爲適合日本國民性的進步的宗教了。下文略述這兩種宗教在日本的情形。

先來講一講佛教。佛教的傳來據稱是在距今一千四百餘年前欽明天皇十三年（紀元一千一百二十一年）時。當時最初接觸到佛像及經典的日本人，並未將其視作印度佛教的具體表現之佛像及經典。只將其視作與祖先傳給自己的神具有同樣性格的外國的神而已。根據「日本書紀」即可窺知，在該書裏會稱佛爲外國的神、隣國的神、他國的神或佛神。也就是他們將佛像視作自己心中所懷的古來之神的具體表現，視經典爲神的言語之紀錄。佛像即是神的原形，佛典所傳即是神的言語。如此，這種新接受的佛教，不外是古來的神的道——神道——的特別具現而已。所以佛教的弘佈，就是古來神道的擴充；藉此遂更新了國家原理的組織與內容。

相信唯一世界的佛教觀念，使以原始的宗教觀爲根據的日本民族的古來習慣，發生了部分的變化，同時在強化天皇中心的國家組織上，也有了頗大的補益。佛教的世界觀就被解釋作天皇、國家與國民三者渾然歸一的意思。據「日本書紀」所載，爲涵養這種觀念，建立奉置聖像的房屋，始呼



爲「寺」。而其主要的目的，卽爲加深對於天皇及父母的尊敬與服從。所以佛教不僅與以崇拜祖先爲主的原始信仰互相調和，而且更洗練了這信仰，而將之導入了高尚的思想階段。佛教傳來之初，在日本卽受了如此的理解與處理。傳到日本以後的佛教，與原來的佛教畢竟是不同的存在了。至於由純粹的宗教立場來研究佛教，還是屬於後世的事。

其次講一講儒教。儒教教義的中心思想在於祖先崇拜，而認爲人間最高的義務是對於父母的孝道；這種儒教被輸入日本之後，也具有了新的性格。實質的孝道與祖先崇拜的思想結合一起，早已存在於日本的社會了。及至儒教的孝道傳入以後，更使國民的實踐行爲規教起來。並且更擴大了那教理的範圍，將其發揮至最高的國民服從尊敬對象的天皇上，這是中國從未有過的事實。中國受了儒教——使社會固定的——的保守思想的禍害，已不得不自趨衰亡，而日本因爲具有抵抗此種致命危險的傾向，並未蹈其覆轍。中國的儒教流於形式，但在日本却充分的理解了其內容。利用孝道強化天皇的地位，實是日本儒教的特色。

日本攝取的佛教，使日本固有的神道面目一新而益加明確；這是因爲日本人所理解的佛教，與印度原來的佛教本質相異的關係。

推古天皇的皇太子聖德太子，曾建造了法隆寺及其他多數寺院，廣事倡興佛教，同時天皇中心的政治，也有了顯著的進步。第一：爲「十七條憲法」，卽新法典的編纂。第二：爲「天皇紀」「國

紀」，即天皇中心的日本國家歷史的編纂。第三：爲小野妹子正式代表日本國家的外交使節出使中國。小野妹子對隋朝呈遞了「日出國天皇致日落國皇帝書」的國書，隋朝爲此派遣答禮使裴世清來到日本。素以「中華」自任的隋朝，爲了上述國書中所表現的不容輕忽的氣魄，竟也派遣了正式的使節答禮，由此亦可窺知日本國家的成熟了。在這時期，大概就開始採用「日本」作爲國號以代從來的「大和」了。這國號當然是根據於視自國爲赫赫的太陽出現之源地的思想。這思想不外是對於天皇——具備着包容宇宙萬物之太陽一樣的德性，在現實上來統治國家——中心國家的反省，對於日本所有既往歷史的反省；這國號明確的表現着當時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

諸如上述，正式向中國派遣使節始於推古天皇時代，然而中國的文物已於許久之前，即已輸入日本。前述佛教也是經過中國傳入朝鮮，又由朝鮮傳來的，即視爲是中國文化的傳入亦無甚不可。中國的典籍亦會大量輸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等典籍都被用於強化日本國家原理的目的了。試觀前述的「十七條憲法」，構成那十七條文章所用的中國典籍，有「論語」「孟子」「孝經」「左傳」「禮記」「管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史記」「文選」等，從此等典籍之中，採攝了爲發揮日本的國家原理最適切的語句。這在尊重日本固有精神的一點上，與採用佛教的情況是態度一致的。

大化革新的目的在於擴充日本國家的原理，當然勿庸贅述。革新以來，佛教與儒教對於改新政治，曾盡了頗大的任務。然而，並非是利用了印度與中國的原物，而是使往時爲擴充日本國家原理

而採攝的兩種宗教，進而更爲這新目的盡了任務。

從佛教方面來看此事，特別值得注意者，即爲在新政進行發展的期間：有兩三部特別的經典陸續宣弘於一般國民間的事實。這幾部佛典即爲：「金光明經」，「仁王經」，「法華經」等。每部經典都論說着：必須藉經典的功德而期望國家的隆昌。從多數佛典之中，特別選出這幾部經典的理由，完全是因爲其內容如此使然。其宣弘的目的，不是使人信仰釋尊的言語，而是想用以擴充天皇中心政治，在這件事上，實具有國家的意圖與新政的關聯。形同國家官吏的僧侶，被派往回而八方，擔當宣弘經典的任務；根據此等經典來涵養國民思想的特別寺院，以「國分寺」的名義，也在全國各地建設起來。更在帝都奈良，創立了「東大寺」，作爲統治全國之「國分寺」的「總國分寺」。所謂「東大寺」乃是俗稱，其本名是「大和國」的「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東大寺」是宣揚「金光明經」——作爲適合於擴充國家原理的經典而被特別採用者——之教義的護國大寺。這個寺中所奉置的有名的大佛，實表現着新日本國家的確立，並祝福着其前途的幸福。聖武天皇在大佛開眼時論謂：這佛像是國民全體一致協力製作的；天皇曾親自在佛前祈禱國家的隆昌。實際論來，源出「華嚴經」的教理的盧舍那佛的巨像，實是在作爲「八紘一字」的具體表現，及國民生活的安寧進步之目的下，而被建造起來的。

其次，我們試觀法令及勅令。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正確的論來，既非法律，亦非勅令，其中包含着許多道德的戒訓，如：「君爲天，臣爲地，臣民永守君言，君臣相與提攜而萬物順行。」

「臣須守君之命」，「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等。以強調日本國家原理而助成國家統一爲目的，從中國的典籍抄來了多數適合於這目的的語句。大化革新的勅令，是將中國的法律及制度，援用到我國的要求上來的。不過在實際行使上，曾有失敗的部分，這頗證明那部分的要求不適用於日本的要求。

當時的法制「律令」，雖援用着唐朝的制度，却也表現着日本的特性。

隨諸大化以來新行政機構的確立，紀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文武天皇大寶二年）遂頒佈了所謂「大寶令」的法典。根據雖是唐制，却有唐制中所未曾有的神祇官，此官被置於最高的位置；實是頗值注意的。神是日本固有的神，以司掌祀神爲最高的政務，在太政官之上，設置了這種官職。其次位爲太政官，長官爲太政大臣，由左右兩大臣輔佐之，太政官之下置有八省：即中務省・式部省・治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及宮內省等。

崇拜固有的神，尊敬神之子孫的天皇，乃是日本政治組織的中心。所以神祇官的設置，不外是維持國家傳統的形態。大寶令取範於中國的立法及行政，然而却是顧及日本的傳統，在適合於實際要求的範圍內而採用的。此種法令頒布之後，日本國家的統一，不僅在形式上，即在精神上，也鞏固

起來了。

當時，「日本書紀」已經撰述完畢。該書具體的表示着已得確立的日本國家原理。同時，蒐集當代人士之歌謠的「萬葉集」，也編纂成功。特別值得注意者：即「日本書紀」的中心思想只是國家原理的宣揚，而無佛教思想的表现。「萬葉集」中所表明的日本人的思想，也是未受佛教影響的固有精神。例如：

樂茲庶民 我生逢辰

澤披宇宙 艸木欣欣

（宇宙萬物在天皇統治下，都閃耀着榮光。生在這時代的我們，是如何的幸運之意。）如此，傳達着日本國民的歡欣。又如防禦九州沿岸的兵士所歌吟者：

我今有遠行 立志不回顧

願爲君王盾 何必念妻孥

（即身為守衛天皇治下的日本兵士，拋開一切身後事，安心出發之意）。流露着熱烈的國民意識。

「萬葉集」中所表現的國民意識綿遠的傳流下去，藉諸「和歌」的形式，在過去一千年間的歷史上，遺留了無數的歌集。今日則愈爲興盛，戰綫上的兵士之中，也有許多歌人將每天的體驗製成歌詞，實可說是將雖舊尤新的日本歷史的特質表現殆盡了。明治維新前的中國學問以及其後的歐美學

問，雖曾引起熱烈的研究，但貫通於日本歷史中的國民意識却毫無變化。

「日本書紀」以後，國家原理愈趨發展的時代之歷史，藉「續日本紀」「續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父德實錄」「三代實錄」等五史，更充分的被表現出來。此時，帝都已由奈良遷至平安京（現在的京都），藤原氏獨占了輔翼天皇的攝政關白的地位，而其地位更逐漸增高，然而國家原理却毫無變化。

距今約七百五十年前，源賴朝由第八十二代的後鳥羽天皇賜與征夷大將軍的位置，授以國內警備的權利，創設幕府於鎌倉。幕府所被委託的權力既然如此有限，國家原理也未因此有過任何變動。幕府只能具有狹隘之權能的實況，只觀蒙古忽必烈遣派的使者到來時，幕府先報告於龍山天皇，接到命令以後，才開始其後的行動等情，即可明瞭。外交上的問題，是完全以天皇命令來取決定奪的。

建武中興之後，在京都的室町繼源賴朝創始幕府政治者是足利氏。在其次的時代，在江戶地方繼承者是德川氏。兩氏均由天皇賜與將軍的位置，委以國內警備的權限，這與從前是毫無變化的。德川氏的歷代將軍，為維持封建的體制，將日本的全社會置入極度窘迫的制約之中，而行使着過分的權力的時代，天皇中心的日本國家原理也依然毫無異動。當事者因為被委託了軍事的權限，當然世

常有過分行使權限的事實，這種事例在史上也有兩三件。不過却毫無侵犯國家原理的意圖。即國內離亂的期間，在好學之士中，對於國家原理，還時行加以新的提醒。

如此，及至豐臣秀吉統一了全國，被賜與關白的位，他曾企圖發展天皇中心的政治。其後，德川家康任命爲征夷大將軍，在江戶創設了幕府，既盡力於國內的治安，同時更大興學問；結果，古典的研究便興盛起來。隨諸古典研究的興盛，對於統治國家的權限應該集中於天皇的觀念，也漸次深刻。尤堪注目者，是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編纂「大日本史」，更加强了此種傾向。此事在距今百五十年之前。

研究古典的結果，產生了對於國家原理的認識；由這認識更產生了推翻幕府的實際運動。這運動漸次擴及全國時，便有了所謂黑船的航來。這時，幕府對於這新外交問題，自身不能解決，遂不得不去請求天皇親裁了。

關於此種情形，未曾認識日本國家性質的歐美諸國，是不會有所理解的。終於使德川慶喜辭退了將軍的位置，解散了幕府，遂促使明治天皇斷行了明治維新。關於這種理由，他們也是未曾理解的。當過去七百年的武家政治告終的同時，國家的一切權能又集中於天皇，日本固有傳統的政治形態也復活起來了。國民直接奉戴着天皇，應其天賦的能力，恢復了他們的活動。被江戶幕府的鎖國政策關閉在國內的國民，重新被解放出來，便開始了海外移民。

在這時代中，勃發了修正維新前強迫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的運動。爲維持東洋的和平，也爆發了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在另一方面，更來擄取當日日本鎖國時代的昏睡期間中有了巨大進步的歐美文化。而其態度還與從前擄取佛教儒教時一樣。在政治上、教育上、軍備上或產業上，都取着同一的態度。因爲只是爲強化國家的原理始採取歐美文物，反乎國家原理的，便皆被捨棄了。

明治二十三年，又頒布了「憲法」。制定這「憲法」當時，曾參考過歐美諸國的憲法；不過第一就主張了天皇的神聖，而明確的表示了天皇中心國家與其國家中之國民的關係。這憲法中，與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中的精神以及「日本書紀」「律令」中所表現的精神相似之處，極爲明確。於是舊的日本在追求理想與尊重傳統之中，整頓着新的現實，以有力的步伐，開始了去往新世界的前進。這是使明治時代發展的根本原因。

歐美的優秀文化，在強化舊而猶新的日本傳統上，曾有極大的貢獻，而引導日本愈爲前進而追求其理想。關於此點，當支那事變正在進行中的今日，我們日本人是猶能充分認識出來的。「天皇陛下萬歲」一語，能被戰線中的兵士或守衛後防的我們，勿論男女老幼，都齊聲舉手而從心中感激高呼，其根據即在於此。而在這混沌的世界現狀之下，日本能有無限發展的未來的理由，也在於此。此事，對於真正理解日本歷史特質的人，既非神祕，更非奇異。





## 第二部 日本歷史的傳統與現實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理想

日本的國旗象徵着昇到半空的太陽。古代日本人雖曾極端崇拜太陽，而將太陽神格化起來的，却是天照大神。所以天照大神的子孫神武天皇，以及其後的諸天皇，始能以所謂「現人神」的人神兩重資格的姿態，統治日本國土。

「日本書紀」是當日本國民對於國家意識發生強烈的自覺時所編成的日本最古的史籍之一。該書雖分別記載着以天照大神為中心的諸神時代與神武天皇以後諸天皇的時代，我們根據該書的記載，却可窺見古代日本人所懷抱着的理想，以及他們對於現實的態度。

按「日本書紀」記述的神話，日本的肇造，乃是自然生成的。先由萬象混沌的世界中，出現了澄明的天空與凝固的大地，更出現許多具有生命的神；此等神的中心便是太陽的神，即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在高天原賜對其孫瓊瓊杵尊頒賜神勅如下：

「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爾皇孫宜就而治之，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

於是，纔成立了所謂「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的國土。

這神話明確的表示着天皇是神之子孫的理由。先有天皇然後有國家，有國家然後有國民，天皇、國家與國民是神所創造的一體的存在。這就是日本的國家理想，這種理想在模仿中國的制度當時，或吸收西歐的制度之後，還強韌的維持未渝。

對於日本神話，必須注意其中表現的日本人的氣質及精神。

後世，稱爲「神道」的日本固有宗教，原是素朴的汎神論。以宇宙有情的觀念爲基礎，以優雅與情愛爲特色。神話時代的日本人，對於日月星辰，對於引起恐怖之念的暴風雨等自然現象，對於岩石、流水或草木之類的自然物體，都附與了優雅而可愛的神性。對於自然的美麗，雖表示着纖細的性感，這是地理的環境與溫暖的氣候所影響的。草木繁茂土壤肥沃的我國國土，使其生活非常愉快，遂加深了感謝自然的觀念。原始日本人的宗教心，不是恐怖，而是感謝；宗教儀禮的目的，是爲了安慰諸神的心，而同時更贊美諸神。所以稱譽其國土爲「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也是因爲深刻的意識到環境的美麗與豐裕所致。愛好自然而同化於自然，在從來的歷史上，使國民的精神非常寬容起來，並且使他們的審美觀調和於現實的目的之中了。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神話中頗多關於海洋的故事。因此，也就發生了以爲日本民族發源地是

南海諸島的說法。然而此等關於海洋的故事，是與關於大陸的故事同時記載於「日本書紀」中的，並且該書是日本民族完成了全體統一的奈良時代所作的文獻，所以這種說法能否成立，實屬疑問。而關於人種問題，山骨格、血型、民俗或言語等方面也進行着各種研究，但是尙未見其定說。且據「日本書紀」記載，於國內方面，以大和爲中心的一個勢力與以出雲爲中心的另一個勢力之間，似乎有過某種對立或抗爭。關於此事，我們也可以解釋爲：「日本書紀」是將對於以大和爲中心的天皇的政治未能充分理解的許多勢力，全數歸入出雲之中而統一記錄下來的。所以不能視爲異民族的對立或抗爭。

據「日本書紀」所載，至繼承神武天皇之後的第十代崇神天皇，其間的九代天皇，都是納地方豪族之女爲皇后的。而崇神天皇以後諸天皇的皇后，則幾乎全是皇族出身。此乃表示皇威的發展與諸豪族之間有過密切的關係。崇神天皇更由原來供奉在宮中的御鏡、御劍及御勾玉三種神器之中，特將御鏡及御劍遷迎至大和的笠縫邑，在宮中供奉了新造的鏡與劍。供奉這御鏡的地方便是所謂「賢所」。而第十一代垂仁天皇的皇女倭姬命，更親詣天照大神鎮攝之地於伊勢的五十鈴川河畔，而齋祭了大神。此皆足以說明天照大神成爲被尊仰爲國民全體之祖神的經過。天照大神鎮攝之所在地，即是皇大神宮。這時供奉在皇大神宮中的御劍，後來日本武尊携其出發東征，武尊薨逝之後，其妃

宮寶媛便將這御劍供奉在熱田神宮了。

崇神天皇派遣四員皇族爲將軍赴國內的四道，並制定租稅的制度，而鞏固了國家的基礎。繼於第十三代成務天皇時，登用各地方有力的豪族，使其執掌國務，遂漸將皇威伸張於國土的全面。崇神天皇以後的「日本書紀」的記載，就說明着皇威漸次增大的經過。到第二十代安康天皇前後的期間，還蒐收記載着許多豪族的系譜。此即表明皇威的增大與諸豪族間有過密切的關係。因此也可以推知：此等豪族的子孫，在「日本書紀」完成的時期，已各自擔當着國家的重要政務了。

自安康天皇前後起，尤堪注意者：其一：即爲與中國及朝鮮本島的接觸愈趨密切，此外則是皇室直接轄領的「屯倉」數的增加。這事實表示着日本的理想與現實漸見一致。第十四代仲哀天皇時代，神功皇后會遠征朝鮮半島，自是以後，因爲從亞細亞大陸航來者的增加，整個的文化顯著的發展起來；在這種國家的發展中，皇室是永遠立於主動的地位的。「屯倉」增加的意義也在於此。如此，國家的體制漸形整頓，及至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時代，英明的聖德太子出現，文明更見興盛；僅由現在奈良郊外存留的法隆寺的建築上，即可窺知其文明的一斑。此時，日本國家已完成了新的統一，又復一再擴張以後，就產生了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的大化革新。

關於大化革新以及其後的歷史，謏諸次講敘述。以下，在本講中，略述革新以前的社會組織與一

般文化。唯因史料極屬缺乏，按年代來考察發展的經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得將基準置於距革新前不遠的時代狀態上。

大化革新之前，國民間的貧富懸殊非常激劇。一方面是擁有廣袤的土地的人，另一方是寸土皆無的人。土地是當時的唯一財產，並且從事耕種的人也附屬於土地之上。所以，改革這種不公平的狀態而刷新社會的秩序，就是大化改新的主要目標。普通以為大化以前的時代是氏族制度的社會，那是有失正確的。「日本書紀」記載對象中的時代，便是天皇中心國家走向統一階段的過程。天皇的統治之下，有勢力雄厚的氏族，對各氏族的首領「氏上」均賜與所謂「カバネ」（姓）的尊稱。「カバネ」分爲臣・連・直・首・造等，各有其特殊的職業。元來，氏族制度是具有同一祖先而以相同的血統所結合的一個共同體。然而上述的諸氏族却屬於天皇統治之下，而由天皇授與「カバネ」。並且他們更各領有所謂「カキベ」（部曲）的勞動者與所謂「ヌヒ」（奴婢）的奴隸；而且，他們之中，更有了私有廣袤的土地與此等人民的人。所以其組織已與元來的氏族制度，性質完全不同。

在天皇的統治之下，有由天皇賜與「カバネ」的集團；此等集團漸次以強固的統一爲目標而進行的過程，也就是日本在國家形態上的成長過程。也可以說是日本古代史的特質，即存在於此種社會

組織之中。

「カキベ」附屬於氏，以其氏之名稱呼爲「中臣部」或「物部」等。由全體論來：雖係從事農耕；其中的一部却從事於特殊的產業。例如：造勾玉的「玉造部」，養鷹的「鷹甘部」，監視山林的「山守部」，造酒的「酒部」之類。然而，這種按職業種類而稱呼的「カキベ」，多是直屬於天皇的「カキベ」。此外，富裕而有勢力的氏之首領，大約也都私有許多「カキベ」。

上述具有各種職業的「カキベ」的成立，由於中國人及朝鮮人頻繁不絕的移來，更見促進起來。應神天皇時代以來，有許多具有各種技術的朝鮮人與中國人渡海前來。他們受了皇室的優厚之待遇，有的還賜與了土地及於土地上服役勞動的人民，在皇室的保護之下，更精鍊了他們的技術。此外，並無任何特別技術的渡來者也爲數不少，他們似乎也被授與了某種義務的副業。根據平安朝初期作成的「新撰姓氏錄」的記載：約占當時氏族數三分之一的七百一十氏，皆爲歸化人的子孫。此是表現古昔的時代，他們的航來是如何頻繁，以及朝廷對他們的保護是如何優厚。他們以大和爲中心，居住在攝津、河內及山城等地，即今日奈良縣及大阪府的地方，遵從着朝廷的命令，從事於各種文化工作。或掘池築堤促進農業的進步，或貢獻於工藝、繪畫及音樂之類文化的發達。其中傳佈文字與用文字記事的方法，以及傳佈佛教，乃是最大的貢獻。因此，日本文化獲得了顯著的發達進步，遂產生了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以及法隆寺之伽藍等所代表的飛鳥時代之文化。表明着日

本之理想而同時傳述着當時之事實的「日本書紀」，也是在從此時代至奈良朝之間編成的。

翻閱古代的日本歷史，在表面上，一切文化似乎都是由於外國人的歸化以及他們的努力所造成的。然而，倘去探索其根柢與象，則其中却極明確的表現着日本人本來的態度——追求理想、尊重傳統、以不斷的進步調整現實的態度。此事，概如第二部講義中所述。

諸如前述，聖德太子曾熱心的攝取了印度及中國的文化，而從事於國家原理的確立。譬如：爲報答天皇及父母的恩惠，修造安置佛像的建築物，而稱爲「寺」等，卽其一例；這也就是具體的表現了忠孝一致的觀念。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郊外的法隆寺，都是在這種目的之下建立的。太子更由創造國家之新統一制的見地上，修制了「十七條憲法」；其中宣述謂：「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此語雖在中國亦曾屢見不鮮，但是語句中所含的內容，在中國史上却屬罕見。而在日本至今尙嚴然保守，作爲國家發展的基礎。

太子更編纂了「天皇紀」「國紀」等歷史。此書現在雖已失傳，顧名思義，定是一本闡明了天皇中心的國家歷史而昭示着日本的理想與現實的著作。太子又派遣使臣前去隋朝；以「日出國」一語，表明了日本的理想，同時更稱隋朝爲「日沒國」。當時派遣的使臣卽爲小野妹子。隨從他的僧侶與學生，均爲歸化人的子孫。這是因爲考慮了研究上的方便。他們由文運興盛的外國留學歸來，目覩日



本的現實情狀，覺察了諸氏族的跋扈，貧富懸隔的激劇，以及天皇中心的國家理想極受阻害的狀況。於是痛切的感到有刷新諸政的必要。然而，成爲這革新運動的中心而活動的，却不是歸國的歸化人之子孫，而是精通國內各種情狀的日本人。

關於這革新運動的性質及其展開，移至次講敘述。

## 第二章 國家主義的確立

走下奈良的車站，未久，我們即將來到猿澤池畔。在往觀東大寺之大佛殿的途中，可以在左方望見興福寺的五重塔。這是世界最古的木造建築。爲殿中的碩巨的大佛所驚倒的我們，繼將來如若草山麓，而參拜華麗的春日神社。在古色猶新的公園中，戲逗園內的遊鹿；至此，奈良的游歷暫告終結。若披開地圖來看，先刻所遊覽的地域，却只是奈良市東面的一部分。如果時間與金錢均有餘裕的人，更可去到郊外探訪法華寺、藥師寺及唐招提寺等，拜瞻在這許多寺中靜觀着千百年來物換星移的無數的佛像。我們面對着悠遠的古文化之斷片，對於自己過去的十幾年或幾十年的短促的一生——過去與現在，即將生出無限的感慨來。

在距今約一千二百三十年前，第四十三代元明天皇奠都於奈良時，這多數寺院的所在地，包括

着現在已成爲郊外之一切部分的地域，即較現在的奈良市約大數十倍的地域，均曾爲帝都奈良的領域。

現在奈良市東北隅的東大寺，即是表示在帝都東方之寺院的意思；與此相對者爲西大寺。東大寺與西大寺相距有四公里，約在這兩寺的中央——現在法隆寺的稍偏西方的地方，即爲皇宮。

從西大寺附近南去五公里，至現在的那山北方爲止，均爲帝都奈良以內的地域。

這帝都恰如今日所見的京都一樣，闢有一條·二條·三條·四條·五條至九條的九條寬大的道路。都城區分爲左右兩京，皇宮占兩京的北部；兩京之中，各自鋪設着數條南北的大路。

對於在一千二百年餘年前的古昔竟能建設如此宏大的帝都，我們實抱有驚疑之感。而根據過去的研究，勿論在遺跡上或文獻上，這廣大的帝都曾在亘七十年之久，乃是極其明確的事實。在這期間，這帝都成了絢爛的文化中心，向周圍的地方放射着光彩。我們現在拜瞻了那碩巨的大佛，以及現在正倉院保存着的極其優秀的工藝品，非常感覺驚異；同時，更可藉以明確的窺見當時的文明，並使我們想像到創造此等文物的時代之力量。即使在今日不能親見帝都時代的奈良，我們却可以理解到那時代的詩人所吟歌的心境與當時的現實；歌曰：

### 奈良帝城花似錦

芬芳千古到如今

建都奈良的時代，雖有遜於明治維新以後的時代，却也是日本顯示了國家形態上最堅強的統一之時代。宣揚日本的理想而記述着反映此種理想之現實的「日本書紀」及「古事記」，就是在這時代完成的。蒐集許多人間情感自由流露的歌詞而為強韌的國家意識所統一的「萬葉集」，也是奈良時代的產物。

現在我們只若花費有限的參觀費，即可以拜觀大佛。但是我們須要知道：在奈良尚為帝都的一千二百年前的往昔，這大佛乃是我們祖先傳來的「神」的姿態，而象徵着反映天皇——「神」之子孫——所統治的日本國民之總意的國家意識。較之在現在的情況下拜觀，其意義完全不同。我們如果知道這碩巨的佛像的建造，即以今日的技术鑄造也是艱難的大事業；而匯集着當時東西文明的正倉院之工藝品，是如何蒙受朝廷的保護而產生出來的，也就可以想像出以這朝廷為中心的國家權力是如何龐大了。更可以理解帝都奈良是這偉大的國家權力的發動結果，而決不是遊離當時之現實的紙上計劃。

所以我們對於這強大的國家權力的成長基礎，必須從較前的時代來加以研究。於是最重要的問題，當然就是大化革新的性質。不過這問題非常重大，而且極其複雜，在僅少的時間之內，詳細的論述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略述特別值得注意的三三點及這改革氣運的動態。所以以此為問題而討論者，乃是因為奈良都城的光榮與繁盛實是這改革的收穫與果實。

奠都奈良距今恰爲一千二百三十年前，卽元明天皇和銅三年（紀元一千三百七十年）。先此六十五年，卽孝德天皇大化二年（紀元一千三百六年），便斷行了所謂大化革新。

我在前講中已經述及聖德太子曾明示了許多改革方針。太子於「十七條憲法」中已示其一端，更派遣使者小野妹子前往中國，使者親覩隋朝政府的統制整然的政治形態；歸國之後，對於日本的狀態——或擁有巨富，或一無所有的貧富懸殊過於激劇的狀態，痛感到實有取鑑日本古來的理想而斷行改革的必要。所謂日本理想，就是天皇中心的統一國家的進展。然而，當時的實際情狀，頗與此種理想背馳，所以其改革勢必假藉某種形式而具體化了。

爲適應移動演變的時代要求而增進國力，全體的社會組織不得不重新建設在更堅固的新基礎之上。太子薨去之後，此事漸漸趨於實現。但其改革計劃無論在規模上或範圍上，其性質均與現實有所遊離；倘若照樣實現，其性質會完全改變了當時之社會的、經濟的或政治的組織。但是隨諸改革的進行，並不如由手段上所想像者得以急速進展，甚或反倒招來了與原來的目的相反的結果。然而這改革產生出涉及廣泛的範圍的結果，却築造了未來的燦爛時代之基礎。

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設天皇中心的強力的中央集權國家。第一妨害這目的者，就是蘇我氏一族的存在。蘇我氏一族隨着他們的權力增加，漸次萌生了掌握政治實權的野心。於是革新的目標愈趨顯明時，打倒蘇我氏便成了準備實現這改革的必要事項。因之，在改革的第一步上，便斷行打倒蘇我

氏。這是中大皇兒子藉中臣鎌足的助力而斷行的。唯蘇我氏雖已滅亡，而其他有力的豪族却依然各自占據着離今日法隆寺稍南的地域。並且因爲皇宮也在該地，新的改革方針必須在其他的方面發表了。所以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遂將帝都遷至今日的大阪，即當時呼作難波的地方，而將這海陸雙方多有便利的地方，選作了新政治的中心。

改革的目的是整備以朝廷爲中心的國家體制。當時，日本的社會上缺乏統制，國家組織也極不完全。

許多豪族私有着土地以及於其土地上勞作的人民——部曲，那種狀態實有違反以天皇中心爲理想的政治原理。因之，改革上的第一項事業，便是將全國土地及勞作於此等土地的人民，全部置於朝廷的統制之下。然而這種根本的改革，實非易事，若不假藉從來在各地占有勢力的豪族來援助，是不易成功的。於是孝德天皇爲使豪族們徹底理解這改革的宗旨，就採用了必要而有效的方法。即委任他們爲國家之官員，使他們以政府官員的資格來行使他們從來所享有的權力，將從來得自私有土地的收入，改爲國家俸祿而給與之，更徵收其一部分作爲對於國家的租稅。如此，從來由朝廷賜與力バネ的「氏之首領」，均按其私有土地的面積，與以適當的地位而充當了國家官吏。更在中央設置八省百官。所謂八省及百官者，性質究竟如何，因爲缺乏史料，不得其詳；但是從來的社會——即以大小各種氏族爲單位的社會，又被重新組織成爲新的形式，却是明顯的事實。於是，從來概屬世襲

的豪族地位，形成了各按其才而論的端緒，更開闢了登用人材的路徑。

其次，在行政上分全國爲三個地域。第一：將帝都所在地，定爲京師；第二：將播摩（現在的兵庫縣）以東及伊賀（現在的三重縣之一部）以西，定爲畿內；第三：將其餘地域，定爲地方。畿內及地方，各有國、郡及里三個區劃。國中置國司，郡中置郡司，里中置里長。里長以下有構成一村的五十戶民家，稱一戶之長爲戶主。五戶聚爲「保」，稱其長爲「保長」。這就是所謂「五保制」，乃是新的社會的政治的組織基礎。

大化革新目的，由於企圖完成金字塔形——自戶而至保·里·郡·國——的國家制度的努力上，即可窺知。

於茲，最堪注目的，是被委任爲新國司及郡司的人在改革以前的身分。國司概爲由從來的廷臣中所選任而派赴各地者；郡司概爲由各地從來位於國造之地位的人們——即在地方豪族中，曾被朝廷賜與了姓的人們——之中，採用了對於新時代特別具有理解的人。這是爲使在各地從來擔當實際行政的人，來執行新政府的方針；而更使廷臣出身的國司來統制他們的意思。

其次，值得注意者，是將全國的私有地，完全改作了國家的公有地。將整個的土地，按一定的面積，每隔六年一次，平均分配於人民；遇有死亡及其他情形，暫時移歸國家所有而再行分配。這整然的組織固然不能認爲得以圓滿運用，而這規定却造成了租稅及戶籍制度的基礎。租稅制度的說

明，需要頗多的時間，僅以下文數句爲止。其分爲三種：以米穀來完納的「租」；以一年之中的若干日爲國家服務勞動的「庸」；以地方物產、農產物及其他物品完納的「調」。

以上，我概述了改革的大要。然而，一舉確立此種嚴格的行政組織，是不可能的。概如前文所見，頒發大化革新勅詔的當時，情勢既已成熟，社會的發達已向要求改革的新方向驀進不已。革新佈告即指示了此種方向，同時更向新組織邁進了一步。其後，隨諸天智天皇的近江令及文武天皇的大寶令等制度的制定，日本之社會的、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漸次實現了明確的組織形態。在此期間內，即自大化改革至約五十年後制定大寶律令的期間內，改新政治也與最初的豫想大異其趣。然而這也是事實上所不得已的。

這改革的能否成功，端賴國司郡司等官員的努力。而爲使官員努力，必須優厚的待遇他們。優厚待遇他們的方法，就是按其努力的程度，以某種名目給與他們土地。例如：按其他位所授與的位田，以及按其功勞所授與的功田之類。關於此事，在廢止全國私有土地而全部收歸公有的方針上論來，正走着相反的方向。但是如不實行這相反的方針，是不能舉得改革之實績的。因之，爲了完成中央集權國家的最初目的，隨諸改革的前進，實際的結果與最初的計劃之間，就有了頗大的距離。即土地公有的方針愈見具體化，對於最能遵守此種方針的人們，所被授與的位田及功田等私有地也就愈見增多。例如：身當改革之衝的中臣鎌足，賜姓藤原以後，便立即按其功勞授與了土地。土地

的私有，因為藤原氏造成了極大的發展結果。

所以，大化革新使從來的大氏族的一部沒落下去，同時更使其他一部分人獲得了較前更大的權力，在朝廷的支配之下，便造出了新的支配階級。所以，收到改新政治之效果的結果，遂完成了中央集權，社會組織也略得改革，更制定了大寶律令，當第四十三代元明天皇建都奈良時，這種新狀態也騰進起來。當這種情勢進展的期間，帝都屢屢遷移；實具有特別的意義。

發表大化改新宣言的當時，帝都尚在難波（現在的大阪），此事已於前文述畢。但從來占據在飛鳥地方的豪族們，却不會輕易遷往難波。因之，約在十年之後，都城遂又遷回飛鳥地方。天智天皇又遷都至近江的大津，纔頒佈了近江令。其後，天武天皇還都飛鳥，而持統天皇復又將都城遷往藤原宮，圍繞着皇宮建造了規模頗大的帝都。文武天皇頒佈大寶律令，就在這個都城。由於此等事實，可以窺知針對着以維持現狀的各氏族，朝廷的態度是進取的，而始終以打破現狀為目標。繼而元明天皇遂自藤原宮遷都奈良，在該地建設了宏大的帝都。

堅強主張遷都奈良者，是大化革新時最活躍的藤原鎌足之子不比等。藤原氏參加大化革新，削弱了從來的諸豪之勢力；藉諸遷都奈良，更壓倒了其餘的許多勢力。其後，在帝都置於此地的整個時代，便造成了堅固的勢力。不比等輔佐舍人親王，藉其努力將「日本書紀」編纂成功，以之明示了日本國家的原理等情，概如前文所述。



不比等與遷都奈良的關係，以及奈良與藤原氏的關係，由藤原氏之家廟春日神社座落在奈良形勝之地若草山麓的事實上觀之，即可明瞭。

在「日本書紀」完成的時候，頒佈了將大寶律令加以若干修正而成的養老律令，這養老律令充分的表示着大化革新的目的已得具體化。數年之後，竟又頒佈了允許開墾土地者私有其土地的法令。私有土地的官許，完全違反改新政治的目的。助長此種狀態發展的，非僅限於官吏之間。大化改新之後，朝廷爲普及天皇中心主義的政治思想，派遣朝廷所屬的僧侶前赴地方，講勸經典——例如佛典中適於闡明日本國家原理的「金光明經」之類；結果頗有所貢獻於改新政治的進展。然而，此等身兼官吏性質的僧侶，以及受朝廷的優厚保護而建立的寺院，也私有了許多土地。由於此等僧侶以及官吏的關係，便生出來了改新政治愈見進展愈與改新政治之目標相反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之下，第四十五代聖武天皇即位。此時，朝廷儀威極爲隆盛，國家財政非常整備，全國已經進入以朝廷爲中心的鞏固的統一狀態。在全國各地，設有宣揚國家方針的國分寺及國分尼寺，在奈良建築了統制全國各國分寺的東大寺。同時，更完成了日本之信仰中心的大佛。佛教的經典中，說論國家主義之確立的乃是「華嚴經」，大佛卽不外是此種教理的具體表現。聖武天皇在大佛之前，自稱爲「三寶之奴」。所謂三寶是指佛、法及僧而言。但天皇對此而生的崇敬，却具有特

別的國家意義。乃是在重尊日本的理想與傳統而崇敬古來之「神」的意義上，崇敬着這象徵永久之繁榮的佛像的。

聖武天皇藉佛教實現對於日本國土及其國民的深厚之情愛。結果，當然優厚的保護了佛教，遂致寺院的所有土地漸次增大起來。同時，因為皇后是藤原不比等之女，藤氏的廷臣地位也愈見提高。以朝廷爲中心，新貴族階級——廷臣——及寺院之間，遂產出了絢爛的文化之花。帝都奈良出現了宮殿、官衙、官邸、倉庫、穀倉及寺院堂塔等完美的建築。奈良象徵了我國文明的開花期與國民主義的誕生。

刺戟這絢爛的奈良文化之發展的，也是因爲當時對於正達最盛時代之中國的接觸。自大化革新前後，派遣所謂遣唐使的政府使臣前去中國，直接接觸大陸的新文化。中國方面以答禮的意義，也派來了使臣。

國際的交往自此開始，給與我國文化發展以新的刺戟，結果便增加了奈良文化的優美。當時的中國正與印度及波斯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藉諸此等西方國家，更接近了歐羅巴及羅馬文明。因之，世界各國的文明均集滙於首都長安，而渡海傳入日本，成了使奈良文化發展的要素；現在我們籍諸所謂正倉院御物而保存未失的當代的諸多工藝品，頗能想像出當時朝廷或貴族生活及的文化會是如何壯麗。至於此等作品是由中國輸入的，還是模倣中國的工藝技術而在日本製造的，却難於判斷。大

約一部分是從中國運來，其餘大部分是在日本製作的。裝璜美麗的樂器及屏風，織工精巧的絨氈等寶貴什物，經過千年以上的歲月，猶保存着昔日的原形而收藏於倉中，我們目覩此等御物的精美，不禁感到驚訝。同時，對於在一千年以上的漫長歲月中，其間縱有兵亂的時代，此等寶物竟能謹慎保存未失，猶當驚嘆不已。由於此等事實，我們也可窺見我們民族尊重天皇中心國家的原理及其傳統的態度。

得知我們朝廷及貴族社會之優雅生活的中國商人，漸見大批渡海來到我國，有時較諸我國派遣的遣唐使，猶促進了更多的關係。遣唐使短則五年，長則三十年始派遣一次，對於上層社會的奢侈生活所需要的大陸輸入物品，是不能圓滿供給的。最初由朝鮮商人將中國商品運來供給日本，隨諸貿易的增加，中國的貿易商人也直接航來日本了。同時，日本的商人也實行渡往大陸。結果，九州政治中心地的大宰府的外港博多，竟成爲外國貿易的中心地而日見繁昌，貿易商館發達起來，不但中國物資，即遠隔重洋的印度及阿拉伯等國家的物品，也由此等地方輸入我國。聖武天皇時代以後，與今日滿洲國北部地方的渤海國開始接觸，船載着當地物產的特派使節，曾屢次由該國前來朝謁。

受了接觸外國的刺戟，國內的產業也發達起來。奈良都城中的東西兩面，開設了周圍幾占半公里方圓的市場；一日之中，交易着百四十五貫——約抵今日貨幣之三千圓——的布·藥·香料·薪·

華·紙·果實·野菜·酒·鹽·砂糖，醬·米·麥·大豆及香油等。地方上也出現了規模較小的市場。根據在此等市場上所交易的商品的性質，我們也可以想像出當時的產業狀況。應乎此等情勢，鑄造了銀貨與銅貨，後來却只流通了銅貨。最初的銅錢，採取發現銅之當時的年號「和銅」（紀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而稱作「和銅開珍」，其後又繼續十一次，共鑄造了十二種銅錢。這時代的貨幣流通，與其說是具有商業的性質，勿寧說含有更多的政治性質。只有中央政府勢力所達到的地方流通着貨幣，唯隨諸私有土地的增大，貨幣的流通却漸趨困難了。貨幣真正在鞏固的商業基礎上得以流通，却是在其後的時代——京都成爲中心的時代的末期。此事將移諸後文講述。

隨諸國內政治組織的整頓，中央以及地方的各種文物的發達也有了可觀的成績。在奈良建立了「太學」，地方的各國也有了所謂「國學」的學校，登用人材的路徑也見開闢。此等學校專行培養政務執行上所需要的官吏。地方的各國編纂了所謂「風土記」的各地記錄，將關於風土的、傳說的以及歷史的資料獻上朝廷。其中的一部分，如出雲風土記及常陸風土記等，今日尙殘存未失。由於聖武天皇的皇后光明皇后的慈意，也有了慈善事業的設施。例如：對於病人的施藥院，救濟貧民的悲田院等即是。爲預防飢饉，更建立了蓄積食糧的倉庫。在這時期中，以東大寺爲中心的寺院的地位，及以藤原爲中心的官吏的地位，也見確立起來。他們經營着獨立的生活，這是因爲他們私有着廣大的土地而可以得到豐富的收入的關係。藤原氏與朝廷保持着緊密的關係，而確立了自己的權

力；藤原氏以外的官吏，有許多因為在帝都沒有進取的帝望，都轉任到地方去。後文將有所闡明，距此數百年以後所崛起的武士階級的人們，幾乎都是此等人們的子孫。

僧侶在思想方面的活動，也有了可觀的成績。猶其與朝廷有密切關係的僧侶，輸入了種種新宗派，而從學問的立場加以研究。如法相、三輪、華嚴、俱舍、成實及律等宗派，這種傾向極為顯著。此等宗教對於文化發達的貢獻雖然不少，唯因過於趨乎哲理的研究，不免往往產生出意外的結果來，因為佛教的教理之中，潛藏着產生違反日本理想及政治傳統——天皇為絕對之存在——的觀念要素。因而對於宣揚國家原理盡過巨大任務的佛教，稍一不慎即走向阻碍其原理而妨害其發展的傾向。蒙受國家的優厚保護的僧侶們，為這種觀念所影響，終於出現了例如道鏡之類懷有政治野心的枉法的僧侶。

對於天皇中心理想的國家傳統，因為在帝都奈良發生了此種不祥事件，為脫避此種弊害，都城便遷往長岡了；未久，又徙至京都——平安京，奈良便成爲一個寺院的都城，遺留給僧侶們了。

以上，我略述了自大化革新前後，包含奈良朝的時代情勢之推移。於茲，必須注目的是：在這時代中，編纂了明示日本國家原理的「日本書紀」，而具體化這原理的文化也有了進展。蓋儼存於現代日本的國家的原理，遠在一千二百年前的古代既已確立，更約束了日本之燦爛的將來，這是不可或忘的事實。實在也可以說日本的特色即在於此。

奈良朝是政治發達、文化覺醒而宗教繁榮的時代。我們在本講中離開這時代，移入平安時代；至於平安時代的狀態，先是新的進步，次爲爛熟，末期則爲頹廢。

### 第三章 榮華生活的展開

訪問明治維新以前千年間的帝都而如今成了舊都的京都，人們來到該地，接觸了充滿日本風之纖細的風景，自然便會感到心意的柔和。屹然立於中空的不規則而優美的輪廓，以及形成爲這舊都之背景的群山，頗令人生出佛經中極樂淨土的美感來。無論是東部日本諸山的峻急，宛如阿爾卑斯的中部日本的連山的豪放，或此外其他地方的諸山，均不及京都的東山或北山的端麗典雅。在寂靜的周圍，不斷的注入着新生命的清冽的河流。在鮮綠色中隱顯着的堂塔。融合着自然而表示日本文化的歷史遺物。我們遊歷京都及其附近時，感到宛然如在大博物館中。一步一步往前行走之中，過去一千年間的歷史紀念物，像帕諾拉瑪 (Panorama) 畫一樣展開，日本文化的種種發展過程便現動於目前。南去京都不遠的宇治川河畔，有平等院的鳳凰堂、在該地可以懷想貴族們享受豪華生活的平安時代。到京都市東南的三十三間堂，更可懷想武士階級爲日本之進展而崛興的鎌倉時代。室町貴族之華麗別莊的金閣與銀閣，具有幾經洗練的單純之建築樣式而顯示桃山時代之一的飛雲

關，江戶時代昇平期間產生的智恩院與東西本願寺的大伽藍，表示明治以後攝取西洋文明時代的鐵筋混凝土的建築物，或以象徵未來的奇特繪畫籠罩着建築物全體的朝日新聞社支局，此等形象均各自代表着各自的時代，且在全體上與四面的優雅風景互相融合着。

圍繞着這極樂淨土般的景色而方圓僅有數哩的市街中，我們可以像展開畫軸似的瞻視到過去一千年間的歷史。

平安朝時代最有生彩的文學作品之一，是紫式部妙筆下的「源氏物語」。以這小說作爲根據來論，平安京的生活宛如其地理的背景一樣，或者更遠過之無不及，是極其豐滿而優雅的。貴族們以爲這都城中的生活，就是他們的生活全部。居於今日我們在平等院鳳凰堂所見的高雅邸宅中的此等人士，曾修築美麗的庭園——這是自然景物的縮圖——於其周圍。而爲後來成爲日本藝術中最有特色的造園術開了先河。

紫式部用信心所至的圓熟的筆致，如實的描繪出這狹小而優美的平安貴族的生活。穿着進遞的長裾的十二單衣，或身披薰過遠從波斯輸入之高貴香料的華服的貴婦人們，刮落之後再畫上美麗的眉毛，唇際塗着朱紅的脂肪，蓬鬆的黑髮長長的垂在頭後。她們出門時，乘着以山河內等南方地方輸入的檳榔子或其他高貴木材製造的香車；寒冷的夜中，身披着由蒙古的嚴寒地帶輸入的黑貂皮衣，

而點着高貴的香料。這皮衣稱作黑貂裘。當時非常講究，規定官位以下的人，甚至頗下勅令禁止穿用。

此等人們的服裝極其美麗，他們將服裝看作人生上最重要的一事。他們與善好原色的中國人不同，混合了各樣顏色，研究着表現出輕軟纖細的感覺來，促進了世界無比的優秀的染色術。用多數的彩色與花樣將女性的服裝縫綴得極其華麗的風氣，也是從這時代以後所開始的。

平安京的夜有着無限的浪漫味。將薰滿香料的郁息的艷書，縛到梅枝上而往來傳遞，耽溺陶醉在瑣碎無端的情事之中。消愁解悶時，作着歌合、雙六或圍碁等各種遊戲。男子是運動家，或蹴鞠或打球（自波斯經中國傳入的球戲）來尋樂趣。月夜中在河川或池塘上搖着龍頭鷁尾的畫舫，奏着清美的音樂，而狂樂達旦。

這種貴族社會自體形成着一個小社會，只是專心一意的追究美術與文學；機伶的發覺到一首歌的拙點，或色彩調和的惡劣，或遭無聊的小事的成功，就要津津自喜男子與女子的生活，就在此等事件之中，享樂着夢一般的瞬間。他們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在這世界以外，並沒有別的世界了所致。「源氏物語」「古今集」「枕草子」等古典，都是從這種過着有閑的奢侈生活的環境中產生的。

然而，這並不是日本的全部。我們所見的，僅是平安京極其狹隘的華麗的一面。平安京中還有貴



族以外的世界。至於平安京以外的地方上的情形，便迥乎不同了。

支持平安京貴族們過着如此豪華生活，其經濟的或社會的基礎是什麼呢？現在爲了理解我所要述說的時代，首先應該注意此點。

第一，我要說明現在所講的百年間的時代，其名稱所以稱爲「平安」的問題。

所謂平安，是表示太平的熟語。所以在顧名思義之下，這個時代却也給人以平與安泰之時代的印象。這個時代的文學傑作「古今集」「竹取物語」「蜻蛉日記」等，以及問世較遲的「源氏物語」等，均是描寫各種和平生活情況的作品，而實證着這種印象。因之，我們披讀這時代的文學作品，愈爲其魅力所引誘，便愈覺得這個時代有如其名所示是平安的了。

「平安」的名稱，當然，是根據紀元一千四百五十四年奠都於此的「平安京」之名稱而來的。然而爲這帝都及其輝煌的時代，給與了意爲平和及安泰的「平安」之名稱的歷史上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前講已經述及紀元一千三百六年所斷行的大化革新，是開拓了天皇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體長基礎

的革新。爲整備此種國家組織，官吏與僧侶都盡過重要任務的事實，概如前文所示。在他們的指導之下，繼續努力確立了中央集權，出現了人所周知的「天平時代」——由天平的年號而來者——的燦爛的文化時代；這期間，因於對於國家的功勞，官僚與僧侶階級均被允許私有了廣大的土地。唯自天平時代以後，這兩個有力的階級之間，因爲政治見解而生出了爭峙，終於表面上現出了明確的對立狀態來。具有鞏固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特權的僧侶階級，雖會藉佛教來普及國家的政治理想，而對國家有過許多供獻；如今却來干涉政治的內部了。結果，甚至出現了道鏡之類作出違叛日本理想及傳統之行動的人。由此種情勢所釀成的社會不安，在支配階級之間猶其擴大未止。於是爲從政治圈內逐除僧侶而使他們僅僅去作宗教上的使徒，就將奈良作爲寺院的都城留給他們，於紀元一千四百四十四年遷都長岡，以期更有效果的完成這個目的。十年之後，帝都復遷至京都。遷都後，朝廷的意圖是想藉官吏振興國家的政治，未料當時有力的官吏，幾乎全歸於藤原氏一族了。

日本之政治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新中心的平安京，未久即出現了文化的燦爛時代。平安京在明治維新以前的一千七十五年之間，雖會始終爲帝都盛地，而歷史家所以特意稱爲「平安時代」者，是指最初的四百年間而言。但是在這四百年間，却未能是名符其實的和平而安泰的時代。

現在我在有限的時間中，來講述這四百年的歷史；時間的短促是困難之一；而缺乏關於這時代後半的重要文獻，更屬困難之極。至紀元一千五百四十七年爲止，有所謂「六國史」者，是當時政府

所編纂的正史；但其後却僅有貴族們的日記或一家一門的歷史之類的斷片文獻。想來明瞭的描寫這個時代，實屬困難。

我想先來講述在這時代掌握最大政治勢力的藤原氏一門的權勢之擴大及其意義，其次來講述關於形成爲其基礎的莊園之發達，而再講述因這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所發生的種種事態。最後來講述藝術、文學及宗教等方面的新發達。

大化革新之後，在此次改革中樹立功勞的藤原氏，便昇到了政治上非常有勢力的地位。藤原鎌足之子不比等，是主張創立奈良都城最力的一人，更輔佐舍人親王編纂了日本第一部官撰歷史「日本書紀」。當都城自奈良遷至長岡，復自長岡遷往平安京時，在這運動背後，當然有藤原氏的勢力。

遷都平安之七十年後，鎌足之第六代孫良房，因天皇年幼，遂授命爲攝政而任奉當時年甫八歲的清和天皇，天皇的御母是他的女嗣。其子基經也同樣因陽成天皇年幼而任命爲攝政；其後，宇多天皇雖會親身聽政，他依然作爲關白而參與政務。攝政關白的地位，在理解這時代政治的性格上，是最值得注目的；藤原氏之所以能把握權力者，全因爲如此與皇室維持着密切的關係使然。其實，藤原氏在數代之中，都將女兒納入宮中，而身爲皇室的外戚；及至基經位至攝政關白的時期，當然能把握了罕固不移的政治權力。然而於此猶堪注意者，是攝政關白雖然掌握了政治上的實權，或者他

們一門藉諸血緣而得與皇室牢固的結合，但皇室的尊嚴却是絕對不動的。攝政關白僅能輔翼天皇的政治而已。若在外國有與此類同的情形，具有藤原氏那樣權力的人，一定要推倒最高支配者，顛覆其至上權，而自身來作君主；這乃是慣見的常例。然而天皇的尊嚴絕對不可侵犯的原理，在任何情勢之下均能擁護不犯，乃是日本歷史的最顯著的特質；我們從攝政關白的性質中即能窺見這種重要的特質。

藤原氏的勢力曾經如何，試觀「日本書紀」以後的六部正史——即所謂「六國史」，其編纂完全出自該族之手的事實，即可明瞭。不比等輔佐舍人親王編纂了「日本書紀」，其後，於紀元一千四百五十七年（桓武天皇延曆十六年），更完成了「續日本紀」四十卷——此書由紀元一千三百五十七年（文武天皇即位之年）開始記述；其次，不比等之第四代孫冬嗣，於紀元一千五百年（仁明天皇承和七年），編纂了「日本後記」四十卷；紀元一千五百二十九年（清和天皇貞觀十一年），由最後授命爲藤原氏攝政的冬嗣之子良房，編纂了「續日本後記」；紀元一千五百三十九年（陽成天皇元慶三年），基經編纂了「文德實錄」十卷；繼於紀元一千五百六十一年（醍醐天皇延喜元年）由基經之子時平監修，編纂了「三代實錄」五十卷。

國史的編纂，以「三代實錄」爲最後而終止；披閱六國史的任何部分，其中所反映的，與其說是藤原氏勢力的成長與發展，勿寧說是反映着大化革新以來天皇中心中央集權的擴充。同時，與此恰

正相反的傾向，是官吏私有土地的顯著的增加。蓋近江令、大寶令及養老令等法典陸續制定，政治組織雖得漸次擴張強化，而不納租稅的私有土地却也增加起來。此等領地稱作莊園，全賴由項所得的收入，支持着「不在地主」的官吏，在平安京中度過有閑的奢侈的安樂生活。此等官吏各按其官位，許可私有着廣大的土地，此等官吏之中最有力的即為藤原氏。當然藤原氏一門所有的莊園，較諸他諸氏，更占着廣大的面積。在這鞏固的經濟基礎上，藤原氏在平安京中便度着豪華的生活。他們一門的榮華富貴，至基經的四代孫道長時，遂達於頂點。以「榮華物語」之名稱，所記述的藤原氏的繁華歷史，起始於基經時代，而主要的描寫着道長時代。建立平等院的別莊於宇治川畔的，是道長之子賴通。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之內容的中心，也是以道長至賴通時代的藤原氏為中心而展開的貴族生活狀態。不僅文學作品，即根據前述的「榮華物語」或「大鏡」等這絢爛時代的歷史書籍，也可以詳細的知道：當時的貴族們度着如何富麗的生活，他們喜尚奢華，為了滿足紙迷金醉的趣味，又曾如何無厭的渴求着珍奇昂貴的舶來品。足以使人理解宮廷生活之各方面情形的斷片的記載，在許多貴族中，猶其在藤原氏遺留的趣味濃厚的日記中，如道長的「御堂關白記」、實資的「小右記」、宗忠的「中右記」及賴長的「台記」之中，也可窺其一端。

關於藤原氏的勢力及以該氏為中心而展開的宮廷生活，暫以上文的簡單敘述，僅描寫其幅廊為止；其次，再來觀察平安京貴族生活的經濟背景。

平安京貴族們所有的莊園，占着廣大的面積，全國到處皆是。隨諸領地的漸次擴大及其收入的增加，他們的生活便愈奢侈豪華起來。

莊園的所有者，當時稱作「本家」或「領家」，他們設置了「政所」，用作管理領地收入的辦事處。更按置了監督莊園勞動者的代理人。此等莊園的土地，有的是因元來有功國家，或按其官位由政府授給的官祿或津貼，有的是自己開墾的土地。自奈良時代，政府對於開墾新土地的人，承認其於一定期間內私有其土地，以此方法獎勵開墾，增加國內的生產力，更由其收入中徵收一定額數的租稅；而此等土地也漸次變為不能作為納稅對象的莊園了。

開墾新土地需要多數的勞力。因此大量的人口便從現在的東北地方被移住到日本中部或西部去。奈良時代以後，政府曾派遣軍隊到東北地方，屢次使該地的原始蝦夷人歸服於中央的統治之下。他們原來度着極其原始的生活，後來被領至中部日本，從事於開墾新土地的勞作，漸漸混進日本民族之中。而更將大和地方的人們遣送至東北地方，指導該地方的土地開墾，將其原始的社會融合於有秩序的中央政權之中。為逃避大陸上的動亂而投到日本的諸多歸化人，也均被用於這種目的之上了。

如此開墾耕種了全國的土地。而隨諸時勢的轉移，此等公有土地也漸次歸為貴族所有而變成了莊園。自這時期前後起，新開墾的土地，均冠上開墾者的字樣，開墾者被稱為「名主」，支配廣大土地的名主為「大名」，支配狹小的土地領主為「小名」。「名主」爲了自己守衛的必要，各自蓄養武力；後來稱作「武士」的階級，即是由這地主階級中崛起的。

各地的名主們將自己所統制的土地的收入之一部分，獻納於其土地所有者的貴族，居於中央的貴族們，因爲可以坐收莫大的收入，同時也可以過着前述的奢侈生活了。而爲了自己在京都的生活安全起見，更命令農民出身的武士們來至京都，作自己的爪牙。這件事遂引起了有力的武士階級之興起。其詳細情形，於次講中講述之。

由國家的立場論來，此種狀態是非常不健全的。大化革新以後，以中央政府之絕大的努力而造成公有地，漸漸轉化爲無稅的莊園，結果增加了對於國家統轄下的農民的租稅，他們爲忌避此等租稅，都流入私有土地去了。如此，私有土地愈加增多，國家收入遂愈減少。公有土地因爲勞働力不足的關係，均委諸荒棄，其土地當然也都漸漸變成了私有土地。政府鑑於此種情況，爲謀減輕農民的負擔，遂勵行了前代所辦理的「出舉」制度。「出舉」制度就是在春天貸給種子，秋收以後，使其加算利息而返納的方法。然而此種方法，也無力量來防止農民們移住到私有土地去。因爲此種狀

態愈見劇烈，政府遂頻行任命地方長官，有時甚至前次派走的官吏尙未到抵任地，便又有新官吏受命出發。情勢陷於非常不容樂觀的地步，朝廷方面爲慰藉人民，曾屢次派遣所謂「問民苦使」的特派使臣。奈良朝末期以後，在平安時代派往諸國充任地方官的官吏，多數留在任地，不久便成了莊園的主人。這是因爲藤原氏的勢力過於強大，在都城中幾乎沒有進取的可能而絕望的結果。從此等人們之中，產生了西日本的平化與東日本的源氏等有力的戶族。兩氏俱以皇室爲主祖。

在此種狀態之下，即便任命爲新官吏，也不能防止土地私有化的傾向。結果遂使必然的不安蔓延於整個社會。浮民與盜人屢見增加。爲預防帝都的動搖，創設了所謂「檢非違使廳」的新官衙，擔當維持治安而彈壓罪行。然而施行這警察制度以來，不安的情勢更見變本加厲。全國幾乎完全化作莊園，政府的官吏領有着廣大的土地，有力的地主則吞併着弱小的地主。

地主之中最有勢力的當然是藤原氏，不過藤原氏對於天皇的威權與尊嚴，却永遠保守着臣節。所以在這時代，天皇中心的國家性質，絲毫未曾發生變化，不過，曾經爲奈良朝時留下特徵的中央集權制，至這時代却顯然變質爲地方分權制了。

地方分權的傾向進展不已，前代以來的社會的或經濟的基礎——「律令」，已經化爲與現實社會分離的空文，所以政府頒布了類似臨時法令的「格」。與「格」併行，又規定出各種法規而稱作「式」，以「格」及「式」作爲新時代的行政標準。「式」中最有名之一爲「延喜式」。看這法規，會感覺



到是一個整然有序的社會組織。然而，因為那是從前代許多「式」中整頓出來的，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完全相反。實際上全國的莊園化實已正在進行未已。

此時，自從前代以來具有絕大勢力的寺院，也私有了廣大的莊園。在平安京中，勃興了與奈良的僧團全無關係的新僧團，他們漸次擴大其勢力，同樣占有了廣大的領地，他們的莊園可見於全國各地。此等寺院之間，盛行着加持祈禱，並且成爲貴族生活之一部而非非常流行起來。貴族們想要將那種安逸奢侈的生活，延長到死後的世界去；他們對於佛教信仰，也全是祈禱將今生的生活繼續到來世去。此種願望極爲強烈，我們試觀此等天使般的諸佛約束給他們以彼岸世界的幸福，或從極樂淨土來迎接的場面的繪畫，即能明瞭。

貴族窮奢極慾，爲將那生活延長到死後，正在忙殺加持祈禱之間，在貴族私有的莊園上，從事着十年如一日的勞動的農民們，依然信仰着姿態素朴的宗教。他們祈禱着他們此世生活的安樂，古時祖先傳來的氏神或路傍的石佛，就是他們的單純的信仰對象。

我們在平安朝中見到兩個相反的現象。其一：即是充分餘裕的貴族的世相；其二：即是貧苦的農民的面影。這種情勢將要如何變化呢？潛在於地方上的諸勢力，看清了平安京貴族們的弱點，並意識到他們自身的實力，進而踏入社會表面來角逐，已經是時日遲早的問題了。

隨諸新土地的開墾及農業生產力的增大，各地莊園中開始了分業的現象。昔日的「部曲」之子孫，承繼着祖先以來的技術，在平安朝初期，雖曾爲宮廷、貴族及社寺等服務，他們却漸次成爲獨立自主的職人，成爲技術家，往各地去販賣製造品了。管理莊園的「名主」，也向外販賣生產物的剩餘品。如此，遂促進了商業的發達，行商的數目也增多起來，以固定地域所設的市場爲中心，實行商業的活動。在帝都平安之中，也與奈良同樣，在城市東西兩方，各有一處官設市場，還有貴族或社寺經營的市場。全國到處極其發達海陸交通，博多（現在的福岡市）、難波（現在的大阪市）及北陸的敦賀等地，均成爲大商業都市而殷繁起來。爲供給商品給來往於各村之間的販賣行商人，也出現了批發商人等。

商業發達的自然結果，貨幣當然成爲商業交易上必需的媒介物。在前文中我曾述及：自奈良朝的初期至平安朝的初期之間，政府曾鑄造過十二次貨幣。然因莊園遍及全國，各莊園幾乎全是自足經濟的單位，具有共通價值的貨幣，殆乎不能流通，因此遂完全終止了貨幣的鑄造。然而隨諸國內產業及商業的勃興，通貨當然又有所必要。最初，曾使用砂金或布之類，其後鑄貨從中國輸入，而始見流通起來。

我們綜論前文所見，平安朝時代的四百年間，在奈良時代既已露出曙光的地主階級，漸次擴大了不納稅的私有地之莊園，結果遂減少了公有地。貴族與僧侶住於都城，度着窮奢極慾的生活。藤原氏當時具有最富裕而強大的勢力，將女兒納進宮中，身至攝政，任爲關白，而掌理國事。在諸國方面，後來成爲新勢力而出現的武士，已經漸漸成長爲特別的社會集團。

藤原氏的勢力雖然強盛，却未能永久繼續下去。紀元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治曆四年）後三條天皇即位，便廢去了藤原氏的關白，而躬臨大政。天皇的御母不是藤原氏出身，所以可以自由採取違反藤原氏一門之意見的舉動。天皇即位後，頒布勅旨沒收自紀元一千七百五年（寬德二年）以後的莊園土地，及從來雖有其物而無正當特許證的莊園。此種處置方法，對於在全國各處領有莊園的藤原氏，並未收到圓滿的效果。然而壓制藤原氏的效果，却得實現了。御三條天皇駕崩時，便發生了我國歷史上前未曾有的事件。即自紀元一千七百三十三年以來半世紀之間，除天皇之外，已經引退的天皇，均以上皇的資格，來掌執政治了；最初爲白河上皇。此種制度稱作「院政」，身居帝位的天皇成爲名義上的主權者，攝政關白及大臣等仍作爲名義上的官員，來奉仕朝廷；此外有上皇或法皇，在其他的宮殿之中，具有與天皇同樣的資格與權威，由特別的官吏侍隨，而居於實質的統治者的地位。這複雜的制度並未延續許久，但因此一切政權却又集中於主權者一身之上，我國的政治又歸復了傳統的原理。

其次，關於這時代中的文化發達，即宗教、美術及文學等的發達，加以簡單的考察。

在平安朝初期以前，所謂遣唐使的使節，雖曾屢次派往唐朝，後來唐朝漸見衰微，足以取範的地方亦見稀少，以仁明天皇承和四年遣送的一行爲最後，遂中止了遣唐使的派遣。當然彼此的貿易仍舊繼續未止，不過那只是經中國或日本的商人之手來辦理的。並且僅此貴族們需要的奢侈品的供給已屬充分了。結果，日本的文化以從來的積蓄爲基礎，便開始了獨自的進展。

在宗教方面，我國也出現了許多名僧，如創立天台宗而謚號傳教大師的最澄，創立真言宗而謚號弘法大師的空海等。兩人生在同一時代，都隨着遣唐使留學於中國，深入研究佛教，同於紀元一千四百六十五、六年歸來日本。最澄在京都比叡山建立了延曆寺，空海在紀州高野山建立了金剛峯寺，銳意發展具有國家性格的新佛教，——即較過去更適合我國國民氣質的佛教。他們所興起的不是奈良式的學問的佛教，而是與日本的理想及傳統調和的佛教。隨着他們的運動的開展，以學問的研究爲主的奈良式的佛教，也受其影響，而轉歸到裨益於國家安泰的宗教之本來軌道上來了。然而，當此貴族社會生活窮奢極慾而道德弛廢之時，佛教已喪失其理想，追求真實信仰的僧侶們，失望於教團的狀態，竟離開人群而度隱遁生活去了。佛教教團只爲延長現世的安逸奢侈生活到來世去纔作加持祈禱，已如前文所述。同時，在大衆間普及信仰的新運動也發展起來了。

在美術方面，日本式的繪畫發達起來；在建築、繪畫及彫刻方面，雖以佛教爲主要題材，及至與奈良式的佛教相異的天宗或真言宗等佛教發展之後，遂發生了顯著的變革。因奈良地勢平坦，在當地興起的伽藍是均齊的；而平安京中的堂塔，因築造在山頂或山腹上，其寺院的建築物就表示着與周圍的自然融合的樣式與配置。佛畫的背景中也畫出自然的風景來，而成了風景畫的起源。所謂「寢造殿」的新住宅樣式發達起來，爲裝飾地板、天花板及屏障，對於佛畫以外的畫師，也有所需要了。繪畫中的另一重要部門，在這時代的後期也開始發展。那就是「繪卷物」。用以說明物語——如源氏物語等，這種繪卷物中採用着一種特別透視畫法，表現多是使用寫實技法的。

最後，在文學方面也有了極顯著的日本情調的發達。至第十世紀之初爲止，漢詩漢文占着優勢，學者之間流行寫作漢詩。此時，結合了各種傾向，產生了今日尤見盛行未衰的和歌之類的文學形態。此外，純日本情調的文章（和文）也發達起來。其理由之一，當歸於傳爲弘法大師之作的「いろは」四十七文字的發明，藉此發明，我們的文學纔獲得了自由的表現手段。

在純文學的領域中，貴族的婦人們擔任了重要的任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貴族們爲了增加自己的政治勢力與聲名，教他們的女兒學習文學，她們之中曾輩出過「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納言之類的才媛。「源氏物語」在一千年的昔時，已經作了今日心理小說的先鞭，實在是世界第一流文學傑作之一。散文以外，韻文也非常發達，「萬葉集」以後，因爲漢詩的流

行，曾經衰微一時的詩歌，再度興盛起來。紀元一千五百六十五年，奉勅命編纂的「古今集」中，收集着一千餘首短歌，技巧洗練，充滿平安時代的纖細的感情。不過，尤當注意者：這時代的文學完全是貴族階級的產物，只描寫在平安京度着奢侈安逸之生活的世界，而表現那世界的情感而已。

#### 第四章 武士政權的推移

釋迦牟尼佛 法相鎮鎌倉

玉顏美男子 松柏鬱蒼蒼

鎌倉有一尊大佛。正如著名的女流歌人與謝野晶子夫人所吟詠的這首詩歌一樣，以美麗典雅的面孔而馳名的大佛，與奈良的大佛，同爲使日本人的心境平和靜謐的精神之食糧。

鑄成這美麗的大佛的時代。建立那草葺閑寂的圓覺寺及建長寺的時代。源賴朝——在鶴岡八幡宮石階傍的公孫樹下遇刺橫死的詩人政治家源實朝之父親——創立所謂「鎌倉幕府」的時代。這時代距今約有七百年之前。歷史家呼這時代爲「鎌倉時代」。

現在的鎌倉，與其稱其曾是一百五十年間武家政府之中心地的歷史因緣，勿寧稱其是以溫雅的大

佛與避暑地而非非常著名於世的。

鎌倉幕府的榮昌時代，當地曾有一萬以上的民戶。市街也似乎截然區分為武士階級的居住區與商人的居住區。據當時的某種記錄所載：某年大地震時，曾發生二萬三千二十四人的死者。由此可見一定是會擁有相當多數人口的都市了。

今日僅以海水浴場知名的由比ヶ濱，當時也是繁華的港口，常有多數船舶集散來往，會是重要的貿易港而與博多及大阪並駕齊驅。在這海上，豪爽剛毅的武士們，時常演習大弓；在月明之夜，懷戀平安京文化的高級武士們，時或泛舟清游，時或奏着幽美的音樂。當時的鎌倉還曾是武士們每天磨鍊戰法、馬術、弓術或劍術的演武場。

我在講述鎌倉時代的歷史之先，想先來研究鎌倉幕府的政治組織。

現在我們將明治維新以前繼續了七百年間的武士政權，即以鎌倉、室町及江戶為中心地的三個政權，均呼作「幕府」；認為其性質相差無幾。然而我以為應當對這種論法從根本上加以檢討，同時從日本的整個國家組織上來觀察此等時代。

今日我們立在宮城的二重橋外，對於宮城的莊嚴之氣概，精神不無感觸，而馳念天皇中心國家的原理與傳統。縱即將這莊嚴的宮城，僅視作一個城廓，一個舊千代田城，猶較其背後的丸之內大樓

街遠屬豪壯。這豪壯的城廓，在明治維新以前尙以江戶城——德川將軍的居城——之名見稱於世。自開期，當時的一般民衆究竟如何觀看？大約他們認爲比我們所想像的猶屬豪壯罷。這種想法實表示着江戶時代三百年間的「幕府」權勢的強大。我們從這江戶城的規模上，可以想像出德川幕府對於各階層國民都會強制施行過非常徹底而嚴格的政治統制，同時，也可以想像出爲了他們的政權根據地而築造這雄壯之城廓的專制的威壓。

德川政權的政治機構，在成立的過程中，經歷過許多次的動搖。關於此事，將談諸後文來詳細說明。現在我特別注意的：是德川政權在初期並未自稱爲「幕府」，而他人也未如此稱呼。「江戶幕府」的名稱，在德川氏支配政治的時代中，其後多年並未出現。所謂「其後多年」，是指這政治組織開始發生動搖徵候的時期而言。當時，武家政權的當局者，爲對這政權附與永續性，基於此種現實的必要，纔到鎌倉的武家政治中去假藉維持這組織之存在理由的先例。

德川氏當家康最初被任命爲「征夷大將軍」時，爲了對於自己的政治立場加以合理的解釋，曾主張自己是源氏的子孫。其後，當政治機構意識到本身之動搖的時期，纔過大批評了在鎌倉成立的武家政府的政權，而加以「幕府」的名稱，來宣揚幕府政治的合理性。並且爲防禦自己的政權的衰落，而以「幕府」的名義來維持政權。



對於這種德川政權的政治工作的過程，明治維新以後的歷史研究者，應該視作一個好題目而加以研究。然而，因為未曾研究的關係，所以依舊蹈襲着前述的見解。肯定大規模的「江戶幕府」的存在，同時更追溯觀察鎌倉的武家政權。因之，遂現出了言過其實的重視鎌倉武家政權的傾向。關於所謂「室町幕府」的足利政權，也是同樣情形。然而，因為這三個武士政權是各自建立在不同性格的基礎之上，所以想在這講義中，盡力加以究明。一般呼作「鎌倉幕府」的，只是以源賴朝爲處理源氏家務而設立的「政所」爲主的機關，而並不是擁有大規模政治組織的江戶政府那樣有力的存在。

於茲，必須特別留意者：即是所謂「幕府」的名稱。此語原來在中國是用以稱呼近衛大將軍的別名的。漢朝的時代，曾屢次爲征伐匈奴而遣派大將軍。匈奴是居住北方沙漠地帶的種族，征討匈奴的將軍，安紮了張設帳幕的營陣，以備隨諸戰局的進展而自由移動。這就是張設着天幕的政府。因之，始漸漸發生了「幕府」的名稱，而變成了稱呼大將軍的別名。後來，在平時也稱近衛大將爲「幕府」；唐代以來，便用來專稱近衛大將了。輸入了唐代諸制度的奈良及平安時代以後，在日本也有了稱近衛大將軍爲「幕府」的風習。所以當源賴朝在壇浦之戰打倒平氏以後，便授命爲右近衛大將，進而授命爲征夷大將軍，因而便被稱爲「幕府」了。其後，將軍的邸宅也被稱作「幕府」了；以爲鎌倉時代的政治權即是所謂「幕府」的通說，是誤謬不確的。當時以「幕府」的名稱，稱武家政治

政權，並無史實的根據。恰如前述，將賴朝以後繼續了七百年間的武士政權，總稱爲「幕府」，是屬於江戶時代的末期；而蹈襲那種原來的說法者，實是歷史家的誤謬。對於此點特別加以注意，在理解武家時代的歷史上是絕對必要的。

其次應該注意者：是今日遺存於鎌倉的遺跡與建築，雖足使人聯想到往時的鎌倉時代，而其中多數却非當代的古物。但是我們從鎌倉較諸奈良或京都歷史紀念物爲數頗少的事實中，倒應該認識這時代的真正性格。因爲平安京的貴族文化是豪華的，而武家政權的中心地所養成的文化，勿寧說是富於精神性的，——即以忠義、謙讓及正義三者爲最高倫理信念的武士道，與具有深遠的精神內涵的禪宗爲主的精神文化。武士道與禪宗雖然不同，却不能從外形上妄加判斷，必須從內涵上理解其真價。鎌倉的歷史遺留至現在的，不是建築及其他雄壯的造型遺物，而是表現傳統的日本精神以及武士道精神的甲冑刀劍之類。

作爲這時代的序論，將前文述及的諸點，一一加以理解；下文開始述說關於這時代的重要而興味盈深的一面，即此時代的進展過程。

概如前講所述，平安京貴族生活達到頂點的時期，他們的經濟基礎即是遍在於全國的莊園，在此等莊園中還有所隸屬的農民從事勞作。莊園之實際管理者的名主們，爲保持莊園的安全，曾不斷的

整備武裝。所以在名主管理之下耕種土地的農民，也自動的携起武器而擴充了戰鬥能力。名主們以自己的武力，警衛每個莊園所收穫的米，而護送到住在平安京的老家或領家的貴族們的地方去。在京師度着安逸生活的貴族們，也將此等運米的人留在京師，令他們擔當自己的警衛。此外，從來與貴族們在莊園上發生過關係的名主，也有自動進而與貴族們結合密切關係者。因此，由於此種事實，遂從原意爲留在京師侍奉主人的動詞「侍ふ」，產生了「さむらひ（侍）」的名詞。（註：日本語稱武士爲さむらひ）在京師中如此按置警護者的習慣，未久即將貴族與武士直接結合起來，武士開始與貴族生活的展開發生了緊密的關係。在此等武士之中，東日本的源氏，西日本的平氏，其勢力遂見日趨增大。

天皇中心的國家以及在這國家之下的國民，將這種關係緊密結繫起來的日本傳統，與絕對尊重此種傳統的日本人的特性，使天皇之子孫的源氏或平氏，較其他諸氏受到了更高的尊敬。因之，地方的人們遂將源氏與平氏視作了武士階級的中心勢力。然而地方各家爲了自衛而豢養武力的人，隨諸武士存在被一般所承認，源氏與平氏便急速的現露於歷史的表面上來了。其契機則爲紀元一千八百十六年保元之亂及二十年的平治之亂。

這兩次爭亂，均在宮廷的藤原氏之內部紛爭上，利用了武士的勢力。結果，貴族們的生活被武士看破，同時，武士們也得到了深行認識自己之實力的機會。以這兩次爭亂爲契機，代替藤原氏的平

氏的勢力，便出現於歷史的表面上了。

然而，理當代藤原氏而起的平氏，並未磨鍊他們所有的真實能力，反而陷入平安京的美麗而柔弱的環境之中了。因而政治上的實權又再度移至源氏之手。

在這期間中，於近畿地方至瀨戶內海沿岸各地，連續發生的紅白兩旗的戰爭，在日本的戰史中是非常有名的；最後，於紀元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安德天皇元曆四年），源氏在下關附近的壇浦，以平氏一族投海滅亡而結束了這幕悲劇。因為這悲劇的戰敗，代平氏而出現於歷史表面的是源氏。源氏的代表者源賴朝，離開從來四百年間政治中心的平安京，而置根據於其祖先所居的鎌倉，打開了一百五十年間歷史的新的一章。

源賴朝為執行其所掌握的權力，在必要的組織上，設立了軍事、行政及司法三個機關。一、「侍所」。這是一種刑事裁判所，掌轄一般軍政與所謂「御家人」的源氏直屬武士的監督事項。二、「公文所」。這是後來改稱為「政所」的行政機關；這兩個機關，並非武士政權獨自所創造者，乃是採用從來平安貴族用以管理其家政的機關之制度：三、「問注所」。這是出自武家政權之創意的司法機關，是為當地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作最後判決的上訴審判所。唯當創設當初的此等機關，只是整理源氏的家務機關，並非一般所想像的所謂「鎌倉幕府」那樣大規模的政治組織，更無任何公

衆的性質。不過賴朝從源氏直屬的御家人中，委命了監督全國莊園的「地頭」，更蒙朝廷准許，將有力的「地頭」派爲「守護」到諸國去；由莊園中徵收每段五升的所謂「兵糧米」的租稅。此種特權遂增大了源氏的權力。同時，賴朝由朝廷授命了「征夷大將軍」的稱號，被委囑了維持國內治安的責任。所以在短時間之內，前述的政治組織就明顯的具有了公的性格。因此，這鎌倉的新政權，在軍事、行政及司法三機關之外，爲了執行種種政治上的業務，更添設了所謂「公事奉行」。又在京都設置了新任命的守護——後日稱爲六波羅探題者——以代從來的「檢非違使廳」，來擔當維持治安。更在九州設置所謂九州探題的「鎮西奉行」，在奧羽設置「奥州奉行」，使其各自擔任地方治安。

此種各地方新機關的設置，證明了武士政權的漸次強化。賴朝死後，其長子賴家繼其後任，繼而賴家之弟實朝又承其後，兩人均受天皇的命令，任命爲將軍。然而在鎌倉的源氏政權，元來是以長期盤踞在關東地方的北條氏之地盤爲基礎，在北條氏的支持之下所成立的。是以賴朝死後，政治的實權就漸次落到北條氏的手中。繼實朝任命爲將軍的是從京都迎來的藤原賴經。賴經是賴朝的外甥之孫，也無非是北條氏的傀儡而已。所以任命將軍地位者是否承受源氏之血統的人，完全成爲另外的問題；武士新政權的主體，僅只稱作「鎌倉殿」了。「政所」的長官成爲北條氏的世襲職位，他們

自動以「執權」之名義把握了武士政權的實權。以這執權爲中心，由北條氏的家臣所組織的是「評定衆」；他們舉行不定期的集會，來商議政治的圓滑運用問題。

如此樹立了武士政權，當其正在擴張發展的時期，就發生了北條氏與廷臣的衝突，而引起了流血的鬭爭；這即是承久之亂。當時，先是平安京中的朝臣們對於鎌倉武士政治的興起，認爲有違天皇中心政治的原理。此種意見漸見有力，情報傳入鎌倉以後，北條氏便向平安京派遣了大軍。根據當時的文獻所載，執權北條起義當時宣言謂：其軍隊只是爲朝臣而出，倘如上皇親自向他出兵，他便立刻停止進軍而出來謝罪。但是，結果却是後鳥羽法皇、順德上皇及土御門上皇各自遷幸到隱岐、佐渡及土佐等處地。同時將認爲是此次事變之責任者的朝臣們，均處以流刑，始結決了此次事變。唯其中猶當注意者，就是敢然出以此種暴舉的北條氏，却也未懷代天皇而總攬政務的心意。北條氏奉戴後堀河天皇，在天皇的主權之下，自動的擔任了平安京的警衛職務。倘若在外國，這種情況一定不能得到此種結果。

國家的中心是天皇；這絕對不移的傳統原理，即北條氏亦曾堅守不渝。在這種難局之下，天皇中心的國家原理毫未動搖，乃是日本歷史的真實的特質，或者外國人視作神秘也未可知。

北條氏自身所占有的「執權」，頗類似平安時代的「攝政」。但是「攝政」是受天皇任命來輔翼天皇的，而「執權」是隨其自己的意志來輔佐天皇所任命的將軍的。此中實有制度上的極大的差

異。所以，承久之亂就是用武力來解決輔佐將軍的「執權」與朝臣之間所發生的紛爭，我們必須從這一點上來認清其特殊的性格。北條氏的此種行爲，在其後的歷史上常常受到責難，所以我們應當認清國家原理的傳統。

承久之亂的結果，武士政權愈見強大。詳細的論來，「地頭」從單純的土地管理者漸次轉變爲土地所有者了。他們向本家及領家要求其土地的領有權，而取得了土地的一半。位居其上的北條氏，則推戴年幼的皇子或貴族作爲將軍，加以擁護而行使其「執權」的政治權力。紀元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北條氏公佈了包含五十一條的法令「御成敗式目」，即一般所熟知的「貞永式目」。這法令的三分之一的規定，即表示着以此爲基準而處理領地之移動，或統制維持武士政權的地盤，是極其重要的。

以上，我已將前代以來以平安京爲中心的舊勢力及以鎌倉爲中心而新興的武士勢力對比一番，對於鎌倉時代作了一個概觀。然而，這只是歷史的表面，這時代的現實尙有更複雜的性質。以下來講述其內部的情勢。

平安時代的末期以來，平安京的貴族們與寺院緊密的結合起來。寺院方面也如貴族們以武士來保護其生活一樣，使下級的僧侶們饗養武力而充當僧兵，用以保護自己的生活。僧兵們常以寺院爲背

景，作出橫暴的行爲來。

武士政權在鎌倉初行樹立時，平安京的延曆寺及奈良的興福寺等大寺，恰如平安貴族同樣，均各自立於獨立的立場上經營着各自的生活。不過對於源賴朝的出兵，貴族與僧侶却共同的反對這新勢力的擡頭。這時期中，貴族之中也有想要利用這新勢力來抑制寺院的橫暴，藉以維持國內治安者。所以，後鳥羽天皇對於新勢力之中心的賴朝，便賜以「征夷大將軍」的地位，並委以國內統治權限的一部分，以順應對處國內的新情勢。武士政權的成長與發展，自然引起了從來社會的經濟的秩序之整個的崩潰，所以頗使以舊秩序爲基礎的人們感到巨大的動搖。此種不安的社會情況使社會各層的人們發生了一個非常悲觀的觀念，而流行起「末世」的思想來。此種思想雖在平安末期即已存在，此時却大見蔓延起來。平安京的貴族們因此種觀念，遂認爲現世的悲慘苦痛均爲前世的因緣，而到佛教思想中去追求合理的解釋。然而，同時却也抱着克服此種苦難的希望。即貴族也漸漸主張與武士組織共同團體的政治意見了。這種政治思想在與武士政權採取互相合作態度的僧慈圖（藤原兼實之弟）所寫的「愚管抄」中，表現得最爲明瞭。

平安京的貴族雖在這種世態轉變之中，依然一味追求着昔日的傳統生活。平安京鼎盛時期曾經產生過「古今集」，承受着同樣的風氣，又復製作了「新古今集」。這歌集中所表現的貴族社會生活，依舊是以平安京爲中心的昔日之傳統生活，而仍然繼續着絲毫未感到武士政權之壓迫的生活方式。



「新古今集」以外尙會出現過許多歌集，也出現過許多效倣「源氏物語」的小說。今日保存的諸多美麗的繪卷，大部份均爲當代的產物。然而，我們觀察國內全般，是不能忽視新興武士階級之存在的。

以平安京爲中心而過着傳統生活的貴族與僧侶兩集團之外，以鎌倉爲作中心的武士集團也見確立；這三個集團互相保持着錯綜的關係而前進發展，實是這時代的顯著的特質。自源平之爭至承久之亂之間的一切爭亂，縱令在外貌上不同，而在三個勢力的錯綜關係上，却是共通一致的。

然而這三個集團之間，又有一個新的集團漸見抬頭。那即是當時所謂「借上」或「大福長者」的高利貸商人，即金融業者的集團。

概如前文所述：平安末期以來，隨諸國內產業的發達，商品漸見流通，未久即生出了貨幣的需要，而開始由中國輸入了貨幣（所有貨幣均係由中國輸入者）。此等貨幣在平安京中的流通，自源賴朝舉兵以後，曾引起一個巨大的問題。而使以輸入此種貨幣的貿易業者爲中心的金融業者崛起出現了。武士政權經過承久之亂以後，當頒布貞永式目時，已是整個武士集團感受金融業者威脅的時勢了。其中情形概如下述。

勿論是貴族、僧侶或武士，他們的生活基礎，却同是由莊園繳納的稻米。然而當租稅與物價一改從來的稻米，而兌換為貨幣時，就發生了物價的變動。自鎌倉時代初年，雖曾以種種方法來防止價格的動搖；隨諸國內產業的發達，動搖的趨勢却愈漸顯著了。

終於莊園的租稅也不得不使用貨幣了。但是，因為米的價格隨時變化，以土地的收入為唯一財源的人們，就要屢次受到經濟的威脅，而生活上發生了動搖。反之，高利貸商人的地位却漸次增高。他們以土地作抵押，貸放貨幣與土地所有者以充租稅。以至有時當作抵押的土地，就歸為高利貸商人所有了。於是土地不受從來所有者的權門世家支配，而直接由高利貸商人支配了，譬如：「地頭」沒落後，高利貸商人作為「代官」，親自來管理會由地頭支配的土地。這種形勢當貞永式目頒布的前後，已經非常顯著。

承久之亂以後，武士政權實際支配的土地驟見增多，而更各自委任了所謂「新補地頭」的新管理者，未久，他們就私有了此等土地。終於，如前文所述的情勢，上新地與原來領有的土地，均陸續移入高利貸商人的掌握之中。

在這問題之外，尚有一個使當時社會根本發生變動的要因，就是繼承制度的變化。在當時，長子的繼承權已見強化，次子以下的生活基礎漸趨薄弱，同時家族內部的經濟關係也愈見複雜了。（從這時期起，便採用了表示家族傳統的「紋章」，此事不久即形成了一種制度，頗堪注目。）隨諸土

地所有關係的變動增加，農民的變動也繼續發生。或不得已離開土地，或流為盜賊。社會的不安已日趨深刻不已。

以此種世態為背景，便發生了新宗教運動。這新宗教已非前述的末世思想之類屬於觀念的思想。法然、親鸞及一遍等，均希望處於不安之世態中的人們的情感之安靜。苦於社會不安的人數愈多，他們的新運動便愈擴大。他們所主張的：是在現實中即使度着如何苦痛的生活，藉諸對於佛的絕對信仰，將來的幸福生活必能到臨。

然而，這種希望並未實現。因為時代的動向已是決定數。繼法然、親鸞及一遍等更激烈的表明了對於現實批判，且對未來也表示了強韌的希望。日蓮之運動，遂聲勢漸見顯赫。他從法華經的教理出發，對於將世人置於此種不安狀態的武士政權，對於徒事加持祈禱的從來之佛教，給與了嚴厲的批判。他的意圖中充滿了希求天皇中心國家之安泰及國民生活之安寧和平的熱情。因之，支持他及其運動的人，也愈見增加起來。

日本正當此種狀態之中，蒙古的忽必烈突然遣發大軍前來；他前後兩次曾遣發了數萬大軍。然而，我們國民聞知外敵的來襲，却能立即振臂而起。蒙古軍移近九州沿岸時，遂勇躍加以防禦，而與以逆擊。在這期間中，國內方面，曾上下一致在神佛之前為驅逐這外敵而祈禱不已。龜山上皇在

石清水八幡宮舉行祈禱法事，願代國民以殉國難；遣發勅使前往伊勢大神宮，即在當時。這熱烈的祈禱終於感動了上天，來襲的蒙古兵兩次均遭暴風雨的摧擊，而全軍化作海底的藻屑了。關於這次的暴風雨，中國的文獻或當時來在中國的意大利人馬哥孛羅，雖只記載為颶風，但在日本則傳為是祖神化為大風前來助戰的。自此之後，「神風」一語，遂成了表示全日本人當國家危急存亡時認為有神在我等身畔的信念之標語。

此次巨大的事變終熄以後，國內的變動更加迅速的變化起來。前述金融業者驟興之後，商工業也乘機發達起來。僅藉土地的支配而生存的昔日之權門世家，遂愈見呈現動搖。

商人及手工業者各與其同業者結成組合，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此等商人及手工業者最初雖直屬於朝廷社寺，而從事於他們的業務；及至他們所依存的地盤發生動搖，遂為保持自己的生活，便創立了組合，而呼作「座」。並開始生產絹織物、工藝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必需物品，且販賣此等製造品的商人們，以其個人的自由經營了市場。京都及鎌倉等地方，也有了繁華的商業街。

此種商工業的發達當然促進了交通的發達。勿論陸地方面或海洋方面，交通量頻見增加，因而在陸地上有了「宿驛」「關所」，在海岸上掌握港灣及水路運輸的「問屋」也發達起來；自然也就成立了匯兌制度。此外，鑛業、漁業及水產業等也發達起來。此等諸多情形綜合起來，愈加促進了貨幣的流通，而金融業者的興盛也愈見顯著。同時，使莊園領主的沒落更趨急速了。當時對中國的貿易

亦頗殷盛，不僅中國的船舶渡到日本的港灣來，多數的日本船也載滿黃金渡過波濤洶湧的支那海前往大陸，再購載大量銅鐵商品歸來。爲壓制藉此種貿易蘊蓄資本的商人階級勃興，武士政權曾經頒布了法律，制限去往中國航行的船數，然而却未發生效果。尙有多數的僧侶搭乘此類船隻渡往中國，携回宋學禪宗之類的新知識與新文化來。熱心信奉此種禪宗而心慾清淨的人士之一：卽爲在擊滅蒙古軍的戰爭中盡過巨力的「執權」北條時宗。此事殊堪注目。

蒙古來襲之後，土地移諸富裕的商人階級所有的趨勢益漸加甚。鎌倉幕府爲此屢次頒布法令，藉「德政」的名義，宣布從來的借貸關係的無效；但殆乎全毫無效力。因爲勢必借貸的武士階級，因此法令反倒陷於較金融業者更見不利的立場了。

在擊滅蒙古軍之役中樹立功勞的武將們，當論功行賞之際，雖曾希望賜與土地，然而此時武士政權已不能以土地使他們滿足，並且更無充分的政治權力了。因之，鎌倉政權的崩潰只成了時間上的問題。在蒙古來襲的不久之前，鎌倉政權的公家紀錄「吾妻鏡」竟而中斷執筆，這事實正表示其後一百年間武士政權愈見衰亡的徵候。此事，非僅基因於我們所觀察的社會的或經濟的原故，鎌倉時代後半期的思潮也是其主要因。

平安貴族因喪失領地與權力而意氣沮喪，悲嘆自己的蹇運而沉溺於末世觀念的情形，已如前述。

然而，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依然在平安京繼續着傳統的趣味生活。他們最值得注目的一件工作，乃是古典的研究，即對於「日本書記」之類的史書或「古今集」「源氏物語」等文學作品的研究。由於此種研究，他們理解了他們祖先的平安貴族以及當代以前的人們曾如何生活而思考。結果，重新認識了自國的傳統，遂造成了國家主義思想的發達。促使國內團結一致的蒙古軍之來襲，更推進了國家原理的追求。宋學與禪宗也給與了理論的根據。學問成了批判的研究，思考有了反省的精神；此等思想的傾向，不僅存在於平安京，即今日猶存的「金澤文庫」「足利學校」等武士階級的學問機關中，也流佈普遍了。此等思想成爲渾然一體的結論，加深了所謂大義名分——即對於真正的君臣關係的理解，更強化了毅然恢復天皇中心傳統政治組織的決意。後來此種思想廣布全國，遂成了再建天皇中心政治的實踐行動。鎌倉的武士政權崩潰之後，醍醐天皇復行親政，建武中興即其具體事實。其後六百年，紀元二千五百二十八年斷行的明治維新，更使其再度認識了中興的意義。

## 第五章 市民社會的黎明

將日本歷史的二千六百年，分爲兩部，恰爲一千三百年。大化改新即距今一千三百年前施行的政治改革。將一千三百年再分爲兩部，爲六百五十年。在距今六百五十年前稍後所施行的第二次的革新，即爲建武中興。大化革新與建武中興均是追求建國以來之理想而努力改良現實的實踐運動。在

這一點上，兩者是共通一致的。所謂建國以來的理想，就是展開天皇中心的政治之謂。

大化革新之前，國內種種問題紛亂如麻。就中，當時社會的貧富懸隔頗甚，而不得不使之展開天皇中心的政治了。當時恰與中國開始了正式關係，而通曉了東亞的情狀，遂一舉而進展為改革的實踐運動。改新政治展開以後，誘發了建都奈良的豪華的文明時代；但是未久政治革新所具有的矛盾即見擴大，帝都遷移到平安京，而出現了廷臣們的權力膨脹的時期。當他們只耽溺於文弱的生活，在政治運用方面感到困難到來的時代，以武士為中心的新政權便在鎌倉出現了。這新政權雖也忠實的遵守着天皇中心的政治原理，但是，及其實力漸見增大，便逐漸惹起了廷臣們的反撥，而引起了許多紛爭。當時，突然攻來的是蒙古的大軍。對於這外敵的來襲，國民一致挺身而起，使蒙古軍大敗而歸。然而因此所生的結果，就是加重了在蒙古來襲以前既已顯著的社會之紊亂。於是，為打開此種狀態，便繼出現了完成天皇中心政治的運動，終於成了以廷臣為主體的打開現狀運動，獲得武士的協助，而促成了建武中興。繼而發生的是獨以武士為中心的運動，遂成了足利氏的武家政治的開端。然而，足利氏的武家政治也未收到充分的成果，竟發生了應仁的大亂，一直延續有十年之久。而大亂的結果，却產生了更大的混亂時代——即所謂戰國時代。戰國時代直至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及德川家康三個英雄出現而展開新秩序為止，竟繼續了二百五十年。

新秩序完成前的二百五十年間，在歷史表面上確是混亂時代。更是國內爭亂不絕的時代。大族世

家興亡無常，同時，出自無名之家的人却掌握大權。實乃從來的社會秩序破壞殆盡的時代。然而在那混亂中，却潛流着一個動向，即追求國民理想或向新秩序奮進的動向。這二百五十年間，雖是不安的時代，却是商業異常發展的時代，以及促進此種情形的海外發展之興隆時代。因之，又是對堅實的文化發達與以經濟基礎的準備時代。從現在起，我便略述這時代的黑暗光明交錯的歷史。

一般的歷史家，猶其是明治時代的歷史家，有超乎實際而來敘述這時代之黑暗面的傾向。那是由於他們所偏取的資料，幾乎全部是關於武力鬭爭之資料的關係。最近十年間的傾向，新進的青年學徒將研究的重點轉向於究明這時代中比較尚未研究的方面，特別是社會或經濟方面的變遷。然而，因為這研究尚未十分徹底，所以現在對於這時代加以綜合的描繪，是非常困難的。關於某一部門，例如戰爭或經濟方面，因為國內外的資料比較豐富的關係，所以還容易述說。至於涉及各方面而加以相關的述說，却非易事。尤其我們認為最屬必要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尚未充分究明。不過在本文中却務求接近這個目標，來進行講述。

「戰爭、商業及海盜是不可分離的三位一體」。這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藉梅非斯特非萊的口所道出的有名的辭句，是針對着較他自己的時代稍前的西曆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時代的歐羅巴現實所吐出的名句。那時期的歐羅巴，正有着戰亂連續海盜跋扈而商業發展的實況。



「黃金文書」中所表示的德意志諸侯權力的增大。姜·達克的故事中所傳述的英法戰爭。戰士在胸前綴着紅白薔薇而作戰的薔薇戰爭。東羅馬帝國的滅亡。其中既有商業的異常發展，又有所謂新大陸的發現。此等事實，纔造成了今日歐羅巴的發展基礎。歌德對着此種歐羅巴的現實，纔吐出了如此的名句。而在遠方的日本，在同時的歷史上，也呈現着相同的姿態。這實在是頗饒興味的。那就是現在所要講的，從建武中興的前後至信長、秀吉及家康成立新秩序之時為止，約二百五十年間的歷史。

所謂建武中興，即後醍醐天皇否認了鎌倉武士政權，根據日本的理想而實現天皇中心政治之謂。這中興大業，英明的天皇在即位之後，即已想到；不幸第一次偶遭失敗，天皇暫時從笠置山遷幸至隱歧島。後山護良親王等諸王子、楠木正成及新田義貞以下忠勇的武士盡力，藉指導他們的北白山親房的忠誠精神，始得成功。唯因為擔當實際政治的廷臣，將中興事業的目標放在對於延喜時代——即平安朝時藤原氏居於攝政關白之地位的時代——的復古上，因其不適於當前時代的現實，結果反倒加深了廷臣與武士之間的摩擦，竟惹起了所謂吉野時代的五十年間的紛亂。

當時，武士們均各領有土地，藉以謀求生活，唯因商業及貨幣經濟發達的結果，僅賴原來所有的土地，難以維持生活，於是便需要獲得更廣大的土地了。然而，脫離政治實權已久的廷臣們，未能充分理解此種社會的經濟情態，反而想將全國的土地收回作為自己的莊園，陷已處於此種情況下的

武士於平安時代之農民的地步去。掌理中興新政府政事的「記錄所」及「雜訴決斷所」，就是爲此種目的而設立的，與協助成立中興政治的武士們的希望，完全背馳不同。

此等廷臣們均成了政府的中心人物，因之，他們的政策遂成了會與他們共舉大事的武士們不平的動機。與心懷不平的武士們共同前進的只有足利尊氏。因其所引起的叛亂，後醍醐天皇纔遷幸至吉野。這動亂接續了五十年，直至足利尊氏之孫義滿的時代，因後小松天皇即位而創立「室町幕府」，方告終結。後小松天皇任命京都室町的義滿爲征夷大將軍，開設幕府，遂又展開了武家政治。

足利氏以源賴朝所創始的政權爲基準，再度創立了武家政治，然而時勢却已迥非昔比。又兼在古老的帝都或平安京的一隅執行武家政治，非常失當。果然，這美麗的故都所具有的舊傳統與環境，便使他捨棄了武士的傳統，而捲進廷臣們的傳統與環境之中去了。

其實，與其說他們繼承了鎌倉武士的文化，勿寧說是繼承了平安京貴族的文化。他們興造了金閣及銀閣等壯美的建築，享受了優美的生活。但是因爲其生活基礎，即不同於平安京繁盛時代，更不同於鎌倉政權時代，結果竟成了惹起新動亂的素因。

足利氏的經濟基礎，是在近畿地方的領有土地上。所以，與地方的各大名們具有殆乎相同的性質。但是僅僅領有如此少數的土地，是不足以保持政治上的優越地位的。諸如前文所述，因爲隨諸

商業的發達，貨幣經濟已經進展到顯著的地步了。

足利尊氏利用其政治上的優越地位，連絡貿易商人從中國輸入貨幣，將之積蓄起來而加以運用。他的後繼者也均延用同樣方針。他們與持有確固地位的商人連絡，在政治方面保護此等商人，同時由商人得來經濟上的支援，所以纔勉強保持了政治上的優越地位。立在此種經濟基礎之上，過着京都中的奢侈生活，室町幕府的政治形態，當然是要失掉武家政治之性質的。

當時，在足利氏一族之間，發生了因家督相繼而起的激烈的紛爭，此事與諸大名的利害關係連繫起來，紛糾錯亂的戰亂，竟繼續了十年之久，此即所謂應仁之亂。

此次戰亂曾使都市京都荒廢殆盡，同時也將足利氏武家政治的脆弱暴露無遺，與足利氏具有同樣性格的全國各地大名，均以其獨自的立場，盡力統治起他們的領內來。結果，就到了舉凡土地銜接的諸大名之利害關係，均憑戰爭以見解決的時代，即所謂「戰國時代」。

例如：在信濃有武田氏，在越後有上杉氏，在周防有大內氏，在石見有尼子氏；各地均有統治該地的大名，他們為擴張其各自的權力，均不斷的互為紛爭。武田氏與上杉氏的戰爭，曾以川中島為中心而展開，原因是為獲得該地所有的鑛山。由此一例，即已表明權力擴大的目的，非僅在於領土的擴大，而實猶為獲得新的資源。由此更可藉以窺見其時代的推移了。此實為商業發達的情勢使然者。

我們雖該由此敘述商業發展的情勢，先此，首將這時代的日本國民的海洋發展情勢敘述一番。蓋因此項顯著的事實，曾經促進了產業的發展。

日本因四方被海洋環繞，自太古以來，其民族性即為海洋所支配。所以進出海洋而與大陸發生關係，由來亦極為悠久。第十代崇神天皇時，相傳曾在伊豆之國建造了長達十餘丈的船隻，亦足使人想及造船技術之發達頗早了。繼於應神天皇時，為統制以航海為業者而設置海人部，由此海人部的活躍，與大陸的關係更見進展了。崇峻天皇時代，因為朝鮮半島的任那問題，曾於九州駐大軍兩萬餘，而以此等威力進行處理外交問題等，即其一例。此種海上活躍的傳統，一直傳至後代，與中國也繼續着密切的關係，此事概如前文所述。蒙古襲來之當時，為貿易而有多數日本商人渡往中國，此事，即在當時的中國文獻上亦有記載，而前文亦曾述及鎌倉政府因而限制渡航商船的事實。且當時中國南部的貿易商人，對於忽必烈之命令備辦軍船而未能輕易應諾者，也足以表示他們實有意維持日華貿易關係。關於中國貿易與貨幣經濟的進展關係，概如前文所述。渡航大陸的貿易船，其後數目愈見增多，而成了這時代的顯著傾向。且此等渡航者，均由日本各地商人或具有商人性格的大名供給渡航資本，此等大名係因自己的存在，纔需要遂行此種貿易。渡往大陸的貿易業者，甚至有時為遂行其目的更不憚訴諸實力。諸如前文哥德所述，在這時代，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藉諸海賊的活動來發展貿易，實與此種情勢有所暗合。此種貿易，竟由朝鮮半島南部達於中國沿海一帶。

在大陸上，元朝滅亡明朝興起後，於沿海地域久以貿易爲業的商人們，依然與日本商人握手提携，而暗中繼續着貿易。蓋世代遞變而情同一理，中國文獻所表現的政治權力，與其權力對象的社會實體之間，實存在着頗大的差異。關於當時的貿易，亦須留意於此。明朝的宮撰史籍，曾載有日華兩國貿易商人常行共同釀成暴動的事實，這不過只是表示：中國的現實會使他們反抗權力不足政府方針而行動過而已，其實，當時確曾在非常密切的關係上，繼續着互相謀求利潤的貿易。

在朝鮮半島上，高麗滅後李氏朝鮮代而興起時，對於半島的貿易關係，也曾非常密切。而日本商人更進出於南方，以琉球爲據點，渡航至暹羅、爪哇、斯麻得刺及安南或印度西海岸等地。此種南海貿易是在規定組織下來進行的，對於船長以下水夫的定位，通商使節的人員，搭載物的品目等，均行加以限制。渡往該地的貿易業者，賣出由中國携來的絹布陶磁器等，再換爲香料，將之輸出於中國或朝鮮。此種事實，已由朝鮮的史料「李朝實錄」及琉球的史料「歷史寶案」等闡明無餘。是日日本商人的目標，概可解釋爲主在獲得中繼貿易利潤之貨幣。

這時代，較葡萄牙商船進出東洋約早二百餘年。當時在東洋海上活躍最甚者，唯有日本商船。

海外貿易如此愈見隆盛的同時，臨近大阪的堺及兵庫、瀨戶內海的室津、鞆津及尾道、北九州的博多及南九州の坊津等，也均成爲貿易港而隆盛起來。於是占有此等貿易上之據點的細川氏、大內

氏及島津氏等，其勢威亦日見顯著增大不已。細川大內兩氏在對華貿易上所起的激烈競爭，島津細川二氏以琉球爲中心因南方貿易而起的勢力擴張，均爲史上顯著的事實。而其他各地的大名們，亦無不各自從事貿易；試讀當時的朝鮮記錄，即可知年年會有多數的貿易船渡往朝鮮。

隨諸海外貿易的隆盛，貿易商人即增大其勢力，堺的商人們甚竟組織了類似議會制的自治體。此種貿易商人因資本上的關係，當然與京都奈良的寺院或神社也有所提携。而在堺、山口及鹿兒島等地，各以其富力爲背景，就展開了獨自的文化。蓋因應仁之亂以後，此等都市將離開京都的學者接來，而能優厚待遇使其活躍的關係。

明朝政府根據所謂中國思想，嚴守着對中國表示臣禮者始准其貿易的方針，曾要求足利氏自身的貿易，也採取朝貢的形式而使用「勘合符」。勘合符者，是爲防禦其海賊式的行爲，日華雙方預備割符二枚，二者相符，始認爲是正常的貿易。於是，以利用足利氏名義爲便宜的商人們，便在契約之下爲足利氏交納定額的利潤，從事勘合貿易。而此等貿易商的勢力，却漸漸輕視起武家政權來。

此等商人輸入了明朝的銅錢，及至銅錢的流用愈見顯著時，商人們的勢力則愈見上上了。他們利用其資本，或開始高利借貸，或開設酒家。而爲保護此等營業，更建造了用土塗造的倉庫。具有「土倉」者就是高利借貸商人，因而「土倉」就成了高利借貸商人的代名詞。原來，日本的倉只有與正倉院類同的木造倉庫，自鎌倉中期却有了用土塗造的倉庫。在這事實上，亦可見高利借貸商人的

擡頭了。却說，對明朝從事貿易的商人，以其利潤之一部作爲租稅納與足利氏，而承其保護，利潤即愈爲增大起來。足利氏以此種收入爲重要財源之一，其生活也更見奢侈起來，而下級武士們却因其由所領土地所得的收入漸見動搖，爲了生活上的困難，甚至竟典當抵押了武器之類。至於下級的廷臣，就只得典當書籍、樂器及家具之類。結果，「土倉」愈見富有，而下級武士及廷臣却愈見貧細。農民們陷入生活的苦境，債務亦日見增多。於是就捲起了農民及武士反抗高利借貸商人之壓力的動亂。當時，會稱農民爲土民，因而其叛亂亦稱爲「土一揆」；土一揆頻發不已，同時更接踵續發着上層武士——大名——等的勢力鬭爭。此種情勢，終於形成了爲應仁之亂以後的社會趨勢。

以這種不安的世相爲背景，手工業者及小賣商人即糾合同業結成組合，而謀求各自生業的保障。此即是前代所有的「座」更見組織化起來的團體。他們對其土地所有者的朝廷、公卿、社寺或大名等，繳納一定的租稅，同時也保障了營業上的特權，而推進了商工業發展的情勢。

因此種情勢，京都奈良固屬勿論，即大名之根據地或物資集散的港灣，在都市形成上也都得到了急速的發展。在此等都市中，均能生產大量織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了。而連繫此等都市的水陸交通也愈見興盛，因而也促成了「滙兌」之類的信用制度，商品配給機關的「問屋」也見組織化起來。

因於上述的關係，富裕者愈見富裕，由此等階級之間，自然就產生了新文化。

建造金閣銀閣的武士，已非如彼等祖先的一介武辯，而成了當代的新貴族，度着豪華的生活了。他們爲使其生活內容豐富，愛好着「御伽草紙」之類的文學作品，賞玩着「能」或「狂言」之類的演劇，而使茶湯、生花及庭園等藝術發達起來。在繪畫上，也曾產生了學習中國畫而獲出藍之譽的雪舟。此等藝術均係在高商化的大名等之觀賞下發展起來的，當時的建築及庭園等已盡豪華之能事，而更屬豪華的「古色藝術」，實亦胚胎於此時。

在簡素中來表現其洗練的內在美，即是所謂「古色藝術」。看來雖似有反豪華，而我却認爲那是豪華的最高表現。我甚至以爲「古色」是作爲莫大之財富的象徵而誕生的。固屬其中有禪之哲學要素的影響，也有文學的內省傾向。然而，裝飾茶室成爲荒僻的農家之一室，或模倣自然山水的庭園，縱即輕視了近處的豪華邸宅的存在，也是毫無意義的。「古色藝術」的背後存在着與此互爲對照的財富，將此對照具體表現出來，而使人意識到藝術的特別之一面，纔是「古色藝術」的內容。當時所稱的「幽玄」，亦有同樣的性格。那是能動的精神的發露，而絕非受動的，這種能動的性格就是使市民社會成熟具有了可能性的條件。

長期未輟的動亂之中，有才幹而有實力者，就將社會的權勢集中於一身。如此，不知何時竟以此等傑出的權力者爲中心，在地域上編成了數個集團。而爲解決因此種集團互相利害關係而起的對



立，在全國各地就續發了大規模的戰爭。這就是所謂「戰國時代」。其戰爭的結果，具有更大之實力者即見擡頭起來。如此，動亂的連續竟促進了全國統一的機運。應於此種機運，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便進行了統一的大業。他們爲了在混亂的日本樹立新的秩序，以展開天皇中心政治爲目標而努力於現實的調整。而其綜合的結論，就是奉戴天皇之命實行全國統一。

經過這困難的時代，京都皇居的歷代天皇，只是祈願着國土的安寧與國民的福利，而身居激烈的動亂之坩堝中的大名等，也懷有其體實現歷代聖主之意志的希望。明敏的信長亦以此爲理想，企圖擴大自己的實力，而邁進實現此種理想。正確的繼承了信長之方針而更使其發展下去的，就是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

以上，無非概略的觀察了當代的主要潮流，在次講中，將首先觀察信長及秀吉的努力，再檢討德川家康所創的新武家政治之性格。同時，略述日本歷史中最饒趣味的一章，即葡萄牙的來日及耶穌會的活躍，最後則考察一番直至鎖國爲至的經緯。

## 第六章 國家原理的檢討

諸君或曾遊過日本三景之一的有名的宮島。幽美的瀨戶內海諸島嶼之一的嚴島，以其葱綠的島嶼作背景，而浮在寧靜的海波間的朱色大島居。壯美的神社的迴廊。在那裏依然傳流着八百年前的日

## 本建築美。

遊過宮島的諸君，未久即將由車窓裏望見廣島城，而使人覺到與先刻所見的宮島迥然各異其趣的雄大規模。繼而，即將望見岡山山城之黑色的天主閣及姬路之雪白的天主閣。諸君若在大阪下車，一定猶將驚訝於花崗岩築造的大阪城門；同時，亦可仰望近年來模倣舊形而建造的豪壯的天主閣。

經京都而通過琵琶湖畔的諸君，不久，即將望見在夕陽映輝中高揭金鯨的名古屋城，而使人再度想起與廣島、岡山、姬路及大阪同型的城廓。於是，便在白扇倒置的富士山的忽隱忽現中，而到抵東京驛。東京下車後，即可拜瞻與近代的建築物形成對照的宮城，而接觸古時的日本姿態於眼前。於是對於城廓的印象更將深刻一層了。

此等城廓之代表的建築樣式發達的時代，正是葡萄牙人渡來後，西歐文化日見移入的時代，其樣式是前此所未有過的。

從來的城砦不過是利用天然障碍物的木造兵舍。唯使用火藥以後，從來的戰術驟然一變，對於城廓的建築也給與了頗大的影響，遂採用了堅罕的城壁、深濶的城壕以及鐵釘重重的門扉。當時，群雄割據的時代漸趨末期，已經現出國內統一的情勢，因離亂時代而生的此種城廓，在防禦敵人的同時，也成了日常生活的邸宅。所以外觀極為豪壯的城廓，其內部裝飾也極為華美。

諸君當能知道：在日本的建築樣式中，以所謂「書院造」為最豪華壯麗。東京的歌舞伎座雖僅模

做了其樣式，而京都的西本願寺，却是按伏見城所有的原樣做造的。大德寺及西本願寺的唐門，也是這種豪華壯麗的建築之一部。此等均爲前述城廓樣式完成時代的所產，即距今三百餘年前的遺物。

此等豪華壯麗的建築之內部，曾置有與其觀外足可媲美的傢俱，諸君在博物館或美術展覽會中所見的金銀箔的豪華障壁畫，均係按置在此等豪華壯麗的建築物中的。

此等雄大的建築物與美麗的障壁畫，均與從來的遺物不同，以不含有任何宗教色彩爲其特色，且其創造魂魄的豪放，實與歐洲新興的文藝復興的文化，具有一脈相通的地方，此實爲趣味深盈的現象。前文概已述及，繼哥德所說的「戰爭、商業及海賊是不可分離的三位一體」的時代而來者，卽爲文藝復興時代，然而與歐羅巴並駕齊驅，在我們日本也有過互爲前後不相上下的時代。我們將這趣味豐饒的時代，以下文的故事來說明之。

西曆十三世紀前後的作品「三修道僧的故事」中，曾有過下記的故事。

三個修道僧正徘徊於喬恩河——山地上樂園所流出的四大河流之一——畔的時候，山河的上流漂來了一枝美麗的樹枝，在這樹枝上，裝飾着發射香息的果實和美麗的金銀的葉子，修道僧看見這美麗的樹枝，就想像到上流必有美麗的林園，便信步沿河而行。未幾日，他們通過了美麗

的果實的森林，而到達了樂園的山崗。山頂上有極其快美的林園，充滿了甘美的果實與芬芳的香息。樂園的門限因爲手持火劍的天使守護着，未能輕易闖入。修道僧便逗留在門前，而苦思了五晝夜，始得天使許可，限定日數進入樂園。樂園自古住有名爲埃諾克和埃利亞的兩位長老，修道僧由這兩位長老嚮導，漫遊了樂園的各處，實地看見了不老之泉及善惡之樹等奇異風光。未久，即歸來凡世。

在這簡單的故事之中，實含有使當時歐羅巴人感到許多趣味的話題。其話題即爲歐羅巴空想爲地上之樂園，而尚未爲衆人所知的東方之亞細亞與歐羅巴關係。但丁的「神曲」中，繼地獄篇而出現的就是淨罪篇的地上樂園。這地上的樂園，我以爲就是歐羅巴人未來之活動舞台的亞細亞。

自古以來，即以爲是金島銀島或香料之島嶼的東方，隨諸歐羅巴內部經濟條件的成熟，忽然引起了歐羅巴人的現實興味。當時，藉諸與東方物資輸入港灣而繁榮一時的亞歷山大的交易，意大利的各都市也曾極爲殷盛。且因其商業的發達與文化的刺激，遂產生了所謂文藝復興的文化時代。而地中海的交易，也隨諸西班牙及葡萄牙的隆興，終於經喜望峰開拓了印度航路。在另一方面更發見了阿非利加大陸；結果，歐羅巴的船舶便接踵航至亞細亞來了。

進出印度的西班牙人，更進而來至中國，而終於到了日本。當時，日本正是織田信長將戰國離亂

的狀態導入新統一的事業漸見成功的時期。

葡萄牙的商船開拓了來到東洋的直接航路，而到抵印度時，使他們吃驚匪淺的，即是日本商船隊的發展。葡萄牙人豫想：在東洋也與地中海一樣，以爲阿剌伯人的活躍最盛。而事屬意外，在印度方面活躍的却是日本的商船隊。且藉日本人的誘導，始得到達中國沿岸；而他們又於其後到了日本。其目標當然是要求通商貿易的展開，將由中國購來的物資換爲日本的商品，而於其間企圖獲得利潤。同時，他們更藉耶蘇會，從事於基督教的布教宣傳。

在九州地方割據稱雄的諸大名，極希望山外部供給物資。所以其欲望偶與葡萄牙商人的目標一致，雙方就結成了緊密的貿易關係。

有名的耶蘇會宣教師法朗西斯克·嘉威爾，於天文十八年（紀元二千二百四十二年，西歷一千五百四十九年）到抵九州南端的鹿兒島。其後，陸續而來的宣教師數日日見增多。大村、大友及有馬等諸大名會得此等宣教師後，爲了貿易的利潤，竟轉爲耶蘇會教徒。同時，更使領內民衆也轉化爲教徒。爲將此新種情勢告報於羅馬法王，此等大名聽從了巡察使亞歷山大·瓦里那的勸言，向羅馬派遣了四名少年使節，他們先至葡萄牙的里斯本，而入羅馬，逾時八年，始於天正十八年平安歸國。

當時耶蘇會的活躍，與諸大名的權力鬭爭結合起來，愈見活躍，如大村等竟將長崎及茂木兩港讓

渡爲教會領地，以謀確保對於葡萄牙人的貿易權。

在九州各地如此獲得成功的耶蘇會，未久，即進至山口，在大內的領內布教，更入於近畿地方，與織田信長進行了密切的關係。信長准許其建築大教會堂；及至築造安土城時，更准其在當地設置耶蘇會的學校與禮拜堂。如此，以京都及堺爲中心，近畿地方也成了耶蘇會的堅牢的地盤。

然而在信長歿後，繼爲後任的豐臣秀吉，以爲耶蘇會的活動結果有違日本統傳，遂斷乎加以禁止。秀吉在最初對耶蘇會的活動亦頗抱有好感，然而，及至看破其活動內容係以貿易爲手段以布教的主旨，始慮及其結果將有反於日本的傳統。

秀吉禁止了基督教的布教，嚴命宣教師退出，更沒收了耶蘇會的領地長崎及茂木，而歸自己直接管轄。

爲理解使秀吉實行了這種斷乎的政策轉換的態度，須先述及爲戰國離亂的日本建設了新和平及秩序的信長及秀吉的態度，及其當代的大勢。

爲強化日本的理想及傳統的天皇中心政治，斷行了建武中興，而實行過征夷大將軍輔翼天皇的武家政治，在應仁大亂之後，征夷大將軍的權威墜地，各地大名獨自擴大其權力，而出現了所謂「戰國」的離亂時代。唯藉此離亂的時代，有名的大名除擴張其勢力之外，更想要實現以日本的理想與

傳統爲根據的政治了。大內義隆、毛利之就、上杉謙信及大友宗麟等有力的大名，各對皇室獻納巨額的金銀等，亦可視爲此種願望的表現。乘此機運而達到其目標者，卽爲以京都附近尾張地方爲地盤的織田信長。他在桶狹間戰敗了隣國的今川義元以後，着着進行統一的大業，終於進入京都，修築了應仁大亂以還殆歸荒廢的皇居，再興了各種儀式，而營造了伊勢神宮。他奉天皇之命任爲右近衛大將，再現了天皇中心政治，爲日本理想及傳統，明確的賦與了新生命。

信長對於耶穌會的宣教師，曾保持着友好關係。那是因爲要獲得貿易上的利潤，也是爲了要彈壓把持着封建勢力的傳教團。然而，其最後目的還是在於完成國內統一事業，而展開天皇中心政治。這種以國家原理再認識爲根據的運動，着着呈現了效果，全國統一的機運漸見萌芽，他便被部下  
的明智光秀殺害了。在信長的諸臣之中，與光秀相並有力的是羽柴秀吉。

秀吉在他的爭討軍陣中，曉知主君信長的橫死，立即回兵，在京都附近的山崎，擊破了明智光秀。繼而討滅了與他抗爭的諸大名，置其根據地於大阪，修築了壯大的城廓。此卽爲大阪城。

他將割據各地的諸大名，或用講和的手段，或用武力，依次使他們屈服下去，使其統治各自的領土，而對諸大名採取了委任統治的政治形態。

結果，他所設想的全國統一，大抵完成，他自己拿出巨萬資財，營造了豪華的邸宅「聚樂第」，

恭迎後成陽天皇駕幸，使先此集合該地的諸大名，於天皇駕前誓約忠誠之言。前此三年，他即由正親町天皇授任爲關白的地位；翌年，拜命爲大政大臣而賜姓豐臣。自平安以來，關白專爲藤原氏世襲，他得到這輔佐天皇的最高官位，就用上述的手段監督諸大名的忠誠。國民對於天皇的忠誠必須爲絕對的精神，此乃日本國家的原理，秀吉便認清這原理而來謀劃建設新體制。

秀吉爲造成專能從事農耕的農民，完全沒收了農民的武器，即所謂「刀狩」。戰亂叛離的情況，原由於強豪之輩驅使兵農不分之人民所致，秀吉策劃將兵與農分開，而常設專事戰爭的武士團。改變從來的莊園，組織爲自治的村落組織，用作社會組織的基礎單位。更關於各村落，實行了耕地面積、戶數及男女老幼別的人口調查，並將收穫量較多的地方，均作爲他的直轄地。

並蹈襲信長的方針，對於從來受着一定限制的商人組合的「座」，與以活動的自由，而稱爲「樂座」。又廢棄諸大名在領內所設的「關所」，使商品自由流通。調查全國鑛山，盡力集中金銀。調查貨幣制度，鑄造了所謂「大判」「小判」的金貨，抑制從來由中國輸入的銅貨的流通。施行此種政策的結果，都市顯著的發達起來，帝都的京都，秀吉的根據地的大阪，貿易港的博多，長崎兵庫及大津等地，都具備了都市的外貌。秀吉將此等經濟上特別重要的諸都市，均劃作他的直轄地，藉以努力確立新政權的經濟基礎。如此，隨諸財富的集中，恰如聚樂第的建築所示，便產生了「桃山時代」的文化。



國內組織大致整備之後，秀吉策謀建設天皇中心的東洋大帝國。於是爲征服中國，先進兵朝鮮半島而攻略了半島的大半。

恰於這時期，耶穌會的活動特別澎湃起來。蓋不僅是以傳布宗教與貿易爲目的，其內中實猶包藏着領土野心。秀吉看破此事，知道若是容其活動，即使通商上得其利益，而繼信長之後所完成的國內統一大業，亦將陷入殆危。於是將通商上的利益置諸度外，由保持國土安全的見地，實行禁止耶穌教徒的活動。然而對於熱烈的信奉者們，禁令的效果極其微小。因之，其後彈壓政策亦曾繼續一時，終於用了極端的體刑。真正得到彈壓的效果，尙在稍後的時代。

爲征討明國而開始的朝鮮遠征，並未收到秀吉所豫期的效果。六年後的慶長六年，他竟棄其未成的大業於身後而病死了。

秀吉所完成的國內統一，因其死去，復又呈現了分裂的傾向。此時，有德川家康者，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次於秀吉的太政大臣的內大臣）與勢力繼承秀吉之後；他在三河地方（隣近織田信長的根據地尾張）占有根據地。慶長五年，家康糾合東國諸大名，與擁護豐臣氏的西方諸大名的軍隊，戰於「關ヶ原」，而大獲勝利。家康遂於慶長八年（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三年），由後咸陽天皇授命爲「征夷大將軍」。

二年後，家康將「征夷大將軍」的職位讓與其子內大臣秀忠。這當然會奏請朝廷而得到了勅許。

於是置將軍的根據地於江戶，而修築了勝於大阪城的巨城。

家康繼「關白」秀吉而改行「征夷大將軍」的新政，勢必須將秀吉所統制的諸大名重行編制一番。因此，必須以某種方法除掉掉秀吉之子秀賴。他首先對於在關ヶ原之戰爲自己協力的諸大名加以優遇，使他們自己的親族出身的親藩，共同支配全國主要街道及都市，更遷其他大名至僻遠的土地。此種基礎工作完畢之後，便用種種策術與豐臣氏徒生是非，終於在元和元年攻陷了大阪城而將豐臣氏滅亡。此時，家康頒布了爲統制大名已經準備有年的法令「武家法度」，來限制大名的一切自由行動。自此時期起，我們商人的海洋發展便顯著起來了。他們每年到菲律賓、暹羅、安南及爪哇方面從事貿易，商船數目非常衆多。更在此等地方的主要地築造日本人的市街，作爲活動的根據地，在當地獲得巨大的利益，同時携回各種商品歸國。由於如此獲得的貿易上的利益，當然增進了我國的財富。出航的商船因爲必須持有德川氏的貿易許可證，因此，德川氏所得的財富也達於巨大的額數。

此外，對於耶蘇會的活動，在施行貿易的範圍內，家康並不加以制壓，反而與以歡迎。不過對於與貿易形影相隨的宗教宣傳，却仍續行着禁壓的政策。國內統一的政策着着實現，家康的方針更被家光鞏固的組織成功以後，於寬永十一年，便禁止日本商人的海外航旅，同時耶蘇會的活動也嚴厲的被禁止了。自十三年以後，無論以任何理由，均禁止進出海外了。

居於將軍的地位而完成天皇中心的國內統一，乃是德川氏的責任。德川氏爲了完成其責任，即使拋棄貿易上的利益，也不得不對耶穌教徒施行鎖國政策了。其實際情形，試觀發出鎖國令的翌年，在熱心的耶穌教徒最多的肥前，勃發了所謂島原之亂的教徒反亂的事實，即可明瞭。此等教徒以耶穌會爲背景，只知道耶穌的尊嚴而不理解天皇中心的日本國家原理。對於他們或其他一般外國人的疑惑，由於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及英吉利人等彼此中傷，露出了歐洲對於東洋所懷的領土野心，因之，疑惑愈加濃厚起來。使德川氏不顧偌大的犧牲而斷然實行了鎖國政策的原因，即在於此。

## 第七章 鎖國政策的制約

在古杉葱蒼的密林深處，肅然鎮座於伊勢的皇大神宮，實顯示着自然與人工的嚴肅的渾合；來此參詣的日本人，均以虔敬的心意而額手頂拜，

皇大神宮的建築，夙稱爲「神明造」，其樣式實起源於遠古。這神宮雖然每經二十年則重新修築，然而在這靈域裏所有的杉樹，卻仍然保持着微小的苗木時代的舊傳統，而象徵着世代代發展下來的日本歷史。

京都的御所，自桓武天皇御代以迄明治維新的約一千一百年間，曾是七十二代天皇的皇居，雖幾

經修築，日本國民却還像對東京宮城一樣的崇敬着。

在伊勢的皇大神宮、京都的御所或東京的宮城前面，恭然頌拜的日本國民的態度中，頗可窺見日本國家原理一貫未渝的實相。

諸君大概曾經遊覽過日光。爲表示美景之足以使人留連忘返而輒及日暮的意思，有一處稱爲「日暮門」的陽明門。以此門爲中心，色彩燦然的堂宇比櫛相連，前面還排列着數十個巨大的石燈籠。這是在三百年前，爲祭祀創始「江戶幕府」的德川家康，由其子秀忠所建立的。其後更經其孫改築爲今日所見的豪華的神社。

最初建造這金碧燦爛的日光東照宮時，德川家的根據地是江戶城，「將軍」則居於該地。而京都的御所，還較今日尤爲簡素。現在的御所是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光裕天皇寬政十年），松平定信奉十一代將軍家齊之命，參考了舊時代的制度而建造的。其後，因火災燒去，又在安政年間再建起來。京都的三條大橋畔立有高山彥五郎的銅像，他所遙拜的不是寬政二年落成的皇居，而是在那時以前尙爲簡素的皇居。

現在所摘叙的事實，對於我們雖然多少有些不可思議之感，然而若不將此等事實理解一番，是不能理解「江戶幕府」當時的時代真相的。

我在前講中業經述畢：織田信長修理伊勢的皇大神宮與京都的御所，受任爲「右大將」，而展開了天皇中心的政治。更述及豐臣秀吉任爲「關白」，德川家康任爲「將軍」，兩者都繼承了同樣的方針。這三個人因爲再度認識了國家原理，纔成就了國內的統一。在這時期，以江戶城作根據地而重新開始了「幕府」政治的，雖然是家康，未久，他就向天皇奏請將將軍的地位讓於其子秀忠，隱退至駿府（現在的靜岡），協助於江戶城的秀忠，而盡力於新秩序的完成。然而於其中途，他竟在七十五歲時病逝了。當時正是元和二年。秀忠將他的遺骸葬於靜岡的久能山，歷時一年之後，又改葬於二荒山麓下，而將此處改稱爲日光。更在這廟前建造了神社，又奏請後水尾天皇賜與「東照大權現」的稱號，而稱其神社爲東照宮。

當建造神社時，與德川氏有親戚關係而稱爲「親藩」的大名，或自關ヶ原戰役即直屬於德川氏而稱爲「譜代大名」的大名等固屬勿論，即因戰役結果不得已而屈服於德川氏之統治的「外樣大名」等，也在神社前捐造了石製或銅製的鳥居以及巨大的石燈籠之類，藉以表示屈服於「幕府」的威力。因此纔完成了類似今日之東照宮的豪華的神社。秀忠死後，其子家光非常受其祖父家康愛撫，爲慶祝繼承將軍地位的幸福，遂計劃重行改築神社。寬永十三年（距今二百五十年前），纔造成現在我們所見的極其豪華的規模。其經費相傳爲金五十六萬八千兩、銀百貫及米千石。大名之中雖有以獨自的財力捐造五重塔者，也有些貧困的大名，自知自己的力量終難捐造出適於如此豪華之神社的建築物，就

在神社前的道路兩側，栽植了杉樹樹苗。那就是現在與鐵道線路併行的巨大的杉樹行列。

家康任「征夷大將軍」之後，展開了天皇中心的政治，他的後繼者秀忠與家光，也繼承了他的方針。他們以爲維持此種政治形態，縱在將來也必須賴諸德川氏。他們以爲侍奉天皇即是德川氏的專責，所以纔使日光成爲具有政治意義的聖地，而藉諸所謂「東照大權現」遺訓的形式，對於各方面強制實行了嚴重的統制。

這事實只是表示秀忠與家光未能充分理解國家原理；遂成爲「幕府」政治崩潰的根本原因。

首先留意於此等事情而不得不追討考察者，就是德川氏在國家統治上究竟講求過何種方策。而猶須注目者，就是前講中所述的鎖國主義，結果竟完成了與從來的時代完全相異的新秩序。

所謂德川幕府的政治組織，自家康至家光的期間之中，雖然逐漸整備就緒，而當時似乎尚未稱其政治組織爲「幕府」。其政治組織也不過是將其機關——家康任爲大名而領有三河時，爲統治其領內而設者——移到了江戶城而已。他自從被後水尾天皇任命爲「征夷大將軍」以後，便略稱爲「將軍」，更在「將軍」之下設置了「大老」「老中」及「若年寄」等，而使之輔佐政務。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幕府」。設置這三個機關以後，又設置了監視諸大名的「目付役」與掌管行政、司法及立法的「奉行」。「奉行」之中有掌理財政的「勘定奉行」、江戶長官的「町奉行」、以及司掌社寺統制的

事務的「寺社奉行」等。此等官職就是「幕府」的中樞機關。

當時全國的米收入，曾評價爲二千八百萬石。德川氏直接管轄着其中八百萬石收入的生產地域，而稱之爲「天領」，藉此支持着直屬武士團「旗本」的生活。此外，更直接管轄着與全國主要都市港灣鑛山等在商工業發展上具有密切關係的地域，也就是與封建的政治支配相依並進，還企劃着確立對於商工業資本發展的絕對支配勢力。如此，德川政權就具有了二重性的基礎。

所有的大名都屬於德川政權的絕對支配，在所承認的範圍內構成與德川政權大同小異的組織，以之統治各自的領內。在這一點上，勿論是擁有百萬石收穫的大名，或只有一萬石二萬石的貧困大名，卻殆乎相同。所以由表面上觀之，德川政權也是與其他諸大名具有同樣的構成與基礎的封建領主。不過所有的大名爲了對德川氏表示忠誠，都在江戶設有邸宅，以妻子作人質留於該處。大名自身也率領家臣，隔年晉京一次，爲德川氏獻上種種貢物。同時還得履行維持市內治安等義務。所以身爲封建領主的他們，均被置於嚴格的制約之下，成爲所謂「武士」階級的都市生活者，而完全是遊離於生產的存在了。爲維持以大名爲中心的武士生活，在他們的嚴重的統制之下，能專門從事於米之生產的農民層，是極其必要的。直接監督此等農民的，在地方各村中是「名主」或「庄屋」（恰如現在的町村長），補助此等「名主」或「庄屋」者有「組頭」，農民的代表者有「百姓代」。更使農民以五戶爲一組合，稱爲「五人組」，而形成了自治組織。——這組織與大化改新當時的

「五保」制度頗爲相似。

爲了觀察當時的農民層在生活各部門上究竟受過如何嚴重的統治，現在可以提示出一個例子——這是當第三代將軍家光時代，於慶安二年時公布的有名的告示。該告示上曾有「嚴守政令法律，尊重地頭代官，而以名主組頭爲生身父母」。更爲戒告名主組頭，有「尊重地頭代官，完納年貢，勿違政令法律，須令小百姓各善其事」之句。此外尚有下列等句——

一·晨起割草，午中耕作田地，晚則或紡繩或編草袋，萬事不可疏忽。

一·不必購飲茶酒，妻子亦同。

一·百姓無智，不慮將來，是以每至秋收，恒使妻子濫用米及雜穀。當以正三三月爲念，節用食物。蓋雜穀最屬重要，故除麥、粟、稗、菜及蘿下等，其他雜穀亦無不可作，切勿多食米類。慮及饑飢之時，卽大豆葉、小豆葉、綠豆葉或平日之落葉，如濫行棄廢，亦係惜事也。

一·家主幼兒下人等，平日務食粗飯，但種田、插秧或割草等勞役過甚時，可使其較平日多食用之。果能如此，始可各勵其業。

一·男耕女織，莫分晝夕，夫婦必須共同勞作。卽美貌妻子，如不務夫事，或飲大茶，或遊山逛水者，可離別之。然子女衆多而受其前恩之妻子，則另論之。妻子雖而貌醜惡，而能留心爲夫生計者，須懇待之。



一·不必喫煙。蓋既不能果腹，累及將來，且耗時傷財，易成火災，有百害而無一利。此等法令，曾頒布未計其數。

爲了成立武士政權絕對支配下的農民層，特別具有莫大作用的，便是寺院。寺院雖然會與大名對立而發揮過巨大的封建勢力，其後卻完全轉化爲報效武士政權的機關了。鎖國政策的結果，頒下了關於耶蘇教徒的嚴重的禁令。同時，爲逼迫耶蘇教徒改宗佛教，曾強制要求一切農民成爲直屬於佛教各派寺院的「檀家」。這組織也曾利用於徵收租稅，所以寺院竟由宗教的存在轉化爲政治的存在了。全國寺院都要受「大寺」——在同一系統寺院中占有最高地位者，即所謂「本山」者——的絕對支配。而每個「本山」又都藉「寺院奉行」而直屬於德川政權。藉此種「寺院奉行」——「本山」——「寺院」——「檀家」的體系，「檀家」與寺院所結合的關係，遂構成了德川政權的下級機構。

如此強化了「士」「農」所形成的封建樞軸。同時，更使從事商工者各專其業，而不許其轉化爲「士」「農」，這兩個階級均爲德川政權或大名猷納一定的租稅，自治從事營業，普通呼爲「町人」，在身分上認爲頗屬卑賤，非但不能「苗字帶刀」（即稱呼姓氏而佩帶刀劍之意），若有侮辱武士的言行時，還要當場被殺。因爲那時還有着「斬捨御免」（生殺與奪各屬自由之意）的習慣。

對於商工業者，雖然有以政策爲根據的制約，隨諸國內和平的展開，商工業突破了這種制約，卻

顯著的發達起來了。「町人」的勢力向上增高，逐漸壓迫起武士團來。而這壓力卻以增激租稅的形式轉嫁於農民了。這是因爲武士團全體將從農民身上所得的米——代租稅而納者——換成貨幣，只在江戶或他們的領內都市中，過着不事生產的生活的關係。

江戶自從成爲德川政權的根據地，因爲德川氏直屬的武士團、在當地擁有邸宅的諸大名武士團，以及集合於其周圍的商工業者，竟急激的發達起來，一躍成爲擁有人口五十萬以上的大都市。其後愈見發展，在元祿時代，據說人口竟達一百四十萬。這較之當時歐羅巴最大都市的倫敦的入口七十萬，實已顯示出是世界的最大都市了。而諸大名的領內中心地，也與江戶的發展大致相同，逐漸成熟爲都市了。西歷一千六百十年（慶長十五年），恰在東方探險途中的唐·羅得里哥，向西班牙國王報告日本各種事情時，會謂——

該國……分爲六十六國……有多數之都市，土地廣大而人口稠密，清潔爽朗而次序整然，縱在歐洲也難發見堪與比譬之國家。

此語當非虛言了。

江戶、大阪及京都等大都市，各有其獨特的政治組織，江戶有「町奉行」，大阪有「城代」，各自掌管其市政。江戶的「町奉行」還有三名輔佐事務的「町年寄」。幾達千數的小都市，各有其當地住民選出的「町役人」，在其指示之下運用町政，而形成爲一種自治組織。

整備了山「士」「農」及「商」「工」等每兩個階級所形成的社會體制以後，更爲圖其維持久永，便需要某種指導原理了。於是就採取了獎勵學問的重要政策。在學問的獎勵上，爲構成德川政權的合理性，曾採取兩種方策。其一：卽再檢討或強化日本武家政治的傳統；其二：卽按原來形式來採納中國古代的封建政治指導原理。於是，對於第一個目的，就將鎌倉政權之記錄「吾妻鏡」，視爲武家政治的聖典，使武士熟讀，利用朝鮮傳來的活版術，印刷此書，而頒發於各方（當時曾改「吾妻鏡」改爲「東鑑」，在文字上表示了地理的合理性）。對於第二個目的，就採用專攻中國古代思想的學者，更爲養成此種學者，創設了名爲「昌平黌」的學校，專行研究中國古典。

此等方策雖然一切都是爲了永遠維持德川政權，不過採用此等政策的德川政權，究竟如何考慮着天皇中心的政治呢？

諸如上述，天皇曾將日本政治上的實權委任於將軍，將軍便以保護天皇爲自己的責任了。此時，德川氏在平安京（京都）御所附近建築了二條城，爲代理將軍而派遣大官「所司代」者住於該處，專行任擔警衛天皇及市內治安。所以天皇在皇居之中，也可以安然專事祭祀皇宗而攻究學問了。天皇所攻究的學問，概爲日本的古典，或回顧皇祖皇宗的種種事蹟。在這時代，藤原氏一門依然繼承着平安時代的傳統，以「攝政關白」的身分輔翼着天皇，而且因爲國內統治實務均委任於德川氏的關

係，德川氏以外的諸大名，是不准直接報效天皇的。因為只有德川氏能奉天皇之意來擔當政局，而使其他大名僅可經德川氏之手來報效天皇的形態，在維持政治秩序上是極其必要的。

在這種情勢之下，德川秀忠爲蹈襲平安時代藤原氏所用的方針，也就是爲了獲得皇室外戚的地位，就將其女和子獻上後水尾天皇，其後所生的皇女，就是繼後水尾天皇而即位的明正天皇。明正天皇退位之後，後光明天皇即位，後光明天皇雖是後水尾天皇的皇子，而其母卻非秀忠之女，所以明正天皇以後的天皇，已經沒有德川氏的親緣者了。

經德川氏完成了此種秩序，以天皇爲最高的精神權威，以將軍爲世俗的最高權威，纔出現了二元的體制。

要想直截了當的譬喻德川政權，也可以稱其爲扮裝奇特的人相；一隻腳上穿着木履，一隻腳上穿着靴子。木履表示依存於農業生產的自然經濟，靴子表示以商工業爲基礎的貨幣經濟。因爲兩腳的鞋履迥然不同，所以步行困難。同時右手執着鞭策，左手執着利劍，鞭策是法律或命令，利劍是武力。而口中還吹着號角，這號角也發出兩種音響來，雖然同是鼓吹封建制度的精神，却一爲中國調，一爲日本式的鎌倉調。更爲增加其威嚴起見，在鼻下還貯下了黑鬚，這便是封建至上主義。

若能將木履與靴子的步伐調合一致，是毫無問題的。然而因爲兩種鞋履各有其勢難相容的特質，

所以脚步也就極欠安定。這時代的文化根抵上，實有着這種矛盾。

秀忠家光兩將軍時代，由他們及其直屬武士階級所造成的社會體制，在家光將軍時代中便現出了內部的矛盾。「町人」的實力驟見擴大，與武士團政治的統制對抗起來，而武士們爲了自己的生存，是不能無視「町人」的。所以就採取了與「町人」通婚的政策。

諸大名必須從領內農民身上得來租稅的米，將之賣與「町人」而換來金錢。所以西部的大名在大阪，東部的大名在江戶，就各自設置了所謂「藏屋敷」者，運出領內的產米來賣給「町人」。因此，「町人」得以富裕，而逐漸過起奢侈的生活來。此外，在各地都市生活着的武士，其生活也奢侈起來，然而這卻反而成了對於農民的壓迫。這種狀態漸次進展，諸大名便指望着次年的收入由商人借款，武士團全體不得不爲「町人」意志所左右了。

結果，諸大名雖然展開了諸種新政策，例如增稅、開拓新田或獎勵產業等，然而卻莫可奈何於時代的大勢，「町人」的財力愈見增大起來，諸大名便不得不屈服於江戶、京都或大阪的「町人」面前，來懇請疏通金融，以彼等的應諾來決定一年間生活的能否。既是此種狀態，武士的政治支配就只能成爲表面上的存在了。

繼家光之後的第四代將軍家綱時代，凡三十年，就進展着前述的情勢。現在我爲說明當時「町

人」愈見擡頭的情形，來敘述一段有趣的故事。

當時，江戶有個名爲石川六兵衛的富商，他製作了非常豪華的衣裳，令其妻子携着去往京都。京都都有個名爲難波屋十衛門的富商，竟成了他的競爭者。十衛門在緋色的綸子上，精繡了京都名勝圖，使他的妻子穿用起來，江戶六兵衛的妻子身穿染印着南天樹的黑紫綢袍子。當然勝利要歸京都方面了。然而仔細觀察江戶的衣裳上的南天花紋，卻完全是珊瑚珠的，於是終歸是江戶勝利了。

由這故事中，我們可以知道：當代已經是商人們自由濶步的時代。同時也可以知道：武士政權的體制已經開始崩潰了。

家綱死後，山靈元天皇任命爲第五代將軍的是綱吉，他對於動物實行了極端的博愛主義，以自己的人生年恰值戌年爲理由，或對殺犬者處以死刑，或對殺燕一隻者處以流刑等，因此非常有名。因爲這將軍的時代年號是「元祿」，所以就稱爲「元祿時代」。前任將軍時代的社會動向或經濟動向既如前述，所謂元祿文化者的性質如何，當然也是不難考察出來的。

爲了知道產生元祿文化的江戶民衆生活發的達狀態，茲擬關於當時名作家西鶴的代表作「日本永代藏」中所描寫的吳服店，加以敘述。

現在，諸君都知道在東京日本橋有「三越」百貨店者。直至大正十二年大震災之後未久，還與

「松屋」「松坂屋」「白木屋」等同樣稱爲「三越吳服店」；「吳服店」的名稱就是元祿時代的遺物。元祿時代伊始，有三井家第三代家長，即現在三井家的祖先三井八郎左衛門所經營的「越後吳服店」，開設在現在的「三越」的地址（西鶴稱該店創始者爲三井九郎左衛門）。該店爲長九間橫四間的大建築，一切均爲現款交易言不二價，置店員四十餘人，每人分擔販賣一種商品，譬如金克絲、紡綢及毛織物等。就是一寸四方的天鵝紙也可自由裁賣，而且需急的衣服，更可以用數十名裁縫當場裁製交貨。所以商況非常繁盛，據說每日能有一百五十兩的賣項。由元祿時代即曾如此的這個商店，其後愈見繁榮，明治初年改爲「三越吳服店」，而終於成爲今日那樣具備着現代設備的「三越」百貨店了。夙稱爲世界最古之百貨店的巴黎的「朋·曼霞」，開設於西紀一八五二年（嘉永十時）；英國的「哈羅得」商店或「威廉」商店，以及美國的「喬且·瑪休」等，均開設於西紀一八六十年代（明治維新前後），由這事實觀之，我國店舖歷史較諸外國實在是悠遠了。

元祿時代前後的時期，也有過較爲進步的銀行。在「越後吳服店」的隔鄰，曾有三井八郎左衛門設立的「三井兩替屋」，這就是現在於「三越」隔鄰顯示着堂堂之威容的三井銀行的前身。富於企業心的三井家，在京都與大阪也設立了同樣的「兩替店」，而爲防止江戶大阪間現金輸送的危險，更設立了匯兌制度。當時，英國還未創立英蘭銀行，曾盛行着所謂「金銀工藝者的匯兌票」，此「金銀工藝者的匯兌票」夙稱爲「銀行紙幣之起源」，既可當作存款提用，更可借出，實具有經濟媒介

者的作用，乃是金銀工藝者所發行的一種匯兌。元祿時代的江戶不僅人口爲世界第一，同時也有着  
他國罕見的進步的經濟組織了。

這種經濟組織的發展，藉諸利用江戶京都間之大路「東海道」而陸續流入江戶的商業貿易，大見  
助長，隨諸其發展，交通也頻繁起來。諸君大概知道描繪東海道風景的廣重之浮世繪，那便表示着  
這交通大動脈在當時的異常發展的狀態。同時更以「東海道」爲幹路，在全國鋪設了道路網，江戶  
大阪間的海路也具有了頗大的重要性。因爲西部地方諸大名要往赴江戶的邸宅的關係，這街道當然  
也就發達起來了。

「町人」所求的利潤之泉源是大名的財囊。所以對於封建制度力行反抗而望其崩潰的「町人」，反  
而希望其繼續不滅了。而藉這制度的續存，就蓄積起資本來。其中，我們可以發見世界史上的一  
個珍奇事實——即擁護着封建制度而發達起來的特殊的資本主義。在這種社會情勢中，勢力日見增  
大的「町人」，在政治舞台上雖然未能對武士階級對抗，而在較爲自由的方面，例如在衣裳遊興等  
類的日常生活方面，却表示了反抗的態度。農民雖然因爲封建社會的續存而受着法令的重壓，但是  
具有經濟實力的「町人」，卻受着較爲寬大的待遇。武士政權當然也對他們要求着生活的簡朴，令  
其禁止使用高價的衣服或耽溺奢豪的遊興。然而唯有此等禁止事項，纔是他們希望未已的。外觀上  
被禁止奢侈以後，他們就爲衣服裏面或內衣投下鉅大的費用，用避免人目的方法，來行使他們的富



力。不過所謂避免人目，並非就是元祿文化的特質。爲了反抗武士之政治的或社會的優越感，有時也慮及沒收的酷遇，便將他們的財富誇耀於家瓷器皿或遊興上。關於此事，表現得最顯著的，就是江戶的吉原、京都的島原或大阪的新町等地的北里。在北里中，武士與町人爲了獲得妓女的愛情，一方假藉威力，他方只倚富力，而互爲爭峙不下。對於威力與富力不善取捨而煩惱不已的妓女，其心情就成了戲劇上最有魅力的主題。在此種社會狀態裏便產生了「歌舞伎」，遂次整備其形式而終於發達爲偉大的戲劇了。此外，採取北里生活或劇臺風俗爲題材的浮世繪，也是在同樣的社會背景下發達起來的。

著名的四十七義士復仇，其背景也是如此的。這故事非常有名，在本文裏雖然無從詳述，不過關於其社會意義，卻需要叙及一言。這事件完全暴露了由武斷政治到官僚政治的轉向。四十七義士所要打倒的幕吏吉良上野介，曾經強求賄賂，他的性格裏頗有「町人」那種對於金錢具有莫大關心的性格。四十七義士所以奮起而斷乎與以制裁者，實是對於吉良上野介——曾使他們的主君淺野內匠守切腹自殺——的行爲而發作的。所以他們的行動就被當時稱讚爲武士道的龜鑑了。這事件曾在當時的大衆之間喚起了莫大的關心，立刻就編成歌舞伎「忠臣藏」，而表現了當時社會的現實真相。總之，一方是吉良那樣的人物，一方是四十七志士那樣性格的武士，在這顯著的對照裏，頗可以看出武士性格的變化過程。也就是武士在「町人」勃興當時的墮落。

距義士復仇前八年（元祿六年），德川政權曾發令禁止諸大名、旗本以及其他武士等出入北里。距此二年前，對於旗本的經濟困窘，已經到了不得不講求救濟手段的關頭，同時又不得不救濟國內的衆多貧民，而且還要緩和財政上的困難，於是就屢次改鑄了貨幣。所以，除去少數富裕的「町人」，一般人民都苦於不安的世相中了。

以這種社會爲背景，就產生了近松的脚本、西鶴的小說以及宗達或光琳的繪畫等，而表現了絢燦的「元祿文化」的半面。

## 第八章 開國主義的前進

將日本國家及國民性格象徵得恰到好處的，就是日章旗和富士山。每次仰觀富士山時，宛如對日章旗同樣，便想起崇高的國家原理，再度認識了光輝的傳統，而以對於未來的無限的希望，鼓動起強韌的國民意慾來。因爲那恰如白眉倒置而兩條廓線高聳於中天的富士山型，立刻就會聯繫到承自先祖的絕對無比的國家原理之崇高。

天地初開闢 神社翩然降

巍巍富士峯 雄蟲駿河上

極頂擎天都 四海仰瞻望

旭日失其先 皓月時爲障

白雪永積存 浮雲不敢向

卻贊難一辭 萬世倚屏幃

這是千餘年前「萬葉集」中山部赤人的歌。這歌中的「心」，現在還是我們日本國民的「心」。赤人更繼續頌謂——

駿河斯山 鎮國之寶

其上有神 大和永保

率土臣民 仰止弗飽

千秋萬歲 如日皞皞

這山就是日本的「鎮國之寶」，由此感到「神」之存在的我們祖先之心，已被表現得直截畢盡。意爲「自天地出開，日本肇國以來，每瞻及肅然高聳於中空的富士山，幾乎白日無光，明月黯然，白雲似亦憚忌來往其前，而山頂上白雲永積不逝；唯有此山的雄姿，始可傳詠於永劫後世」。更結語謂「駿河的富士山，乃是象徵日本國家安泰的神相，實爲宇內之寶，百瞻不厭」等。

我們日本國民依然延綿着這種古代人所懷的「心」。山部赤人生於對中國文化接觸極爲密切的奈良朝，會如此仰瞻富士山而強調了國家原理的再認識。降至明治維新以後，接觸了歐美文明的現代

日本國民，卻以更爲強韌的「心」仰瞻着富士山。此等事實，諸如第二部所詳述者，已明確的顯示着日本歷史的特質，愈接觸外國文明，愈要強化國家原理，而使國民全體生活向上進展。

在不能接觸外國文明的鎖國時代，這種日本國民的「心」，稍見稀薄却是事實。然而因爲擬將脫出鎖國政策之制約的諸種情勢之進展，意欲追求真正日本形態的國民運動，卻逐漸擴大起來了。藉諸「日本書紀」「萬葉集」等古典的研究，國家原理已被再認識，並藉而批判了當代的現實。而這現實的批判，不久即成爲開國主義的勃興，終於促成了明治維新而出現了結實。

推進開國主義的是所謂「蘭學」的歐羅巴的學問。因爲這種新學問，對於從來以中國學爲根據而用特殊見解來追求日本國家原理的人士，更供給了深奧的內容。不過猶須附言說明者：就是當時的荷蘭係用爲對於日本的文化宣傳方法，始由歐羅巴全土廣羅人材送來日本，所謂「蘭學」，其實却是以德意志學問爲其主流的。慶安二年（紀元二年三百九年・西紀一千六百四十九年）來訪江戶的外科醫叟恩柏爾堅，與延寶三年（紀元二千三百三十五年・西紀一千六百七十五年）來日的植物學者安得烈阿斯，克萊爾等，均係德人。繼此二者，於元祿三年（紀元二年三百五十年・西紀一千六百九十年）來國的堅柏爾，以及文政六年（紀元二年四百八十四年・西紀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來國的西勃爾特等，均不得不銘記爲導日本於開國主義的德意志人。

關於富士山，堅柏爾曾謂：「其狀貌恰如圓錐，自巨大的底部起，頂端漸細，由四方望之，形狀

均等，姿態絕美，規模雄大，實可稱爲世界無比之美山」。而西勃爾特謂：「圓錐形的富士山佳景」。均以山容之壯美爲其問題中心。然而日本國民卻不僅止乎山容的壯美，而更感到了其中所含的精神的情操——國家原理的崇高，而將之聯繫於自己的「心」上。這與山日章旗而意識到國家原理的我們的「心」，是同出一軌的。

古來日本人所仰瞻的富士山，並不是巨大的壯美的土塊，而是具有崇高意義的精神之象徵。將這觀念再現於現實的契機，就是明治維新。而在誘導明治維新上，曾有過重大貢獻的，就是成爲開國主義之根柢的科學精神。以下於本章中將其事實究明一番。

在前述的情勢之下，德川政權的當事者採用了鎖國主義，並在維持手段上，強化了封建制度；然而其後因爲商業上的顯著的發達，卻與此種情勢有了相反的性質。而且商業的發展又促成了交通的發展，當元祿時代，連絡國內各地的道路及航路已經略見完備，所以爲了維持封建的封鎖經濟政策，只得另行講求適當的手段。繼元祿時代之後，將軍吉宗所實行的改革，在這一點上實具有獨特的意義。

吉宗於二十一歲時任爲紀州藩主，三十二歲時繼宗家之後，蒙御門天皇授命爲「征夷大將軍」，他所實行的二次改革方針，就是禁壓社會全般的奢侈，而增加殖產力。前者主爲禁壓「町人」的奢侈，

而更波及於武士團，藉以輕減經濟的消費；後者是爲了維持武士團的經濟地盤，而誘導開拓荒地、獎勵養蠶或栽培馬鈴薯等。然而禁壓奢侈，對於「町人」非但毫無效果，反而愈見激烈。且自從家康時代以還，鑄造數次的貨幣，各異其質，其質又復漸次低下，終於成爲當時經濟界動搖的最大原因。吉宗雖然將貨幣改爲良質者，却與家康時代的貨幣相同；而因此米價低下，反而增加了武士團的困難。同時對於農民階級的強壓也愈見激烈。於是便實行了提高米價的政策，減少米穀數量，設置交易機關，更獎勵酒類的釀造，以期消費米穀。然而此種手段並不能輕易顯出效果。當時，雖曾有一年間，九州四國及中國地方，因發生蟲害而米價急驟騰昂，而大勢仍然如故，還是向前述的方

向進展着。生產米類的農民窮困增大起來，藉爲財源的武士團當然也要愈加困難下去。只有「町人」，還能使其實力向上伸長。對於將實武士團的摩擦，在吉野的北里等地現露到表面上來。歌舞伎劇「助六」，曾博得當代觀衆的好評，其後逐漸整頓其形式而傳流至今；該劇在吉宗受任「將軍」以前不久（正德三年），以第二代團十郎在江戶山村座的演出爲其嚆矢。登場現身的武士都具有類似「町人」的性格，頗堪注目。歌舞伎所以能爲民衆所愛好而漸次發展者，或是因爲能表現町人化武士與町人之對立關係的緣故罷。

第八代「將軍」吉宗試行各種改革之後，家重、家治、家齋及家慶四「將軍」，各以田沼意次、

松平定信及水野忠邦等，採取了以吉宗之改革方針爲根據的種種政策。此等政策都是想要壓迫農民階級以保持武士團的地位，或改鑄貨幣而低落本質，藉以減少「町人」的積蓄財富。

在這種政策之下，農村的貧困非常顯著，往往使當代的世情不安起來。上述的政治家等也就盡力強化着輒則動搖的政權。試觀遺存於今日的「德川禁令考」等法令集，即可明瞭當時政治家所努力的方向，同時更可看出武士團以外的社會，被置於如何的壓制之下了。

德川政權的當事者斷行了拒絕西歐商業關係的鎖國主義，而強化着封建制度，藉以保持武士階級的優位；而所謂「町人」的商工業者卻愈見抬頭起來。同時構成德川政權的武士團，自身也轉化爲過着都市生活的不事生產之遊民，與「町人」漸趨類似。確保武士團生活的唯一方策，就是強化對於農民的統制。然而其程度過甚時，便要發生所謂「百姓一揆」的反抗運動。在這期間內，儒教的古典教說——統制農民的指導原理，由報效武士政權的學者熱意的強調起來，恰如「士農工商」的字面所示，便強調了除「士」以外而重視「農」的教說。然而，在反面的現實現象上，因「農」擡頭而起的「士」的貧困，以及隸屬於這貧困之「士」的「農」的窮窘，卻愈見增大起來了。

蓋由理論上規定了「士·農·工·商」的身分，而獎勵「士」的勤儉尙武的原因，確是爲了保持已成爲不生產階級的武士團的支配權。「武士道」所規制的道德也不外乎此。在地主與其從屬農民中間發端的從屬關係的道德，於和平環境之下，成了遊民化武士團大小首領連繫其部下的道德，也

成了以世襲所領及貫祿爲紐帶的主從關係的道德。而且儒教的教說，對於這種道德是有所補益的。各知其命，各善其事，修養自己而忠於主家，尊重家系而勿辱於父祖之名，嫻武藝以鍊身心等，都是「武士道」的要義。違乎此道時便要自殺，也就是所謂「切腹」。而甚於「切腹」者，有時更命其一家斷絕。「忠臣藏」卽其一例。如此，封建秩序始得維持下來。

隨諸農民階級的貧困增大，在士大夫方面強調尊重其自身的教說，也是自然之勢。所以就試行努力儒教教說的通俗化而謀其普及，這就是所謂「心學」的思想。這是由供職於京都某商店的石田梅巖所倡導出來的，雖是論述封建治下的商人道德，此種適於現狀維新的說法，也被武士團採用起來，復由梅巖的後繼者手島堵庵漸次附以體系，便成爲農民統制的指導原理而實行於世了。

不過，猶當注目者，就是在上述社會中的武士團道德律的「武士道」，在明治維新之後，廢棄「士農工商」身分而展開四民平等的社會時，却完成了符合日本國家原理的日本國民全體的精神。爲了維持封建制的道德——「武士道」，竟擴大了天皇中心的國民全體的精神，而成了整備符合於國家原理的國民意識的推動力。換言之，卽連繫封建領主及其家臣的道德律，在明治維新時，廢棄了包含兩者的特別階級，同時更視爲翼贊天皇政治的日本國民全體的精神，而被前代「士農工商」的後繼者全體，嚴重的保守起來了。因爲明治天皇煥發的軍人勅諭的內容，就是以「武士道」精神爲基礎而擴充起來的。



明治維新後的「武士道」發展既如上述，爲追求日本國家原理而進行的日本歷史研究，不久即成爲巨大的國民意慾的昂揚，乃是當然的現象。關於此事，頗有一述其經路的必要。

以檢討日本原理爲目的的學術事業，最堪注目者，即爲水戶藩德川光圀所編纂的「大日本史」。光圀乃家康之孫，亦即家光之從弟，向學心切，六十餘年間，曾研究日本國家的歷史。由其研究而理解了天皇中心的日本原理，同時更提高了天皇委以政治實權的「將軍」德川家之地位與尊嚴，而合理化了德川政權的存在；更加重了德川政權之一翼水戶家的地位，尤爲堪以注目者。自該書編成後，皇室成了主家，同時德川氏的「幕府」便成了宗家，於是對於皇室與「幕府」關係，便產生了合理的解析的思想，而支配了水戶藩的行動。蓋該書所鍼砭者，即正確的認識國家原理而以之批判現實，也就是藉該書而產生了所謂「水戶學」，這終於成了明治維新的指導原理；而使德川政權解散者，也是水戶藩出身的德川慶善。

與「大日本史」同出一轍，新井白石爲將軍家宣所講的「讀史餘論」，也頗堪注目。他在元祿時代至德川政權動搖日見顯著時，爲山歷史上解釋其政權的合理性與永遠性，曾主張唯有武士團的勃興纔是日本政權的中心。概如前文所述，對平安時代末葉在鎌倉成立的新政權，加以「幕府」的名稱，繼承其「幕府」傳統者乃是「江戶幕府」，所以就對「江戶幕府」與以確固不動的位置。他這種

態度，即當其後研究日本古代史及政治地理時，亦曾如此表示。他的研究背景中，始終有他所報効的德川政權。而且他受當時的西洋學的影響，雖曾進行了精密的研究，唯因其對於國家原理認識不足，他的研究是無足稱爲日本學的。所以，現代的我們也就不能尊重他的業績。他以權力爭奪來敘述日本歷史的「讀史餘論」的史觀，竟使明治以後的歷史研究者，毫無批判的繼承下去，實屬遺憾之至。

所以追求日本國家原理而不陷於德川政權的政治機構，使開國主義以前的前進思想，未能產生於德川政權之中；而產生此種思想者，却是深感政權壓力於身邊而默默無聲的研究「日本書紀」「古事記」「萬葉集」的學者。

研究此等古典，自能理解日本開國以來的國家原理究爲何物。將天皇中心的國家與國民的關係，與現實時代互爲比較，而追慕武家政權未曾存在的時代；同時，更可成爲對於德川政權的批判。在這種古典研究之中，給後世以重大影響者，就是荷田春滿、本居宣長及平田篤胤等的業績。至於展開現實政治運動的學徒，則爲竹內式部、山縣大貳及藤井右門等。前者只是當作學問來研究國家原理；後者卻爲領導現實的社會觀而追求了國家原理。然而此等學問運動上，並無根本否定德川政權的實踐性。而漸次附以實踐性者，卻是政治的或經濟的時代動向。唯有對於歐羅巴學問的理解所給與日本學發展上的影響，卻是足堪注目的。猶以論理學的理解，更對於國家原理的理解有過莫大的

貢獻。

因日本學的研究漸次擴大，德川政權漸受世間批判時，在向反的立場上顯示了同一傾向的，則爲歐羅巴的學問。歐羅巴的學問是由航來長崎（當時對於海外各國開放的唯一海港）的荷蘭所攝取的。但恰如本章開首所述，被荷蘭人所僱用的德意志人曾有過莫大的貢獻，是頗堪注目的事實。

元祿三年航來的德意志人堅柏爾，曾由各方面研究日本，這是因爲對他加以援助的日本人頗多的緣故。所以亦可想見當時日本人曾屢次獲得理解歐羅巴諸種情勢的機會。其後未久，授命爲「將軍」的吉宗，爲了強化已見弛緩的封建秩序，曾研究了天文學及藥學，藉其新知識企圖農業的新發展。其後，德川政權的當事亦曾盡力攝取歐羅巴學至某種程度，也輩出了譯過「解體新書」的杉田充白及前野良澤等西洋派醫學者，而促進了醫學的進步。最初隨來日的荷蘭人醫者學習的人，皆各成一家了。德意志的威爾次布爾克人西勃爾得，由荷蘭政府派爲蘭領印度陸軍病院的醫官，繼而駐在長崎出島蘭館，對於醫學及其他科學造詣頗深，與日本人接觸而傳入了歐羅巴的科學精神，其貢獻實屬匪淺。文政十一年（西紀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在任期滿市將歸國時，發覺他秘藏着日本地圖，遂禁止其再次來日，而以其來日爲契機的開國主義之動向，竟使禁令稍見弛緩，遂於安政六年（西紀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又復來日。在這期間，他將日本各種情形介紹於歐羅巴世界，其功績確屬巨大。在日本國內，視爲荷蘭醫學而傳流下來的德意志醫學，也日漸發達起來，隨諸明治維新以後的

各種改革，終於形成了現代醫學的驚人的進步之根柢。

文藝復興以後，以新體制逐漸進步發達的歐羅巴情勢，藉諸所謂蘭學而被日本人理解起來，更產生了林子平等優秀的兵學者，著「海國兵談」等書而力說了嚴設國防的必要。猶其由於此等通曉外國情勢者，對處俄國南進的國防之必要，也漸被熱心討論起來。諸如前述，在另一方面，因為歐羅巴學的影響，對於日本國家原理的理解，愈見深切，此種情形互為倚借，對於強行封建支配的德川政權的批判，愈驟高昂，終於成了開國主義的前進。而開國主義與鎖國主義的爭論也就逐日激化起來。

諸如上述，根據上述的學問智識的潮流，應於客觀情勢的進展，逐漸增大其勢力，終於成了推倒德川政權的原理。唯堪注目者，就是在這德川政權顯示其威力的時代，國民全體尊崇伊勢皇大神宮的一貫態度，仍繼續如故而無稍或渝。民衆每戶各設神龕，均供奉皇大神宮，而朝夕禮拜不弛。而且他們在桃花季節舉辦所謂「雛祭」時，必祈禱子女之成長；在「雛祭」時的內裏雛，就象徵着天皇與皇后，而對之表示尊崇之意。雛祭所以發達於平安京（京都）者，是因為這都門會長期是皇都，而且在三月三日雛祭當日，御所的門限左右大開，民衆能親表祝意。由此足以窺知國民全體對於天皇繼續尊崇的一端了。

這時代的政治的或經濟的體系，雖有鎖國政策的制約，當因其內部商工業的發達而顯出動搖之預兆時，許多思想運動就勃興起來；擴大了這種動搖，當與歐美諸國的交涉愈見頻繁時，其動搖更是顯著無疑了。

荷蘭繼葡萄牙攬握了東洋貿易之霸權，在爪哇的巴塔維亞設置了總督府及東印度公司，以該地為根據，致力於對於日本及中國的貿易，而其本國產業中最居重要的紡織業，却漸為英吉利壓倒了。英吉利以新勢力向東洋發展，完成了印度的征服。當時，法蘭西尙動搖於革命的餘波中，英吉利自賢明的維多利亞女王即位以還，一舉抑扼了法蘭西。在東洋方面，遂以鴉片戰爭為契機，占領獲得了華南沿岸的香港島。這恰為距今百年前的事。

占領香港島的英吉利，於其四年後的弘化二年（西紀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派海軍上校柏萊查所搭乘的薩瑪蘭號入長崎港；更於其四年後的嘉永二年（西紀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閏四月，派海軍中校馬迭遜所搭乘的馬利那號入浦賀港。此係因前此為開始貿易而派遣的數次使者，均遭德川政權拒絕，想要設法打開難局，唯此種企圖終因德川政權的頑固拒絕而未得成功。

與英吉利接踵前來而熱望開始貿易者，即為亞美利加。亞美利加早於鴉片戰爭五十餘年，即西紀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天明四年），曾將中國皇后號派往廣東，獲得莫大的利益，邇來會屢次派出從事中國貿易的商船。西紀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天保三年）派遣特使羅巴特前來東洋各國，更飭以訓

政府雖擬另以使節派往日本國，倘若情況無碍時，閣下可即時至日本，要求開始通商。

而羅巴特却未來日。五年後，由澳門啓錨的莫利斯號，首次經山琉球來至江戶灣及鹿兒島，始見開始新交涉。

莫利斯號的希望，因德川政權的拒絕又遭失敗了。其後，被委以對日本締結條約之全權的駐清公使埃威列特，也因病未得來日，代理該人而昇爲初任公使的東印度中國艦隊司令長官畢得爾，率哥倫巴斯及賓遜斯二艦，於西紀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弘化三年）閏五月航來浦賀，德川政權依然是頑固拒絕通商。其後五年，於西紀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嘉永四年）航來的，就是有名的柏利。

柏利率領以薩斯開哈那號爲旗艦的密西西布、布利瑪斯及薩拉托卡等四艦，於四月，先到琉球的那霸，更於五月航入小笠原島的二見港，又復航回那霸，於六月三日航入浦賀。當時，德川政權雖也拒絕了通商的熱望，當他航過橫濱的杉田海上小柴沖時，終於在久里濱與德川政權的代表者浦賀奉行會見，締結了明春再來的條約而歸國了。翌年，率領着七隻軍艦航入江戶灣，三月三日，終於在橫濱締結了十二條日美親和條約。於是訂立了在下田及箱館二港開始通商的契約，調查了兩處港口而去，同時更與琉球也締結了條約，始行歸國。

於茲，德川政權的鎖國政策，終於因爲亞美利加的強韌而熱心的努力而破棄難守，藉鎖國主義來

維持的社會體制，也就全面動搖起來了。

諸如上述，日本向新時代邁出了一步。然而促成此等機運者，却不能忽略對於俄國的外交關係。自彼得大帝即位之後，驟向東方敢行發展的俄國，於十七世紀末葉，已占有岡札得加半島，而屢次調查過千島方面。西紀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至九年之間，以其船隻經千島列島航來伊豆及安房方面爲嚆矢，西紀一千七百七十八年（安永七年）有奧其連者，西紀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寬政四年）有拉克斯滿迭者，相繼來到箱根；西紀一千八百四年（文化四年），有萊扎諾夫爲特派全權大使航來長崎，表示了開始通商的熱望，然而均被德川政權嚴重拒絕了。其後，暫因在歐羅巴的本國情勢，放棄了與日本之間的問題；而在這期間，概如前述，就與亞美利加的柏利締結了通商條約。

俄國探知柏利航來日本，立即派海軍中將布札欽率領巴爾拉達號以下軍艦兩隻，於西紀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嘉永六年）七月，航來長崎而商議通商，當時於克倫米亞戰爭中曾與俄國戰鬥的英吉利軍艦斯達凌克號以下四隻，也追跡俄國軍艦航入長崎；於八月時，即以日美條約爲規準締結了條約。爲迴避英吉利軍艦而出港的俄國軍艦的迭那號，入港箱館及大阪灣之後，於十月時，又入港於卜田，於十二月時，始締結了條約。其後二年，與荷蘭也締結了條約。

翌年，任命爲日本駐劄總領事而來的，爲哈利斯。由於他的熱心努力，終於告成了西紀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安政五年）正月所締結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其中含有箱館、神奈川（今之橫濱）、長

崎、新瀉、兵庫(今之神戸)、江戶(今之東京)及大阪之開放，及關稅之諸種規定與領事裁判權等。探知日美間締結了通商條約的荷蘭、俄國、英吉利及法蘭西等國，也相繼締結了內容大致相同的條約。於是二百餘年來在世界舞臺上隱遁未顯的日本，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奮然蹶起了。

歐美各國如此希望與日本開始貿易者，却主爲輸入日本出產的良質的生絲。唯日本的出產量，只可供給從來日本國內的需要，所以因貿易發展而起的物資不足，當然引起了物價動搖的結果，且其動搖逐漸擴大，德川政權遂成了嚴峻的批判對象。

此種批判因係根據於社會的現實情況，逐漸擴大之餘，竟引起了打倒德川政權的強鞭之運動。對當時的政治形態加以批判的銳鋒時，其原理則必得求諸前述以日本學爲根據的日本原理，即天皇中心的政治主義了。

應乎此種情勢，繼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而起的慶喜，在就任十個月後，於慶應三年十月，即將二百六十四年以來由歷代天皇委任的國內統治權「征夷大將軍」的地位，奉還於明治天皇了。此時，天皇聖齡僅十六歲，繼孝明天皇而即大位，即時應乎當時的現實，調整了以神武天皇建國精神爲基礎的國家理想及傳統，爲了明確的諭示國民的方向，於翌年三月，遂頒布了五條誓文，諭曰——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諸公論。



一·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一·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須使人心勿倦。

一·打破舊來之陋習，而基於天地公道。

一·求知識於世界，努力振起皇基。

茲擬施行我國前未曾有之變革，朕躬率衆，誓於天地神明，定斯國是，立保全萬民之道，爾衆庶等，亦須基於此旨，協心努力。

如此，天皇親政的政治原理即見確立，慶喜就將江戶城獻上天皇而隱退下野了。江戶改稱爲東京，年號改元爲明治。明治天皇由京都御所還駕江戶城，御城改稱爲宮城，諸國大名均將領地奉還天皇。天皇及以此爲中心的國家與國民的密切關係，原爲我國自神武天皇以來的傳統理想，而現在勿論在事實上或原則上，均具有新的意義了。全國民都能團結一致，在天皇親政之下，爲新時代的進步，以全幅熱誠協力起來。如此，開拓了日本之驚人的興隆，此即爲明治維新。

## 第九章 近代日本的興隆

在這裏劃一個正三角形，若以這正三角形來表現現代的世界，則其三角形的三個銳角，適等於歐羅巴、亞細亞及亞美利加。恰如正三角形是由此三個同等角度的銳角所形成者一樣，現代的世界也

只能在歐羅巴、亞細亞及亞美利加的勢力恰得均衡時始可平靜無事。現在就以這種觀念來觀察最近百年間的世界動向。

距今百年前，發生了鴉片戰爭，香港歸為英國所有了。以此戰爭為契機，中國被迫入孫文所謂的「次殖民地」——即殖民地以下的立場，以此為前提，印度完全轉落為英吉利的殖民地了。於是印度及中國就使英吉利被稱為「日不沒國」的國家，因此，而展開了歐羅巴支配下的亞細亞之這種情勢。

先於鴉片戰爭十八年——西紀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在新大陸上完成了嶄新之生長的亞美利加，發表了門羅主義，脫離了被置於歐羅巴支配下的立場，宣言在亞美利加大陸上把持獨自的地位。而於鴉片戰爭後六年——西紀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派賓得路來日，使其開拓了最初的東洋航路。對賓得路的使命，更加以擴充發展者，則為柏利及哈利斯。

當亞美利加的軍艦頻行渡來日本的時期，已經奪得香港島的英吉利，更占據了安南；而領有印度支那的法蘭西，掌握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以及從來既奪有爪哇及其他南方諸島的荷蘭，均相繼接踵派遣了軍艦。這是因為日本希望與此等歐美勢力互為協力而成為新世界之開拓者的緣故。

在這種世界的換轉期中，日本的德川政權依然為繼續其政權，而以鎖國主義為其鐵則。然而此種鐵則，在設有大砲的軍艦面前也是餒然無力的。柏利於安政元年（紀元二千五百十四年，西紀一

千八百五十四年）再度航來，與德川政權締結了開放下田函館二港的親和條約，繼而英吉利、俄羅斯及荷蘭等，也各自締結了親和條約，於是更與歐美諸國陸續締結了通商條約，終於使鎖國政策立時破棄無餘了。然而鎖國的根柢仍然未改；維持着需要此種政策的封建組織，日本便突入新世界了。

諸如前文所述，鎖國主義是基於國內的要求而斷行的，開國政策是基於外國的要求而斷行的，而敢然轉換了此種政策的德川政權，因為本當專事國內的治安，所以此種處置遂由社會各層人士受到了峻烈的批判。而唯有藉諸鎖國主義始可維持的國內諸種體制，竟在根本上發生動搖了。猶其是隨諸外國貿易的開始，因國內物資的不足而引起了物價的激動，這竟成了使社會各層人士陷入混亂的契機。

德川氏的「將軍」，雖然由家慶傳至家定家茂，然而他們並不能處置激動期裏所頻發的諸種事件。恰如於第二部的「國家原理」中所述，孝明天皇深憂宸襟，竟將國民生活之不安引為天皇自身的責任，諭示家茂速行講求對策。然而，對於德川政權超越國內治安權限而濫行締結外交條約的越權行爲，國民全體的不信極度高昂起來。而終於使代家茂而被授命爲「將軍」之地位的慶喜，僅於就任十個月後，即將其地位奉還天皇，而斷行了德川政權的解散。當時正是孝明天皇駕崩（聖曆年三十六歲），明治天皇即位未久以後。

明治天皇立即基於神武天皇的創業精神，親裁萬機（參照第二部），於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以五條誓文誓諸天神地祇，對國民諭示了五大方針的實現，即係「保全萬民之道」。

肇國以來二千五百餘年，邇來守衛日本國土而保持日本國民安寧的四方海洋上，歐美諸國的軍艦已經舳艫相衝了。亞細亞的各地，早有歐美各國的旗幟翩然飄蕩，而日本也不得不迫於此等國家而締結了不平等條約。明治天皇即位當時的東亞現實況，即如上述。

對於此種實況，立即根據神武天皇創業的本始，絕不允許如攝政關白及征夷大將軍等把持特權的存在，萬事「竭諸公議」「洗盡舊來驕情行習」，而致「盡忠報國之誠」，此即明治維新之大本，而尤堪注目者，則為當時新政府的政令——

近來物價特別騰貴，幾有莫可如何之勢。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畢竟係由政令不正所致。民為王者之大寶，當此百事一新之際，宸衷屢憂，凡有智謀遠計或救弊之策者，無論誰何，當可投效。

蓋自「黑船」航來以還，物價著見騰貴，國民間貧富懸隔的傾向也愈見增高。天皇雖於五條誓文中諭曰：「立保全萬民之道」，而想及此種聖慮時，亦當聯想到一千三百年前，斷行大化改新時的現實性。五條誓文已揭諸前文，恕不重叙。

天皇於五條誓文之同時所宣布的宸翰，奉為新日本必進之路的諭示，亦當特意拜誦奉讀——

朕以幼弱，猝紹大統，爾來念及何以對立萬國而事列祖，朝夕不堪恐懼。竊考中葉朝政衰微，武家專權，表面推尊朝廷，實則敬而遠之，使億兆父母之天子，無計可知赤子之情。億兆之君，亦唯有其名，是以今日朝廷之尊重，雖若倍於古昔，而朝威倍衰，上下相離，則有如霄壤。如此形勢，何以君臨天下。今般膺此朝政一新之時，天下億兆，若有一人不得其所時，皆朕之罪，今日之事，唯有朕自身勞筋骨而苦心志，立於艱難之先，履行昔時列祖所盡往蹤，勤于治蹟，始可奉天職而不背所爲億兆之君。往昔列祖，親裁萬機，有不臣者，自爲將帥而征之，朝廷之政，蓋務簡易，如此不重繁禮，始君臣相親，上下相愛，德澤洽於天下，而國威輝乎海外也。當茲近來宇內大開，各國雄飛於四方之時，獨唯我邦疏於世界之形勢，固守舊習，不謀一新之效，朕徒安居於九重之中，偷一日之安而忘百年之變時，頗恐受各國之凌侮，上辱列聖，而下苦億兆也。茲朕與百官諸侯廣行相誓，繼述列祖偉業，不問一身之艱難辛苦，親自經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欲置天下於富岳之安。汝等億兆，慣於舊來之陋習，唯以繁禮爲朝廷之事，而不知神州之危急。茲一舉足，則驚爲非常，而生種種疑惑，萬口紛紛，而使朕志不得爲時，此不唯朕茲失爲君之道，亦失列祖之天下也。汝等億兆，宜善體朕志，相率去其私見，採其公義，以助朕業，保全神州，而慰列聖神聖，則生前幸甚矣。

蓋曾諭曰：「茲朕與百官諸侯廣行相誓」，「繼述列祖偉業」，「不問一身之艱難辛苦」，「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欲置天下於富岳之安」等等。

於是，過去二百年間續行鎖國政策的日本，於明治天皇親政之下，向「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的大目標邁進起來。

此次政治大改革的真意義，當時與日本接觸的各外國人士，極未理解。慶應三年（明治元年的前年）七月，英吉利公使的翻譯官沙多，曾參謁於新政府的建設，而與西鄉隆盛會見，傳達謂：法蘭西雖有援助德川慶喜的意志，而英吉利亦無時不有援助新政府的用意，西鄉立即答謂：「這是應該以我們的力量來作的事，與外國人並無任何關係。」，而斷然拒絕了此種要請。與此同時，法蘭西公使奧連·羅修對德川慶喜，亦曾提議提供戰艦、兵器及彈藥，慶喜謂：「有謝厚意，唯日本國體與他國不同，縱有如何事情，亦不能叛逆天皇，在自己的一代失去承自祖先地位，雖屬可惜，而縱令自己死去，亦不能反抗天皇」。如此斷然拒絕了這種提議，奉獻江戶城而隱退到水戶去了。

此時，明治天皇深知了德川氏的功蹟，命令新政府務使國民安堵，以有栖川熾仁王代理天皇接收江戶城。不過尚有未能理解此種改革而在東北地方蜂起反叛者，即所謂白虎隊。然而朝廷的處置亦係同樣，只謂：「朕今不德，未立教化之道」，僅將其首謀者處刑，對於藩主等與以非常寬大的處置，而有恕其罪未問。

以上所述者，乃係新日本的黎明——明治維新的大本。日本國民善能奉體天皇的聖慮，而完成了如此大業。明治維新並非革命，不外是使國家原理應合於新時代而加以調整的一大改革而已。

接受江戶城以後，天皇立即親閱了集合於大阪天保山沖的、薩、長藝等六藩兵船，繼而將江戶改稱東京而定爲皇都。當行幸途中，於現在濱松附近的潮見坂，首次親覽了怒濤澎湃的太平洋。扈從者木戶孝允曾於其日記上記謂：「至尊首次親覽大洋，是乃皇威輝耀洋外之始，不堪感泣」。更於三島親覽了富士山；扈從者三條西季知曾有歌謂——

君看富士峯

是爲鎮國寶

諺謂「欲置天下於富岳之安」的天皇，初次親覽了古時萬葉詩人詠爲「鎮國之寶」的富士山。駕抵東京後，於十一月，試乘了碇泊於品川沖的軍艦「富士山」。此僅爲千噸的小軍艦。

天皇首次搭乘軍艦，於此表示了「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的意志；此實爲近代日本興隆的契機。

歐美諸國的勢力將要壓服亞細亞諸國時，一千五百餘年來，專自追求理想尊重傳統，而以不斷的進步調整現實爲國是的日本國民，未久，即爲建設亞細亞盟主的確固地位而猛然蹶起了。上戴英

明的明治天皇，國民全體一致協力而涵養積蓄的國力，於天皇治世的四十五年間，便急速的昂揚起來。

以「對峙萬國」爲目標而斷行的廢藩置縣，促進了國內體制的整備。五條誓文所示的大方針，再度擴充而成了立憲政治的展開。日清日俄兩戰役，暫時解決了外國的壓迫。於是展開了東洋的和平，明治以前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漸次改正，繼而即與歐美諸國交懽起來。

若將這時代擬爲一個三角形，亞細亞所表現的角度，較其他一角的歐羅巴及另一角的亞美利亞，實屬狹小，亦不過是五度或十度的銳角而已。這五度或十度的銳角，漸次將其角度擴大起來，這便是近代日本興隆的真相，而接連着我們的時代——現代。同時還包括了東亞新秩序的建設。

以下，擬略述近代日本興隆的真相。由時間上觀之，雖僅爲七十餘年，然於此七十餘年間，非僅日本，即全世界亦爲多事多端的時代，也就是第一部開首所說的「世界地圖是變動的」時代。而於下文中有有限範圍內所述說的，只是最顯著的動向及其事象的素描而已。

維新大業以廢藩置縣告一段落，其完成却屬於明治末年，以下先由廢藩置縣述說。

明治維新當時，占有各地而任其統治的大名（封建諸侯），各將其領土奉還天皇，委爲政府的行政官，重新與以「藩知事」的名稱。同時，更將從來由其地域所徵收的租稅的十分之一，撥爲俸給。



廢藩置縣的結果，藩知事均被廢止，代而派去新政府的官吏，對於從來由大名領受定額俸祿的武士們，均由政府支給定額的依給。然而此種制度，對於政府實爲財政上的一大負擔，而領受俸給者亦不足維持其生活。所以爲時不久，卽加以廢止，新時代的武士忍受着異常的困難，樹立了順應新時代的生活體系。最初，新政府收回德川氏的直轄地，將以東京、京都及大阪等要地作爲中心的地域，均改稱爲「府」。將其他地域改稱爲「縣」。未久，卽對全國斷行了廢藩置縣，而於其中心地設置了府廳及縣廳。

在這期間，更撤廢了成爲封建秩序之規準的「士農工商」的身分，只對大名與以「華族」的名稱，對大名直屬的武士與以「士族」的名稱，對商工業者（卽所謂「町人」者）及農民與以「平民」的名稱；而在法律上，却承認其同等的權利。

新政府如此改革了社會組織之規準的身分關係，繼而在指導新時代的重要處置上，力行改革了軍事與教育。

在軍事方面，則效倣歐羅巴的各種制度，創設了陸海軍。從來由大名等所統制的武士團，其數雖達四十萬，亦均行廢止，以奈良時代的制度爲規準，以全國皆兵爲目標，發布了徵兵令，年達二十歲的男子皆有兵役義務。陸軍則研究法蘭西及德意志的制度，海軍則研究英吉利的制度，而樹立了新軍制。然而以歐羅巴的制度爲規準者，僅只限於組織，在指導精神上，却強化了日本的傳統，這

是頗堪注目的事實。而將此表現畢盡者，就是明治十五年頒發的軍人勅諭，武士道的精神藉諸新生命的注入，便成了新時代的軍人精神。

關於教育，設置中心機關文部省，以全國無一文盲爲目標，概以人口六百人爲一單位，設立小學校，規定男女六歲以上者必須就學八年。並將全國分爲八地域，每地域設大學一處及中學校三十二處，以期養成新時代的指導者。教育方針則使其徹底體得日本的國家原理。明治二十三年頒發的教育勅語，邇來便成了教育的指導原理。

如此繼續着誘導新時代的工作，同時更爲使國民由封建時代的彈壓政策下解放出來，便着手編纂了新法典。在另一方面，於中央設置司法省，在各府縣設置裁判所，由行政官手中使裁判獨立起來，而保障了國民的權利。於是，從來一無法文規準而被武士階級恣意支配的一般國民，始享受到人類的自由。

並行於軍事及教育，交通機通亦被改革。政府先以「幕府」及諸藩所有的汽船，設立了通運會社，在東京橫濱間及大阪神戶間開始定期航海，政府更自行鋪設了東京大阪間的鐵路，同時開始郵便制度，猶其對於電信的普及，續行了異常的努力。

新政府關於新時代的經濟基礎，也改革了租稅與幣制。

明治元年的租稅收入爲三百六十萬圓，其中地租占二百萬圓。然而至明治六年時，調查了土地原

價，規定以其價格的百分之三納爲地租，結果在租稅收入六千五百萬圓之中，地租竟占六千萬圓了，於是地租竟成了租稅的大宗。最初地租有納金及納現物兩種，自明治六年以後，均規定爲納金。但被課求地租者乃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耕作者則均以現物對土地所有者納入地租，土地所有者以納金繳納地租，所以土地所有者也能自行積蓄資金了。

次爲幣制的改革，明治四年，將德川政權下所通用的貨幣全部廢止，發行了新鑄的貨幣，更發行了紙幣，使舊時代的貨幣面目一新起來。

在新時代的形成上，殖產興業的發展也極屬必要。因之，即以結合資本爲目標而開設了銀行。明治六年，以二百四十餘萬圓的資本金創立的第一國立銀行，卽其嚆矢。這就是現在於東京驛降車口附近的大建築物中擁有五千七百五十萬圓資本金的第一銀行之前身。繼而又成立了第二（橫濱）、第四（新潟）、第五（大阪）等國立銀行（唯有第三國立銀行，於創立途中挫折）。這是爲了整理新政府創業當時發行的紙幣，而發行銀行自負其責的紙幣。明治十五年，因日本銀行的設立，從來銀行發行的紙幣均被廢止，日本銀行便發行了正貨與兌換紙幣。

銀行資本的集中蓄積，對於產業發達上極爲必要，所以政府也致力於銀行的發展，明治九年雖僅有四行，於十年末卽成爲二十六行，十二年末已成爲一百五十一行。其中也有三井銀行安田銀行等私立銀行。以下略述前講所述的三井兩替店及三井銀行的關係。

距今二百五十年前的元祿時代，在現在三井銀行的地址上，曾有所謂三井兩替店的金融機關存在，此事已於前講述畢。其後，德川政權的財政窮困，德川政權即藉此兩替店，屢次要求三井組獻金。明治新政府當局，亦曾對三井組及其他京都大阪地方的富豪要求獻金，同時更命其掌理政府財政機關的會計事務。自新政府實行貨幣政策，在大阪造幣寮鑄造新貨幣以後，三井組尙掌司其金銀之交換及其他地金之送遞等。而三井組亦會根據歐美的組織計劃設立銀行。唯因前述國立銀行的設立，終於暫時延期，首先着手設立第一國立銀行，提供了幾達半額的資本金一百萬圓，並由三井八郎右衛門以下數名三井系人物擔任經營。其後，明治九年，三井一家另行創設了資本金二百萬圓的私立三井銀行，而造下了發展至現在資本金一億圓的私立大銀行之基礎。所以，說三井兩替店成長爲現代的三井銀行，亦無不可。

明治政府以集中於銀行的資本，盡力使近代工業發達起來。所謂近代工業，就是關於兵器火藥等的重工業部門，以及關於紡績及其他的輕工業部門。這兩個部門平行發達，而收得了「富國強兵」的實績。

重工業因政府的長期經營，已日見發展，唯輕工業經過一定的試驗期，在經濟上達到收支相抵的狀況以後，便由政府事業移爲民間事業，而得到了自由發展。現在占世界第一位生產量的纖維工業，即爲首經明治政府研究而促進其發展的部門。英國所以稱爲「日不沒國」的原因，也是以纖維

工業爲基礎；現在其生產量遠下於日本，乃係諸君所熟知的事實。

在海運事業上也見到了同樣的傾向。今日高懸日章旗而出入於世界各地港灣的汽船，均爲日本郵船及大阪商船等大海運會社的所有船，此等會社均係根據政府方針而設立者。

在工業部門的發展上，最堪注目者，即政府首先研究了國家發展基礎的產業，政府先試驗經營一定期間以後，再將之移爲民間事業。所以已經走上正軌的工業界，其後在民間就自由發達起來，日本的基本產業，便由農業轉爲商工業了。

明治政府的機構與年俱進漸就整頓，於明治八年便成立了內閣制度。二十二年，於國民歡呼之中，發布了帝國憲法。翌年，更成立了第一回帝國會議。在這期間致力於政界者爲三條實齋、岩倉具視、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山縣有朋、松方正義及西園寺公望等。同時，活躍於自由民權運動者，爲板垣退助及後藤象次郎等。此二人各自創立了今日政友會及民政黨的前身，即自由黨及改進黨，以個人與官僚派政治家對立相峙，而爲確立發展天皇中心的日本國家原理，輔翼英明的明治天皇，却是初無二致的。於是以神武天皇創業理想爲根據而斷行的明治維業，及至帝國憲法的發布，遂達到了所期的目的。此時，明治天皇謹向皇祖祖宗及歷代天皇英靈，報告了爲增進國民生活的安寧幸福而開始立憲政治的實情，對國民也明確的諭示了方針。於

是，所有的日本人完全由封建制度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而得到自由國民的生活了。所以勿論東京或全國的僻鄉，國民均於感激喜悅之中，誓言了一死報國的決心，唯有這「憲法」，纔明確的表示了日本的國家原理。

而我們所當注意者，即由於國民的熱心希望，在神武天皇即位之地的橿原，建造了奉祀神武天皇的「橿原神宮」的事實。是爲紀元二千五百年，恰爲距今五十年前之事。

隨諸憲法制定及帝國議會之開設，伊藤博文等熱心的研究了英、法、德及美等的制度，更使其實現於天皇中心的增進國民安寧幸福的國家原理之確立上。參照歐美諸種制度而發揚了肇國以來的國家原理，實爲此次憲法的特色。

明治維新的指導方針，既爲廣求智識於世界，所以新政府的指導者，或親自視察歐美各國的實情，或由此等國家招聘優秀的學者及技術家，對於新文化的發展亦未遺餘力。善行採取西方的知識技能，使其調合於傳統的精神中，而將其導入了高度的階段。

新興日本達到此種狀態時，便遇到了試練其國力的機會。因爲朝鮮的獨立成了問題，而不得不與中國戰爭，於是日本爲維持東洋和平便毅然蹶起了。陸海雙方，連戰連勝，遂使清國派李鴻章前來下關提意媾和，確認朝鮮完全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島，而決定了支拂賠償金銀二億

二億兩與日本。

然而俄、德及法三國，以我國占有遼東半島反將有害東洋和平爲理由，強制要求返還中國。當時我國國力還不足對此抗議，因而便又忍痛返還於人。唯此事竟要求了其後日本國民的新的努力與勇氣。現在，遼東半島成爲日本之友邦滿洲帝國之一部，日見繁殷和平，乃是諸君所熟知的事實。

日清戰爭的結果，清朝政府對中外暴露了內政的紊亂無力，因而歐美諸國的新壓力日見增加，以至以「租借」爲名占據了各處要地。如德之於膠州灣，法之於廣州灣，俄之於旅順大連及英之於威海衛等。

中國民衆亦曾對此等列國的壓迫試行反撥，他們結成了義和團的結社，以北京爲中心捲起了暴動。歐美各國各派軍隊，要求日本協力，日本立即應諾，派遣軍隊驅逐暴徒，而首先入城北京。當時，日本軍的軍紀整然有序，深使歐美各國確認了日本的實力，以至使英國自動的與日本締結了同盟。關於這同盟的性質，英國如何廢棄了理想的孤立主義而與日本締結同盟，凡是現在的日本，猶其是我國青年所當理解的。

日清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各種產業驟見發達，例如紡績業方面，明治廿年僅有十九處工場，在明治三十六年即激增至七十六處；而生產額方面，在明治三十年也輸出超過輸入了。同時政府所直營的重工業部門，也能自製軍艦了。

日清戰爭時，使日本將遼東半島返還中國的俄國，乘北清事變的義和團事件之機，增加了對清國滿洲的出兵數，於事變終了後猶未撤回，在旅順築造了誇為難攻不落的大要塞，以至對朝鮮壓迫起來。日本爲了東洋和平，敢然蹶起，將俄國的勢力驅逐於北滿地方，在南滿地方建設了新的和平，而確保了朝鮮的獨立。

日俄戰爭後的日本，在各方面均愈得大見興隆。

例如在工業界方面，此次戰爭以前的主要產業雖僅止於輕工業部門，其後在重工業部門方面也有了顯著的發達。鋼鐵業、機械工業及化學工業等，在明治維新以來，均與政府直營的重工業並駕齊驅而發展起來。如旋盤一物，在明治三十八年時，雖曾有三百五十一萬圓的輸入額，其後隨諸國內生產的發達，明治四十三年即減爲三十六萬圓。再如明治三十八年起工的戰艦「薩摩」，在船體、機關及裝備上，較之歐美諸國的軍艦，更具有一番進步的性能了。此外，如鐵道的機關車等，雖每年輸入百輛左右，結果也能在國內工場生產了。在此等工業生產的原動力上，電氣事業的發達猶爲顯著。明治三十六年的發電力總和爲八百基羅瓦特，大正三年即激增爲一百一十萬基羅瓦特了。藉山間湖溪的惠澤，而促進了水力電氣的發達，勿論在輕工業上，或在纖維工業上，都表示了顯著的發達。明治三十六年，僅達五百台的紡績機械，於大正三年時，即已激增爲二萬五千台。綿織物已



經完全無需輸入，反而可以輸出東洋全體了。全國的鐵道幹線也殆乎完全成爲國有。外國貿易愈見發展，造船業等完全達到了世界的水準。以如此充實的國力爲背景，擴張了陸海軍備，維新以前與歐美各國之間所存在的平等條約，均被改正；而與英、法、德、俄、意、澳及美等，同樣被稱爲世界八大強國了。於是，新日本的領土，北至樺太，南達台灣，更合併了朝鮮半島，作爲東洋的盟主已經名實無愧了。

明治維新的改革，是以「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而「對峙萬國」爲其最大使命而斷然實行的。邇來，於明治天皇之下，官民全體一致協力，以謀國力之增進，終於使日本推進到東洋盟主的地位了。在這時期內，身爲新日本之元首的明治天皇，其精勵親政的實況，實可恐懼感激。日清戰爭時，進其大轟於廣島，由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至翌年四月二十七日，親幸狹隘之一室中，不問政務之大小，軍務之急緩，皆親裁躬臨，冬日更禁令燃其居室的火爐，而夏日則身御舊軍服，對於炎暑毫無厭意。戰前尙屬漆黑的髮毛，戰後殆乎變爲蒼白，據聞其間幾無安眠之夜。關於日本現代的興隆，尤其不得不銘記着如此未曾傳諸表面的一大事實。

造成明治時代四十五間燦然之政績的明治天皇，於合併朝鮮以後，未久即告駕崩，國民悲若失其父母，立時由大正天皇踐祚帝位，國民重又鼓起新的意慾，盡力於各方面的國家發展了。距今約三

十年前，勃發了歐洲的大動亂，即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酣戰不已的時間內，日本參加於聯合國方面，將海軍派往地中海，更攻奪了德意志極東根據地的青島。然而國內全體却毫未動亂。且國內諸種產業愈見發達，提高了工業國的地位，在社會各方面均得到了顯著的發達。世界大戰後數年，我國便移入昭和的新時代，也就是移入活躍於世界舞台的我們的時代了。

## 第十章 新亞細亞的胎動

關於亞細亞問題加以考察時，首當注目者，即「亞細亞」一語的意義。此語本來並非指印度、中國及日本等現在稱爲亞細亞洲的地域而言者。古代的亞述會對東方或日出之處，稱爲「阿修」(Assur)，其後在歐羅巴使用爲指稱東方地域的詞彙了。然而，最初只是稱呼自古以來與歐羅巴具有關係的現在小亞細亞地方爲「亞細亞」，直至中世紀依然如此；唯歐羅巴文藝復興時代，其政治的或經濟的勢力圈擴張到東方來，「亞細亞」的名稱，也就廣汎的指稱東方的地域而言了。「亞細亞」本來是表示在歐羅巴東方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支配圈的意思，而絕非地理上的名稱，終於在確立了支配圈之後，成爲現在吾人所用的名稱了。不過這只是距今百數十年前的事。

對於印度半島與以「印第亞」之名稱者，亦係如此。

太古以來時行越過興都庫什山脈侵入印度河流域的亞利安人，以「水」或「河海」的意思，稱其

爲「辛度」(Sindhu)，其後成爲地名，在中國稱爲「信度」或「身毒」，在波斯稱爲「新度」(Hindu)，在希臘稱爲「印的阿」(India)，而終於遍用於半島全體了。英吉利進行東印度公司的經營，在該公司置於英吉利直接監督下的十九世紀初葉以後，詳言之，即維多利亞女王兼攝了印度皇帝的西紀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明治十年)以後，印度半島全體即被稱爲「印第亞」了；而將之改爲漢字時，則爲「印度」。

印度半島全體歸於英吉利支配之下，與英吉利併向東方發展的法蘭西，也占領了安南及堪勃加等地。因其恰位於印度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遂稱爲「印度支那」。是爲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之間約一世紀間的事情。這也是這地域被置於歐羅巴支配下的紀念。

荷蘭先於英吉利及法蘭西，於十七世紀初葉，即置其東洋發展根據地於瓜哇，而占領了蘇門答拉與婆羅洲，也因該島等位近印度的關係，總稱此等島嶼爲「荷領印度」。總之，均爲此等古來自有其獨立名稱的島嶼歸諸歐羅巴人支配之下，而作了紀念。

「亞細亞」的名稱及其一部之印度的名稱，得以漸次擴張其範圍者，均爲歐羅巴人的政治的經濟的支配圈逐漸擴張所致。而在另一方面，即表示着亞細亞的殖民地化。

呂宋是古來的名稱，曾以獨立的立場與諸國開始交涉，却首爲葡萄牙人麥哲倫發見，而與其島嶼一同置於西班牙的支配之下了。其後，於西紀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明治三十一年)，歸爲亞美利加

所有。現在稱爲菲律賓者，即是此等島嶼。

「支那」的名稱，雖由來不同，然而亦非從現在稱爲支那的地域所發生的名稱。

古時，該地生產的生絲輸入羅馬時，取生絲「賽列斯」(Seres)的名稱，用以稱呼其生產地，由此而轉訛爲「支那」。或謂是由西紀三世紀前的「秦」所轉化的。

「支那」這名稱的由來，是由古代的國號「秦」所轉化的。不過却是外部所加的名稱，而絕非中國人的自稱。然而成爲現在的地理學上的名稱者，却是歐羅巴勢力擴張至東方以後的事情。

元朝時，家遊中國的意大利人馬哥孛羅，對於日本有所聞知，而介紹於歐羅巴人，當時曾稱日本爲「基般克」，這是由日本的中國音「日本」所轉訛的。所以現在的「加潘」「亞潘」等名稱，也是其轉訛而無疑了。

日本的國號係根據於「日之本」之國，即「日出處」的觀念。距今一千四百年前，聖德太子派小野妹子遣使「隋」國時，曾稱自國爲「日出處」，這就是國號的起源。而「日出處」的稱呼，不外是表現以日神——即具有明如太陽的神德的天照大神——爲皇祖的古代日本人之觀念。

日本國號實出於「日出處」的觀念，而將此觀念說明爲一貫之國家原理的史籍，即爲「日本書紀」。此書完成於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即今日之英吉利及法蘭西尙未備具國家形態的時代。邇來，日本人信奉該書所示的原理而迄今日，現在於亞細亞大陸上，獨有日本顯示着興隆盛勢的原因，亦

在於此。日本能占有亞細亞盟主的地位，絕非偶然；以日本為中心而建設東亞新秩序，也是具有充分理由的。日本就在「新亞細亞的胎動」之中，榮達了今日的紀元二千六百年。

產生「亞細亞」之名稱的亞述語「阿修」，是表示「日出處」的意思，這觀念竟偶然一致於日本國號的觀念，實有興味盎然之感。

(完)

